往事如昨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吉皮乌斯回忆录

郑体武 岳永红 译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往事如昨

——吉皮乌斯回忆录

作　　者　吉皮乌斯

译　　者　郑体武　岳永红

责任编辑　曹坚平

封面设计　王晓阳

版式设计　应黎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7.75

字　　数　18 万

印　　数　5000

ISBN-7-80616-474-x/I・171

定　　价　12.50 元

编辑说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勃洛克、蒲宁等,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洛扎诺夫等,他们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哲学思想、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这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期,与19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相辉映,被文学史家、文化批评家称之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的作品,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白银时代"的作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在过往的历史时期,"白银时代"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它们的"开禁"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来的事,然而一旦开禁,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

本文丛收入随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尽量多侧面地展示"白银时代"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

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上个世纪之交的“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

当然，本文丛的推出，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

中译本序

季娜伊达·吉皮乌斯,诗人,小说家,批评家,俄国早期象征主义代表人物之一。1869 年生于土拉省的别廖夫。由于家庭经常搬迁,她在童年和少年时没能受到系统教育,主要靠自学获得知识。从小喜欢写作,7 岁开始写诗,19 岁开始发表作品,同时认识梅列日科夫斯基,不久便嫁给了他。1896 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新人》,1904 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曾与丈夫共同发起和组织宗教—哲学会,创办《新路》杂志,并以安东·克莱尼为笔名发表评论文章,引起广泛关注。本世纪俄罗斯的三次革命吉皮乌斯都经历过了,对 1905 年的第一次革命和 1917 年的二月革命应该说她是同情的,但对十月革命却采取了断然否定和敌视的态度,遂与丈夫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侨居国外,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终客死他乡。

吉皮乌斯是位独具一格的诗人,她的诗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特殊的世界。心灵的断裂,孤独的折磨,精神的苦闷,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现实与理想的脱节,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悲哀等等,是吉皮乌斯诗歌的基本主题。俄国象征主义领袖勃留索夫这样评价她:“作为一个有才华的、独立的、善于为我们

讲述自己心灵的诗人,作为一个卓越的诗歌大师,吉皮乌斯应该永远载入我们的文学史册。”吉皮乌斯把写诗看成是绝对私人性质的事情。“诗我写得很少,只有在不能不写的时候我才写。”尽管如此,她发表的诗作的数量仍然可观。吉皮乌斯还把诗歌视为祷告。祷告是与上帝交流,是跟上帝倾诉自己最隐秘、最重要的事情,自己耳濡目染的东西。祷告是长期彻夜不眠的结果,能激发个性的精神体验。当然,她是将自己的这一理论付诸了实践的。

吉皮乌斯交游极广,与文学界、思想界乃至宗教界联系密切。她和丈夫开办的家庭沙龙精英荟萃,名噪一时,堪称彼得堡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对彼得堡的精神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沙龙的女主人,她也因此而被称为“俄国颓废派的圣母”。

吉皮乌斯的个性和创作与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不可分割,忘记她,我们对俄国象征主义的认识就不可能是完整的。

吉皮乌斯一生的文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歌,二是回忆录。回忆录有两部:一部是《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另一部就是我们现在呈献给读者的《往事如昨》。

应该指出的是,《往事如昨》不是一部简单的回忆录,这同时也是一本精彩的人物画册。在这部回忆录里,作者无意于直接再现事件,她要着力刻画的是个性——鲜明的、独一无二的,同时又反映了时代特征和趋势的个性。在回忆一些生动有趣的细节时,吉皮乌斯与其说是在复原性格,不如说是在塑造形象,栩栩如生的形象。展现在《往事如昨》中的人物群像,如勃洛克、别雷、勃留索夫、索洛古勃、洛扎诺夫、普列谢耶夫、波隆斯基、托尔斯泰、维鲁波娃和拉斯普庭,简直呼之欲出。从中不难看出吉皮乌斯观察的细腻和文笔的精湛。例如回忆勃洛克的一个片段:“勃洛克严肃认真,特别好静少动,而别雷虚与委蛇,始终手舞足蹈。

勃洛克讲话吃力,少言寡语,嗓音暗哑,而别雷口若悬河,挥臂劈手,表情丰富。他忽而面带微笑,忽而挤眉弄眼。如果你向勃洛克提问,他会半天不吭声。然后说'是'或者'不'。鲍利亚(别雷)有问必答:'是是是……'马上会有一千句话脱口而出,腾云驾雾。勃洛克浑身僵硬,就像木头或石头。鲍利亚浑身柔软,温存,甜蜜。勃洛克的头发是深色的,松软的,却不很熨贴。鲍利亚的头发比羽毛还轻盈,黄色的,像刚孵出的鸡雏。这是外表。说得再稍微深一些。勃洛克——这一点朋友和敌人都感觉到了——非同寻常地、绝无仅有地真实。或许,他也对人撒过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整个身心都是真实的,可以说,他浑身散发着真实的气息……勃洛克从本质上说是忠实的。假如他不忠实,早扑通一声掉进地狱,跌得粉身碎骨了……鲍利亚·布加耶夫整个是轻盈的,轻盈得就像他自己青年时代的发丝。他似乎能手舞足蹈地飞越任何'地狱'。他好像命中注定要反复跨越地狱,在地狱边缘跳舞,——忽来忽去,忽左忽右,忽上忽下……鲍利亚·布加耶夫——是活生生的不真实。这是他的天性。"如此精彩的段落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回忆录既是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史料,又是具有文学欣赏价值的美文,读来引人入胜。

郑体武

1997 年 10 月于上海

目　录

我的月亮朋友——回忆勃洛克

任凭群鸦发出声声哀鸣，
盘旋在我们的眠床上方，
那些当之无愧者，上帝啊，上帝，
将进入你的天堂！

这不是一篇谈论勃洛克诗歌的文章。这样的东西当年我写过不少。这也不是一篇谈论勃洛克本人的文章。而且无论如何这不是对勃洛克的审判。也不是对他的评价。我想讲述勃洛克本人的故事，对我们之间的聚散离合作一粗浅的勾勒，——仅此而已。

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交往很多，很多。我们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友谊，月光般的友谊。不记得是谁(好像是个法国人)说过，友谊永远是月亮，只有爱情是太阳。

一

秋天。彼得堡近郊的别墅。一片树林的边缘，一条沟谷

旁的草地。苹果般酸涩的空气，淡紫色的天空，与纤秀挺拔的白桦树浅黄色的树叶交相辉映。

我坐在沟边读刚收到的一封信。这是奥尔加·索洛维约娃[①]从莫斯科寄来的。

关于这位出色的女性我要在这里略作交待。她是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②]的弟媳，米哈伊尔·索洛维约夫[③]的妻子。米哈伊尔虽没有哥哥出名，但似乎比哥哥更深刻，更专注，最主要的是，更“文静”。奥尔加性喜冲动，头脑聪明，才华出众，甚至可以说，还是节烈女子。她的画不为人知。她好像也很少拿出来示人。但她的每一幅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都不乏新意，这是它们后来没被忘记的原因。她只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在我们相识前很久），在《北方信使》上发表后，它又成为一篇如此新鲜而特别的东西，以致我们很久都不能忘怀。

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开始通信的。而且，书信往来多年，彼此竟然从未见过面。直到她去世前没多久，我们才终于在莫斯科相见。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见到鲍利亚·布加耶夫[④]（后来取笔名为安德列·别雷）。布加耶夫家和索洛维约夫家当时都住在阿尔巴特街，而且是在同一幢楼房里，只是层次不同。

好像是 1903 年春，身体虚弱的米哈伊尔·索洛维约夫得了流行性感冒。病情变得复杂。奥尔加寸步不离她的左右，直到最后一分钟，为他合上双眼，她便走进另一个房间，开枪自杀了。

人们为他们夫妻两人一起举行了葬礼。奥尔加虔信宗教——多神教。她的爱就是她的宗教。

留下了 16 岁的儿子谢尔盖。他后来成为一个不错的诗人，出了几本书（有点古典）。大战爆发前他去当了神父。

二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始时那个晴朗的秋日。从奥尔加·索洛维约娃的信中掉出几张单页的纸。是诗稿。不过，还是让我们先读信。

信中有一段附言："……您对你们彼得堡刚崭露头角的一位诗人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当然，还没有发表过作品。不过也许，您与他已经认识？他姓勃洛克。鲍利亚（布加耶夫）读了他的诗兴奋得简直要在地上打滚。我……说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给您抄去几首。请回信谈谈您的感想。"

这些最初的胆怯的歌吟是否收进了勃洛克的某个集子？大概没有。这些诗是那么朦胧恍惚，言语是那么含糊不清，纯粹的勃洛克风格，这种风格他后来仍保持着，也正是这一点给了他特有的魅力。

还有主题，我记得，也是勃洛克式的：美妇人最初的幻影。

三

搬进城里，冬天，事务，好像是宗教—哲学会……我没有碰到勃洛克，尽管又有人给我带来他的另外一些诗，又一次引起我的兴趣。

早春，乍暖还寒，还在烧壁炉，就是说，是在 3 月初或 3 月中，有人按响了我们的门铃。我走到前厅，打开门。

天气很晴朗，但前厅里很暗。我只看到，这是一个陌生的大学生。穿着带斑点的浅灰色学生装。

——我来……我可不可以报个名……星期五，梅列日科夫

斯基⑤要在盐城作报告……

——您贵姓?

——勃洛克……

——您是勃洛克?快请进来,让我们彼此认识一下。报告先不着急,这是小事……

就这样勃洛克走进了我的房间,坐在壁炉的另一端,正对着高高的窗户。窗外——窗户对着救主大教堂的广场——是早春清澈的绿光,已经不再暗淡的天空。

我并不觉得勃洛克漂亮。窄而高的额头(他的脸和身躯上的一切都是窄而高的,尽管他是中等个头)上方是浓密的褐色头发。脸是直板的,一动不动,平静得如木雕石刻一般。这是一张很有意思的脸。

动作很少,嗓音也与之相配。我觉得,他的嗓音也是"窄"的,只是还有些低沉和沙哑,仿佛是从深深的井底发出来的。勃洛克讲话慢条斯理,每个词的发音都很用力,好像不时地被某种沉思打断。

然而奇怪。这些慢条斯理、时断时续、有些吃力的话语,这沙哑的嗓音,这呆板的面部,这灰色的、不太专注的眼睛——这位大学生的整个面貌,却蕴含着一种可爱的东西。是的,一种可爱的、稚气的、"不可怕的"东西。要知道,"不知什么原因"(年轻的鲍利亚·布加耶夫也许会知道),每个刚成年的人都是可怕的。在勃洛克身上没有丝毫这种"怪现象",这也许是因为,尽管他呆板、严肃,甚至木讷,可他身上没有"成年人的特点",没有让人感到"可怕"的成年人灰颓的一面。

当然,这一切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而只是隐约感觉到。

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我们都说了些什么。但我们的谈话明确告诉我,我们还会见面,肯定。

好像是在勃洛克的来访快结束时，梅列日科夫斯基回来了。

四

这些年我始终没有忘记勃洛克。宗教—哲学会的活动他好像没参加过，或者偶尔参加过(所有的人都参加过)。但《新路》杂志从创刊伊始他就在场。他关于美妇人的整个系列诗就是在这个刊物上最先发表的。对刊物的评论部分，他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几乎每期他都要送来一篇评论或短文：关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关于符·索洛维约夫的新版本……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当年的旧杂志就可知道。

不过，早在《新路》创刊前我们的友谊就已经很深厚了。即便是在1902年夏天，他去自己的沙赫马托沃(莫斯科近郊的庄园，他后来曾长期居住在那里，还亲自动手在那里建房)期间，我们仍然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深秋的时候他还到了卢加，在我们那儿住了几天。

我们的别墅地处荒凉的一隅，多雨的夏季过后，天气变得晴朗而又寒冷。

我们在树林的隔离带漫步，四周是九月的金黄和红硕，小溪在苔藓间潺潺流淌，溪水就是看上去也透出一股凉意，虽然水面上映照着阳光。我们谈论着什么——可能是在谈论杂志，也可能是在谈论别的东西……未必是在谈论诗歌。

我与勃洛克的每次谈话都无法转述。要明白这一点，就要了解勃洛克。首先，他跟你在一起时，始终又同时身在别处，——我想，只有非常粗心大意的人才不会发现这一点。其次，他慢条斯理，少而又少的话语听起来如此费劲，如此沉重，结果导致本来是轻松的话也变得不轻松了。

当然,可以"自说自话",各行其道。我见过很多人就是这样跟勃洛克谈话的——甚至是谈论"崇高的"东西。然而我,即便是进行最简单的谈话,也总能不由自主地找到一种特殊的语言:词语之间和词语之外蕴含的东西远远多于词语本身及其本义。主要的、重要的东西从不说出来,认为它是"不可言说"的。

我承认,这种"不可言说"(勃洛克喜爱的一个词)有时也令我恼火,会产生一种近乎粗暴的愿望,想把一切都颠倒过来,扯下那些模糊的遮盖,将谈话纳入直白清晰的轨道,变得像几何学一样。这样的反抗里有着自己的真实,但……勃洛克不以为然。我现在所谈的早期勃洛克不以为然。

不能说他脱离现实,更不能说他"不聪明"。而同时,我们称之为哲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乃至宗教的一切,又好像跟他不沾边儿。作为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学生和崇拜者,勃洛克全身心沉浸在老师朦胧的预见中,沉浸在他讴歌"她"和"彩虹姑娘"的诗句中。索洛维约夫的基督教没有触及勃洛克。基督教是索洛维约夫的"预见"赖以产生的源泉。他怎能无所顾忌地从一个层次跳到另一个层次,怎能在《三次会见》——最"不可言说"的长诗中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写出这样的诗句:"沃洛金卡,你是多么愚蠢!"——勃洛克做不到这一点。"她"要么如平静的非夜晚的光照耀着他,要么跟他一起跌入深渊,在那里可顾不上善意的自嘲。

五

与勃洛克交往越多,他的性格特征就越是清晰。这特征具有双重性:首先是他的悲剧性,其次是他的不设防。不设防什么?什么都不设防:不设防自己,不设防别人,甚至不设防生死。

可勃洛克的主要魅力也恰好来源于这悲剧性和不设防。当然，明白这一点的人为数不多，但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他吸引。

我内心对勃洛克云缠雾绕的“不可言说”的反抗是一种本能的要求，目的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找到一种保护，获得一种防身的武器。但为此，应当适时地成为成年人。成年——上面说过的不无希望的、扼杀一切的，但又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成年，对勃洛克来说，却迟迟未来。尽管他表现出罕见的深度，但依然停留在“责任”的界线以外。

他本人对此是否清楚？他对自己的悲剧性和不设防是否清楚？大概是清楚的。至少他是有所感觉的，而且预感到它们将给他带来什么。为此他竭尽了全力。

六

我想，勃洛克自己也希望“摇身一变”。他接近过、贴近过生活，可一想到要进入生活，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生活便对他挤眉弄眼，丑态百出。

我不知道他是以何种方式，以怎样的努力接近生活的。我写的只是我亲眼所见的勃洛克。

而我们俩甚至从来没有谈论过对方——彼此的饮食起居。特别是在我们成为朋友后的最初几年。至少我们没有直接谈论过具体的事实，而只是在事实外边“兜圈子”。

我对勃洛克的大致身世当然有所了解，知道他的父母离了婚，知道他跟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知道他的父亲远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对自己还有一个妹妹，留在了父亲身边，勃洛克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已不记得我是何时和怎样知道这些的。同事实本身相比，我更清楚事实在勃洛克心中的反映。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可能是在看校样，或是做杂志方面的其他工作——坐到很晚，很晚。不知不觉5月的白夜早已溜走。一轮小而苍白的太阳升起来，已经升得很高。但阳光照耀下的街道却是空空荡荡的：城市在安睡——要知道，那是个非常绵长的夜。

我喜欢这夜静中撒满阳光的时辰，死寂的彼得堡的闪光的恐怖（这里有多么可怕的预兆啊）。

我对勃洛克说：

——您知道吗？我们去散步吧。

于是我们下了楼，走到灰色的马路上，脚下的石板因泥土解冻而吱嘎作响。马路笔直，笔直，鸦雀无声，围墙里的什么地方传来公鸡的啼叫……整个城市里只有我们俩。我们的城市，因我们而显得可爱的城市。它好像死了，但我们知道，它只是在酣睡……

我还是不记得，我们谈了什么。我只记得，我们很快活，而且谈话很轻松，这在勃洛克是少有的……

往回走时，勃洛克把我送到家门口。不知为什么，我问他：

——您是怎么想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您会结婚吗？

他的回答干脆得出人意料：

——会的。我想，我会结婚的。

还补充了一句：

——我很想结婚。

就这么两句话，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清楚，其效果跟别人花整晚时间谈论一桩婚事没什么不同。

我问过一个人：

——您可知道，勃洛克要结婚了？

那人很平静地回答：

——知道，娶的是柳鲍奇卡·门捷列娃。就是，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认识她，胖乎乎的。

七

这一整个夏天我跟勃洛克都没有通信。秋天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勃洛克婚后去了沙赫马托沃，他的妻子貌美惊人，鲍利亚·布加耶夫和谢辽沙·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夫妇米哈伊尔和奥尔加的儿子）在沙赫马托沃他们那里作了很长时间客。

接下来的整个冬天情况变得如此复杂，以致勃洛克在我们的视野里几乎没出现过。刊物还在继续（宗教—哲学会被上面查封），可我入冬时遭遇的个人痛苦，使我在刊物里的工作中断了一段时间。我们这儿门庭冷落，只偶尔有些青年，与刊物关系较紧密的工作人员来访，而且，这些都是勃洛克的朋友。

我隐约记得，他也来过。是的，来过——结婚以后第一次。在我看来，他还跟从前一样，丝毫没有改变。只是稍微温和些，但也有可能只是我们为彼此见面而高兴。他给我带来了诗——依旧是勃洛克风格的，依旧优美动人，依旧讲的是美妇人。

我们的谈话也跟从前一样。只是我又生出一个直率的问题，就实质而言，这问题完全是多余的：

——这是真的吗，当您谈论"她"的时候，您并不认为，也不可能认为，这是一个现实中的女性？

他甚至垂下了眼睛，好像对我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难为情：

——这当然啦，我从不这样那样认为。

我感到羞愧。对勃洛克，而且是结了婚的勃洛克来说，并不

存在这样的危险。我为什么要怀疑他呢！应该看到，婚姻使他有所改变，但这改变似乎实在是太少。

分手时我说：

——您不想介绍我认识您的妻子吗？

——不。不想。完全没有必要。

八

我不愿涉及勃洛克的任何一位朋友，只有他的一个朋友（从前也是我的朋友）——鲍利斯·布加耶夫——“安德列·别雷”是个例外。他是无法回避的。

他还活着。对我来说，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他似乎早就死了。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谈论的是死者还是活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真话。同时，谈论死者又跟谈论活人一样，谁都无法说出整个事实的真相。对有些事情需要保持缄默，无论好事还是坏事。

若要专门写安德列·别雷，我甚至不会有丝毫的兴趣。我之所以要提及从前的鲍利亚·布加耶夫，只不过是因为我与勃洛克交往的历史要求这样。

很难想象还有哪两个人比鲍利亚·布加耶夫和勃洛克反差更为强烈。他们的差别太明显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内在的相似，联系他们俩的纽带，并不十分容易把握和判断。

我是大约在认识勃洛克的同时认识鲍利亚·布加耶夫的（勃洛克大概也是那时认识他的）。虽然布加耶夫住在我们不常去的莫斯科，而勃洛克住在彼得堡，但我们同前者的关系表面上看要更亲近些，不知是友好呢，还是亲昵。

我是在勃洛克的圈子里谈论布加耶夫的，所以我不能停留

在我们的关系上。我仅仅指出这两个人的不同之处。称呼布加耶夫，除了叫他“鲍利亚”，我很难再找到别的称呼，而称呼勃洛克则不同，我是绝不会想到要叫他“萨沙”的。

勃洛克严肃认真，特别好静少动，而别雷虚与委蛇，始终手舞足蹈。勃洛克讲话吃力，少言寡语，嗓音暗哑，而别雷口若悬河，挥臂劈手，表情丰富。他忽而面带微笑，忽而挤眉弄眼。如果你向勃洛克提问，他会半天不吭声。然后说“是”，或者“不”。鲍利亚有问必答：“是是是……”马上会有一千句话脱口而出，腾云驾雾。勃洛克浑身僵硬，就像木头或石头。鲍利亚浑身柔软、温存、甜蜜。勃洛克的头发是深色的、松软的，却不很熨贴。鲍利亚的头发比羽毛还轻盈，黄色的，像刚孵出的鸡雏。

这是外表。说得再稍微深一些。勃洛克——这一点朋友和敌人都感觉到了——非同寻常地，绝无仅有地真实。或许，他也对人撒过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整个身心都是真实的，可以说，他浑身散发着真实的气息。(好像，有一次我甚至跟他谈起这一点。)有可能，他的不善言辞部分地就是起因于这天生的真实。要知道，我想，勃洛克一直抱有这样的意识或感觉(对谈话者来说这很明显)：他什么都不明白。他是视而能见的，一切对他来说，他对一切来说，都是言而未尽、含混不清的。很难表达这种痛苦的感觉。他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不明白的恰是那些不明白它就等于什么都不明白的东西。

当勃洛克的这种经常状态表现得特别明显时，我不由地想：万一所有的人同样“什么都不明白”，并且，勃洛克的罕见之处就在于他总能感觉到他“什么都不明白”，而所有其他人却感觉不到呢？

无论如何，对鲍利亚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的实在太多，实在太清楚、太独特、太深刻、太有趣，有时简直是太精彩。无

论什么,他岂止是明白,他简直是明白过头了。我说这话时绝对是严肃认真的。我并不否认《话语》——从前的刊名似乎是《白箭》——上的一篇随笔是出自我手。布加耶夫不是天才,也不可能成为天才,而只是有些天才的火花在他身上闪亮,一些不知从何处飞来又飞向何处的天才之箭不时射中他。但他永远都是它们的被动的对象。

这一点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不真实的人,与真实的勃洛克大相径庭。最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他又不失为一个诚挚的人。但还是让人感到这是另一种质地,另一种性质。勃洛克从本质上说是忠实的。假如他不忠实,早扑通一声掉进地狱,跌得粉身碎骨了。不过掉进去也应该——因为他"什么都不明白"……

鲍利亚·布加耶夫整个是轻盈的、轻盈的,就像他自己青年时代的发丝。他似乎能手舞足蹈地飞越任何"地狱"。他好像命中注定要反复跨越地狱,在地狱边缘跳舞,——忽去忽来,忽左忽右,忽上忽下……

鲍利亚·布加耶夫——是活生生的不忠实。这是他的天性。

九

究竟是什么把如此不同的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是存在的。我还是不愿涉及"艺术",即他们两个人都是诗人,作家。我谈的不是文学,只是人,还有他们的心灵,再确切些说,是他们的风貌。

首先,他们俩,勃洛克和布加耶夫,是同一代人(也许,是同一"半代"人),两个人都无可救药地"未成年"。一个成熟的人,只

要他还不是彻底平庸，他的身上自然会保留某些孩子气。但勃洛克和布加耶夫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俩没有成熟期，时间过去越久，越是容易看出，他们俩不可能再长大。无论是勃洛克的严肃；还是布加耶夫的博学，都无法打破他们给人造成的未成年印象。这是代替成熟的东西，而绝不是成熟本身。

他们俩都有纯孩子的一面，但表现不同：勃洛克是个若有所思的、固执的、受惊的孩子，孤身一人流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鲍里亚则是一个喜欢撒娇、调皮任性的孩子，整天想入非非，无法无天，忽而很天真，忽而故作天真。

勃洛克对自己的天真所知甚少。鲍利亚对自己的天真则了如指掌，还故意夸大天真，玩弄天真。

他们俩都意志薄弱，虽然表现有所不同。两个人都被命运操纵。不过，如果说勃洛克给人的感觉是悲剧，那么鲍利亚给人的感觉则是凄惨，充其量是传奇。

在不礼貌的旁观者看来，无论勃洛克，抑或布加耶夫，恕我直言，都是“不正常”的人。同样的不礼貌的公众原谅了他们的“不正常”，因为他们有“才华”，因为他们是“诗人”。这里的一切，不用说，从头到尾都是侮辱性的。承认他们的“不正常”也好，因为“诗歌”而原谅他们也罢，对外边的人能要求什么呢？可怕的是，这一代的许许多多诗人和作家自己（我这里实在不是说勃洛克和布加耶夫）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个观点。服务于“艺术”的人自己也逐渐习惯了为自己的意志薄弱和不成熟辩护——恰是通过对“艺术”的参与。他们没有发现，他们正在脱离生活，变成为公众插科打诨的滑稽演员，为此他们的一切都会获得宽大……

不过我好像走题了。言归正传。

十

1904年春我们到国外去了一次。我们在莫斯科作过停留(当时我们是去亚斯纳亚波良纳),当然,见到了布加耶夫,虽然对这次会面我记得不是特别准确。我只知道,布加耶夫跟勃洛克的关系那时已经很亲密(年轻的谢·索洛维约夫同样如此)。

他们的关系之所以会变得亲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有布加耶夫自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比勃洛克逊色的符·索洛维约夫信徒。作为一个对任何哲学和形而上学都格格不入的人,勃洛克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样,对符·索洛维约夫哲学的始因基督教同样格格不入。他把基督教纳入"不可言说"的范畴。相反,布加耶夫只是说,谈基督教最好是跟基督徒谈。他对哲学和形而上学有着强烈的爱好,尽管我并不认为他跟勃洛克发挥过自己的哲学理论。应该说真话:布加耶夫善于与人交谈,他跟谁都能找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话题。

我们与他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约好:鲍利亚每次来彼得堡(他希望能常来),都住在我们家里。

1904年夏天和秋天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大家记忆犹新:刺杀普列维⑥,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⑦之"春"——宴会……我们有自己的私人事件:将那些所谓的"唯心主义者"(布尔加科夫⑧,别尔嘉耶夫⑨等)拉进《新路》杂志。

我写的不是对这段时间的回忆,所以这里只能插一句:由于多种原因而具有多重性质的《新路》,我们决定在1904年停办,当然,最好转手给什么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想出国三年。不过行期我们并没有确定,假如通过引进新人能够成功地按照时代的要求(但不能改变它的基础)对杂志进行改革,我们还是乐

意继续办下去的。说得简单明白些,《新路》作为一本宗教杂志,个人主义色彩太浓,社会气息不足。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团体的“唯心主义”是一座桥梁,借助这座桥梁这些昔日的社会活动家(社会民主党)可以走向宗教——也许,他们自己对此并不清楚。(未来证明,总的说来,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人人都清楚,在以后的岁月里,布尔加科夫和别尔嘉耶夫在宗教方面走得多远,他们身后的桥梁被烧掉得有多快。)

我们的希望没能完全实现。唯心主义者进入了《新路》,但这种联合本身又清楚地表明,合作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们的“社会民主党”色彩还是太浓,我们的个人主义气息还是太重。

事实上,接近年底时杂志已经移交给他们了,而且我们同意,刊名改为《生活问题》以后,我们将退出杂志的工作。当然,杂志的人员组成也变了。这一点是经过友好协商解决的,尽管我不能不说,我们对联合和让步有着更强烈的良好愿望。不过纯社会活动家们对艺术界人士所抱有的习惯性不信任,还有对基督教的偏见——他们习惯了认为“宗教即反动”——也表现在“唯心主义者”身上并不令我们吃惊。

杂志的秘书丘尔科夫[10]仍留任《生活问题》的秘书。他早在《新路》即将停刊的时候就已经全身心地投向了新集团一边。好像是在12月,我跟他和布尔加科夫发生了唯一一次因杂志而起的冲突,这场冲突很能代表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能说明勃洛克当时的处境,因为它正是由我的一篇关于勃洛克的文章引发的,——那好像是我写的第一篇关于勃洛克的文章。当然是说他的诗。丘尔科夫和布尔加科夫是想让我明白,我的题目缺乏社会性,而勃洛克也不够出色,且我的小文不适合杂志的新面孔。我得承认,这种荒唐的见解当时让我伤心之极。无论对错,这篇短评还是发表了。这毕竟还是《新路》!当然,我们再没有给《生活

问题》投过任何稿件，尽管我们始终同杂志的全体成员，特别是同别尔嘉耶夫，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但我的第一篇关于勃洛克的文章，差不多也是所有最早评论勃洛克的文章之一，所遭遇的意外还不够典型吗？他写了四年诗，可在刊物上还是那么默默无闻，以致就连谈谈他也不被认为是需要的！

在我这儿，当年所有那些难忘的日子同布加耶夫的联系要多于勃洛克。这联系是外在的，因为，出于一种奇怪的偶然，经常来彼得堡并住在我们家的鲍利亚，每次来都遇上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无论是1月9日，还是10月17日，或者类似的某一天（唉，最后一次是1917年3月1日、2日、3日），都会让我马上想起鲍利亚灵活的身影，那双惊奇和斜视的眼睛，让我听到他独特的言谈，机智而幼稚的话语……鲍利亚什么事情都见过，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东西都明白——当然是自己的见解，而且他的兴奋中掺杂着讽刺。

每次到彼得堡，鲍利亚都要去勃洛克家作客。他是否对我讲过勃洛克？可能。不过我不记得他对我说过勃洛克对一些事件的反应。有一次他给我读了（或是给我看）勃洛克的一首新作，里面将 ниц（“叩拜”）与 царицу（“皇后”）当成同一个韵脚。诗是好诗，但韵脚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迷人之处。

——鲍利亚，您喜欢这 царицу 吗？

他哈哈狂笑，跳得老高，差点儿击起掌来：

——对，对，就是这个 у — у — у！既然是 цариц — у — у — у，怎么能喜欢呢！

你看，勃洛克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琐事中出现在我们之间。

十一

1905—1906 年冬天——我们出国前的最后一个冬天——我记忆犹新，终于，我已是不光与勃洛克，而是与他们夫妻俩经常见面。我们是如何相识的，我不知道，但我记得他们三个人经常到我们家来（鲍利亚又从莫斯科来了），我甚至极为清楚地记得这位漂亮、端庄、高个的女子当时有多么光彩照人。

我们是在 2 月里动身的，很友好甚至很温情地告别了大家。

但出于某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原因，我同他们当中的任何人，甚至同鲍利亚，都没有通过信。就好像断绝了关系。

十二

我们在获悉俄罗斯情况的同时，当然也得到许多有关勃洛克的信息。一方面，知道他发表了一些社会演说，参与了阿·提尔科娃的报纸，只是时间很短，结局有点出人意外。另一方面，也知道他在革命后风起云涌的文坛上声名鹊起——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滑稽草台戏》……

但这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是二手、三手资料。

只是有一回，有几个月的光景，勃洛克终于从一团迷雾中走了出来。至少他的名字开始在我们这儿经常被重复。

有人敲我们的门，白天。

“Monsieur”⑪……我听不懂名字。我走到前厅。那里站着一个人，倚靠着墙，披一件黑色德国短斗篷，一副落难相。是鲍利亚·布加耶夫。

十分意外地出现在我们巴黎的住宅里。

原来,鲍利亚早就开始在国外游历了。一时还弄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所以。他在德国东游西荡——正是东游西荡。从那儿带来了长袜、斗篷和烟斗。如今到了巴黎。脸上没有笑意,像是失魂落魄。不过他说,打算在巴黎逗留一段时间,到底多久还不一定。

于是就留下了。我们在巴黎的房子住不下,他便住进离我们不远的一所很小的寄宿学校,——不用说,我们天天见面。

我插一句:他每天在这所寄宿中学里吃早饭……是跟饶勒斯一道!而且最后,他们相互认识了,甚至经常长谈。我的天——谈什么呢?不过确确实实,鲍利亚·布加耶夫跟谁都能长篇大论。

十三

关于跟鲍利亚在巴黎的这几个月,关于我们在城里的散步和谈话,假如话题不是经常涉及勃洛克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在此讲述了。

我对勃洛克的兴趣,实际上从来没有减少。我很高兴能以某种方式让他也在场(当你想念谁或谈论谁,这个人便始终有点在场的意味)。至于说鲍利亚昨天还是勃洛克狂热的朋友,今天却成了他同样狂热的敌人——没有丝毫意义。

是的,没有丝毫意义,虽然我可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要发现鲍利亚·布加耶夫内心的转折有多么容易,就要了解他。他的内心总是打转,而且转来转去,完全让你无从把握——而这怪不得勃洛克。勃洛克似乎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了解鲍利亚·布加耶夫,理解他,这样才能不把他此时此刻对别人的态度当回事。你听,他在说,他爱一个人。有声有

色和满腔热情地描绘着这个人的形象，而我知道，明天他会对这个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杀了他，或者写一篇文章予以大肆攻击，添油加醋地把他的形象描绘得一团漆黑。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考虑的不是布加耶夫，而是他的爱或恨之箭所瞄准的对象？

不管怎么说，幸亏布加耶夫，我们这几个月才是在勃洛克的氛围中度过的。虽然我对布加耶夫的态度友善之至，但我对他骤然改变对勃洛克的态度并不承担罪责。要知道鲍利亚也是我的"朋友"……同样随时有背叛我的可能。他毕竟是鲍利亚·布加耶夫。

而勃洛克，各个方面都变得较为容易理解，这让我感到更加亲切。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想：多么不同的人啊，这两位"朋友"，两位俄罗斯诗人，他们同属一代，而且也许，还被同一不为人知的命运所系联呢……

十四

又是彼得堡。还是那个房间，还是那盏灯，还是相隔一张桌子的沙发和安乐椅，安乐椅上坐着的还是那个勃洛克。

仿佛过去这几年不曾存在……不，不，仿佛过去的不是三年，而是三十年。

只是渐渐地，我才在勃洛克身上找到旧的、不变的、不能变的东西。从外表看他变化不大。但最初几次见面给人的感觉是我们彼此还有些陌生，还不能完全认得出对方。有些东西已被淡忘。很多东西尚缺乏了解。我们的生活内容不一样。

很快又感觉到一种本能的需要——跟勃洛克讲一种特殊的语言，即绕来绕去。这一点没有变。勃洛克"长大"了没有？他好

像有了些新的说法和观点——“普遍的”……不，这只是表面现象。他说话依旧吃力，慢条斯理，若有所思。而这位如今已大名鼎鼎并深受喜爱的诗人的脸，比从前更呆板了，带有惊诧和疲惫的印迹。还有孤独，不是那种平静的孤独，也不是那种狂暴的孤独，而是一种悲剧性的孤独。

不过，有时他身上有种新的东西在执拗地燃烧和激荡，想要付诸语言——又做不到，这时他的眼睛就会变得茫然，孩子般地沮丧。

勃洛克为我朗诵自己的一个剧本——至今为止他的作品中最不出名的一部。(无论是在书刊上，还是在舞台上，我都不记得它。)我当时的印象是，作品写得很精彩，尽管有些不平衡和程式化，有时近似胡闹。相形之下，他后来的剧本《玫瑰花与十字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个剧本是用散文体写成的。剧名我忘了——我们称之为《法伊娜》，借用女主人公的名字。勃洛克的朗诵跟说话没什么两样：声音沙哑，单调。这反倒赋予他的朗诵一种独特的力量。

很有“勃洛克风格的作品”。我越是往下听，越是更加清晰地回忆起从前的、年轻的、永远的勃洛克。是法伊娜？绝对不是法伊娜，而依旧是那个美妇人，是她，是彩虹姑娘，永远不会是尘世的女性。

> 你走进原野一去不回，
> 愿以你的名字为圣……

不，不是一去不回……

> ……岁月流逝匆匆，

我预感到，你会改变面容。

我不由自主地说：

——亚历山大 · 亚历山大罗维奇，可这毕竟不是法伊娜。这毕竟又是她（黑体）。——对。

还有几页，结尾，我又惊奇和自信地说：

——要知道她，美妇人，就是俄罗斯！

他的回答仍旧很简单：

——对。是俄罗斯……可能是俄罗斯。对。

这就是他身上，勃洛克身上的新东西，它以自己的方式，深刻而痛苦地定型，或说半定型。革命后吹到他身上的“社会气息”没能保持下来。坐在桌边，当着别人面，他在谈话中说过一些“跟大家一样”的话，可他并非“跟大家一样”，对我们当时所抱的相当偏激的情绪，他总要唱些反调。

单独和他在一起时情况会变得更清楚：他在内心为自己培育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俄罗斯——他爱上了她，爱上了自己的爱——“不可言说”的爱。

十五

勃洛克身体不好。晚上，我们到帆船街他窄小的住所去看他。

简练，舒适，朴素。很多书。勃洛克自己在家里就是简练而朴素的。柳鲍芙 · 德米特里耶芙娜，他的妻子，变化很大。她是那么漂亮和高大——对窄小的房间和窄小的茶桌来说，她显得过于高大，总觉得不太协调。昔日的光彩已经消失，那光彩曾使她楚楚动人。

我们知道，这些年她迷上了演戏，下了不少功夫，随私人剧团到俄罗斯各地巡回演出过。不过，我再说一遍，并非这一点改变了她，而且，在这位文静的女子身上，感觉不出想要当演员的迹象。她身上还是有光彩的，但这是另一种光彩，不是先前的那种光彩。她整个变了样。

我还记得我们出国前她的模样，很想跟他们夫妻俩哪怕是建立一种生活或社会联系。应该说，得到官方批准的整个宗教—哲学协会（由从前的宗教—哲学会的残余组成）是在我们离开彼得堡期间建立的。我们当然参加了——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冲突开始之时，恰好是“讨论神的季节”（社会民主党人还杜撰出“造神者”和“寻神者”的荒唐分类）。但我们对人数众多和纯知识分子的协会并不满意。于是我们想建立一个较为私人化，但同时任务又较为宽泛的部门。为了绕过新闻检查机关，我们给这个部门取名为“宗教史研究部”。我们肯定是要吸收勃洛克夫妇加盟的，该部筹备期间，勃洛克到我们这儿来过几次，差点儿成为“注册人”之一。

然而开过几次会以后，他，还有他的妻子，全都失踪了。就连我们这儿勃洛克也不再来了。

有一次我在什么地方碰到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

——怎么在加加林斯卡亚街（研究部在那儿活动）见不到你们？是厌倦了还是因为忙？

我得到的回答天真而又直率，换了勃洛克本人肯定说不出来：那儿的人们谈论的尽是“不可言说”的东西。

这天真的回答里有着无望的真话的影子。于是我们明白了：无论是什么“部”，即便是最完善的，勃洛克都不会参加，也不可能参加。

十六

在这些表面热闹,间或忙碌,内里艰难而又密集的岁月里,我记得勃洛克始终在我们近旁,但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而是在我们的生活附近。我有过见他的需要。显然,他也有——他经常来。但总是一个人来,而且是赶在我们家里没有外人的时候。每次来都呆很久。我们跟他——有时是我单独跟他——时常坐到深夜。他给我朗诵他的作品,或者只是谈话。谈什么?不是谈诗,不是谈人,不是谈他,或者也可反过来说,又谈诗,又谈人,又谈他,是在一种特殊的层面上,作为"最重要的,最后的东西"来谈的——不言而喻,谈话依旧是兜来兜去,迂回曲折。

我们当然知道别人对勃洛克的议论。有人说他"大吃大喝,寻欢作乐"……不,是说他好酒贪杯,经常一个人离家出走,整夜整夜在外游荡。他们很惊讶:他是一个人!这事看似令人惊讶,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如果说这事很重要,那么重要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这里反映出来的勃洛克的孤独、悲哀——还有"不设防"。这是命运所致,还是悲剧所致?

我们之间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何必谈呢?有他的诗。

我们谈论我的时候比谈论他还要少。这方面似乎一句话也没说过。有一次他来了,赶巧桌子上放着即将出版的我的第二本诗集的手稿。勃洛克开始翻看,看得很仔细(尽管每一首诗他都早已知道)。

我说:

——您愿意吗,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喜欢哪些,挑出来,我献给您。

——行吗？我很愿意。

他在桌旁坐了很久。挑了几首。挑的是好诗还是坏诗——我不知道，不过至少是我比较珍爱的。

十七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记得勃洛克变得特别单纯，富于人情味，容光焕发。一般说来，我记忆中的勃洛克从来不笑。如果说他笑过，那也是稍纵即逝，不易察觉。而这段时间我记得勃洛克确实笑了，那是一种关心和温存的笑。嗓音也变了，变得更加热情。

他在等待自己的孩子出世的时候是这样，而在孩子出生后的日子里更是如此。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些对勃洛克关系重大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见到他，他总来（要知道我们在现实生活方面很少联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关心他的妻子，有没有人在那儿给予体贴的照料（有人后来说没有）。我们只是隐约听说过，她要生产了。有一次勃洛克来说，她突然间感到不舒服，他便把她送到医院。“是怎么回事？”我问。“没什么，现在好了。”

没过几天，异常艰难的生产到了。不知为什么，我至今仍记得勃洛克从医院里打来的那些夜间电话。有一天很晚了，终于传来消息：生了个男孩。

几乎此后的每一天勃洛克到我们家来都是容光焕发，面带微笑。孩子很虚弱，中了毒，但勃洛克不相信他会死：“他块头这么大。”勃洛克给他取名德米特里，纪念门捷列夫。

在我们家餐厅喝茶时，勃洛克一声不吭，眼睛显得不同往常，既炯炯有神，又心不在焉。

——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现在该怎样……培养他……米奇卡……

这个可怜的米奇卡出生第八天或第九天就夭折了。

勃洛克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讲述，解释，孩子为什么没能活下来，为什么会死。他虽然只是反复讲述，但从茫然失色的脸上不难看出惊慌失措、难以置信的神情。

还来过几次，随后便失踪了。

过了很长时间，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已经发胖的时候，他们俩来向我们告别：他们要出国。“我们打算稍微休息一下，到别的地方看看……”

两个人的脸色都很暗淡，他们的来访也是多余的，灰颓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是多余的。一个希望破灭了。一扇微启的门关闭了。

十八

或许，有人会大惑不解，莫名其妙：对勃洛克来说，孩子算什么希望？勃洛克会是家长！他是诗人，是永远的骑士，而且，如果他的确“未成年”，那不是再好不过吗——永远的少年？就算他的儿子活下来了，他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这只会使他失去更多。这也许会使他陷入家务不能自拔……

对这样的推测很难做出回答。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勃洛克自己本能地感觉到了孩子能带给他什么，他又是多么需要这些。而孩子能够带给他同生活的血肉联系和责任心。

尽管勃洛克是个不同凡响的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个有着强烈的心灵痛苦的人，但我还是要再说一遍——他不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的“未成年”跟自然的、充满活力的、快乐的少年

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可是永远在生活附近行进？这可是无穷无尽的孤独？在孩子身上勃洛克感受到怀着宁静的温存触及生活的可能性。可能，生活跟往常一样，不会以丑态百出回报他。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父亲的身分，而恰是在于新的感觉，即责任感，能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勃洛克是否像我现在写的这样清楚而草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然不是。可他曾被一个希望所照亮。一旦希望熄灭，他也就随之熄灭了。重新陷入自己“什么都不明白”的痛苦中，比以前更为深重的痛苦中，因为他不明白的还有一个问题：怎么会既给人以希望又剥夺人的希望？

十九

勃洛克的独特使我们很难用通常的语言对他做出判断。说他聪明，就跟令人发指地说他愚蠢一样是错误的。他学识并不渊博，但喜欢读书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并不是形而上学者，哲学家，但非常喜欢历史，善于研究历史，有时为之倾注巨大的热情。但我重复一遍，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独特的、生硬的和出人意料的。当时，社会问题特别尖锐。他是否超然于社会问题之外？当然，大家把他看成不问政治的诗人并准备“为诗歌”而原谅他的一切。但他尽管游离于许多知识分子集团之外，却有着自己的社会见解。这些见解就总体而言是不够明确的，就部分而言是清晰无误的。

曾几何时，发生在我们和勃洛克之间的冲突，正是基于这一土壤。这些冲突是转瞬即逝的，确实：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事业，他到我们这儿来是只身一人，而且我们极力回避这些问题。不过有时冲突是很激烈的。这些激烈的冲突我记不清了——

关于最后一次冲突，也是最主要的一次冲突，我下面还要谈到。

有时勃洛克完全不露面。一个阳光明亮的傍晚，我们回家时顺路去勃洛克家。

这是一套整个雪白的、路灯般明亮的住宅，在石岛街的一栋新楼里。跟加列尔纳亚街上的那套真是天差地别。

出来迎我们的是他的妻子。勃洛克还在睡觉。他回来晚了，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对我们解释说，直到早晨才到家。过了一些时候他出来了。从来没有的苍白，安静，呆板。我们坐了没多久。路灯般明亮的屋子里让人觉得很暗。

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美妇人那永远留驻、永远变化的面容：

夜晚，餐馆上空的热气
显得如此荒凉而野蛮。
春天腐烂发霉的气息
不时发出醉意的叫喊。

…………

每天晚上，在约好的时间，
(也许我不过是在做梦？)
都见一位裹着丝衣的少女
在朦胧的窗子里闪动。

她在酒鬼之间从容走过，
总是只身一人，不须陪伴。
她香气四溢，云缠雾绕，
款款落坐在窗台旁边。

她的富于弹性的丝衣
散发出一些古老的传说，
纤细的手上戴着指环，
宽檐帽上嵌着服丧的羽毛。

…………

我灵魂深处有个宝藏，
它的钥匙只归我一人。
你是对的，酩酊怪物，
我知道：真理在酒中。

《陌生女郎》无人不知。但又有谁读透了这首诗？再请看另一首诗中的两行，可怕的和预言性的：

哦，我会倒下，既卑微，又惆怅，
假如我没有战胜那些致命的幻想。

恐怖的预感——“你会改变容颜”——要成为现实，但还远未成为现实。“她”穿着黑色的衣裙，不是白色的，且“她”既非在夜晚的河畔，亦非在彩虹下面，而是“在酒鬼中间”——啊，这还不算太可怕。这还不算完。

二十

由于我写的是我眼见的那个勃洛克，故关于他，关于他的生

活的所有故事会自然而然地从叙述中脱颖而出，至于真实不真实，谁能搞得清楚呢？

他的朋友和敌人鲍利亚·布加耶夫（如今已经最后定下来叫安德列·别雷）好像早已又成了他的“朋友”。但我不大清楚他们之间的新关系，因为战前的最后几年我们跟别雷也很少见面：他娶了莫斯科的一位小姐（谢·索洛维约夫娶了这位小姐的妹妹），旅行了好长时间，最后成为施特纳博士的狂热信徒，携妻子追随他移居瑞士。有一次路过芬兰（当时施特纳在赫尔辛基），别雷来看我们。胡子刮得精光，秃顶（从前那头柔软的金发荡然无存），可实际上还是依然如故：不是走路，而是跳舞，坐在地毯上极其可笑而又可爱地乜斜着眼睛，依旧口若悬河——只不过这次讲的是施特纳博士和人智学。而主要的是，感觉得出，他和从前一样对自己和自己说的话不负责任，一分钟都不肯做出担保。枯燥乏味。

这几年的冬天我们跟勃洛克建立了很正确的、大概也是很亲密的关系。跟平常一样，他每次都是一个人来。如果是白天，就留下来吃午饭，晚上走。

为编书来索要过几次诗——他很突然地开始积极参加《对三只橙子的爱》或《怪鸟西林》的编辑工作。

我是个低产的诗人，因此，到我这儿找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不想拒绝勃洛克。于是我跟勃洛克一起动手翻检旧稿，看能否找到什么被遗忘的东西。即便找到了（即便是在我的书里），还是会遇到新的困难：需要抄写。这时勃洛克表现出毫不迟疑的牺牲精神，他坐到我的书桌旁，一动不动，直到全部抄完，有时比需要抄的要多：例如，偶然发现的我的一首从未发表过的诗《饥饿之歌》，写在一张纸上，就是勃洛克亲手抄的。勃洛克已经出版了《玫瑰花与十字架》，打算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

搬上舞台。《玫瑰花与十字架》使我大失所望。勃洛克刚开始构思时，向我详细介绍过这个剧本。它本来可以具有相当的魅力和深度，可写出来的东西却比构思逊色。勃洛克清楚这一点，所以没跟我提起剧本。我不想再议论它。

二十一

每年春天我们都到国外去。夏天回来——可勃洛克已去了自己在乡下的庄园。有时给我写信。而秋天我们又开始见面了。如果一两个星期不见，我们就打电话，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一说就是几个小时。勃洛克迟缓的话语在电话里显得更加迟缓。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说第一声“喂！”，他沉重的嗓音对听筒回答：“您好！”那嗓音是无法跟任何人的嗓音混淆的，还有那绵长的、时断时续的话语。我拿着听筒的手已经累了，但这从来不是闲聊，我从来不觉得枯燥乏味。我们争论过，有时竟然忘记了彼此还有空间相隔，忘记了彼此是看不见的。道别时，就跟约会完了一样。

二十二

战争。

我很难将对勃洛克的回忆同对这暴风骤雨般的头几个月和几年的回忆分离出来。因为生活变得十分复杂。战争震撼了俄国知识分子，制造了新的集团和新的分野。

我记得，战争爆发后我跟勃洛克的初次“见面”是通过电话。我不想——也无法在电话里谈论战争，于是谈话很快结束了。但勃洛克兴奋的嗓音，他的一句话，使我大吃一惊：“要知道战

争——这首先是令人高兴！”

了解勃洛克的人，很难期待他会对战争持否定态度。可怕的是，他会迷恋上战争，会陷入当时的许多诗人和作家都陷入的极度战争狂热。他的“高兴”已经令人难堪。

不过我要马上告诉大家，这样的事在勃洛克身上并没有发生。他没有成为那些顽固不化的人的朋友。如果执意要给勃洛克贴标签的话（而所有的标签贴到他身上都会脱落），那么，除了“黑帮的”，拿什么标签都不可能接近他。就这一样已经迫使他“接受”战争。但对俄罗斯的爱，甚至不是爱，而是一种对她的富于牺牲精神的钟爱，一种无限的柔情，拯救了他，使他幸免于对战争的“陶醉”。骑士的宠爱……要知道，俄罗斯当时对他来说，就是“她”，面孔千变万化的“美妇人”……

二十三

我们的见面开始变得有点少起来，而且根据默契，都避免谈论战争。一旦无意中谈起，总要争论。然后争论又会中断。一遇到有些人所谓的勃洛克的“黑帮活动”，还有些人所谓的勃洛克“不问政治”，我们就像碰了壁。

对我来说，这是“不负责任的悲剧”。我想，还是不涉及这件事为好……

初春的时候亚历山大剧院应该上演我的剧本《绿色的指环》。（萨文娜[12]，梅耶荷德等人推出这出戏的经过本身很引人入胜，也很能说明问题，但跟勃洛克没有关系，故此处从略。）勃洛克早就知道这个剧本，他见过手稿。不知何故，他特别喜欢。

排练在进行。我一次也没能赶上。排练安排在早上，只有一次偶然安排在晚间。有人送来了通知，当时勃洛克坐在我们家。

我对他说：

——您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去。您跟我去，再送我回来。若不愿意——就让梅耶荷德生气吧，我不去了。

——他们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勃洛克带着玩笑似的担心问，并当场答应一同前往。

是2月的光景。还冷，但雪已不很多。我们驱车在平坦而昏暗(战争!)的谢尔吉大街上急驶如飞。我似乎在说服勃洛克不要为《海湾》(一本新的季刊)写稿。然后我们过街进入剧院。我不相信剧院，它是否会必然歪曲剧本呢？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您对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上演的您的剧作满意吗？

勃洛克不吭声。然后坚定地说：

——不满意。那是侮辱我。

似乎，他也不相信剧院。

在昏暗的大厅里，我跟勃洛克不声不响地看完了整个演出(有萨文娜的第三场没排练过)。当然，这是瞎胡闹。习惯了扮演情人的男演员们不会扮演中学生。当一个男演员面对他意料不到的吻(大意如此)，竟突然开始东张西望，甚至探视窗帘后面，勃洛克悄声对我说："这简直是淫秽作品!"演得最好的是罗辛娜—伊萨罗娃。但就连她勃洛克也不满意。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他给她递了张字条："请教勃洛克。他会给您很好的指点。"

好像，他们后来谈了很久。

梅耶荷德挨了当头一棒。他把所有男演员集中到休息厅，把他们狠狠训了一通。我跟勃洛克则回家喝茶。

二十四

勃洛克没有去前线。1915—1916 年冬他深居简出，写了很多东西。而这个冬天在我家里，每逢星期天，总是聚集了很多青年——大多数是诗人：他们的人数陡然增加了许多。一个带来了另一个，另一个又带来两个，如此膨胀——趁你还未来得及想到要做一定的削减。勃洛克送来另外一些人，总要给这些人一块地方。勃洛克对我的聚会很感兴趣，经常在星期天晚上打电话来。

跟平常一样，他总是没有人的时候来。有一次白天，在我们家偶然碰上了马利亚·费奥多罗芙娜(高尔基的妻子)。她从不到我们家来。显然，这次是因有事，是为一个集子吧——我不知道。这几个冬天我同她和高尔基在不同的人家里间或见过面(高尔基还到我们家来过——差点提议出版我的诗集，但给我们阻止了)。

高尔基的妻子，后来成为掌管工兵代表苏维埃剧院的勤勉的"委员"，不过眼下还只是一个年纪成熟的预备演员，犹如焦躁不安的波涛，到处冲击。

我见到她与勃洛克在茶桌旁相对而坐。还没过五分钟，她便拿出她相当温和但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借用高尔基的话——见解来冲击勃洛克。

勃洛克才说出四句话，她已说出五六十句。这显然让他很恼火，于是本来很平静的交谈变得越来越激烈。

马利亚·费奥多罗芙娜噼里啪啦，滔滔不绝地说："您有什么理由不同意，莫非您真的不了解形势，另外还有社会……另外还有政府……新闻检查机关不允许……诚实正直的人士……而它……他们……把他们……它……"勃洛克像只木锤一样固执

地敲着桌子:“就应该这样!就应该这样!”

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个场面相当精彩,然而,等这一场面结束,马利亚·费奥多罗芙娜离开以后,我们只是自由自在地叹了口气。

她走了,但勃洛克仍固执己见。他仍在继续重申自己的观点,寸步不让。看得出来,她败坏了他的情绪。我们极力要彻底扭转话题。但不记得,成功了没有。

二十五

以阿·格利高里耶夫⑬诗选序的形式发表的勃洛克的长文,让我感到如此伤心,如此痛苦,以致我觉得无法保持沉默。文章是原则性的,触及的问题很有当代性,而且,我认为,也很重要:作为人,诗人,艺术家和作家不负有责任。勃洛克以格利高里耶夫和洛扎诺夫为例,力求肯定这种不负责任,并对恪守“清规戒律”扼杀了格利高里耶夫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指责格利高里耶夫无所关心,立场多变)和新知识分子的偏执——针对洛扎诺夫——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抨击。顺便把《新时代》和对洛扎诺夫的公民道德和人的道德不闻不问的老头子苏沃林(这个最典型的俄国虚无主义者)也赞扬了一番。

勃洛克的文章里还有很多东西。我的回应文章也一样(后来收在《火光集》中),其实质可以概括为两句诗:

你可以不做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人。

当然,我决不会不跟勃洛克打招呼,就把文章拿去发表的。

我和他约好——这是 1916 年的晚春——见面的时间。一个明亮、温暖、发蓝的晚上，他来了。我记得当时低矮的窗户是敞开的，窗外是谢尔吉大街，附近的栅栏后面是塔夫里切斯基公园春天的树丛。

这个充满意外的傍晚令我难忘。当我们还坐在饭厅里时，旁边的前厅响起了门铃声，接着一个陌生的、哭得跟泪人儿似的姑娘跑了进来。她朝我扑过来，哽咽着说道：

——救救我……他们要把我带走，骗人……您写了《绿色的指环》……您会明白的……

她朝敞着门的饭厅瞥了一眼，突然大叫道：

——啊，勃洛克在您这儿……他也会救我，帮我的……我求您了，别把我交给他……

勃洛克走了出来。我们俩都莫名其妙，不知所措。这位勃洛克也不认识的姑娘显然神经不正常。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但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他"，姑娘的哥哥，走了进来，很温和地劝她跟他一起——回家(是他说的)。我们合力劝慰她，总算把她送走。

后来才搞清楚，这个姑娘尽管确实神经不正常，但她躲避哥哥时说的话，并不完全是假话。这是个令人难过的故事，为了节约开销，兄弟几人要把她送进医院……令人难过的故事。

可我们又能做什么？一个人救得了另一个人吗？

我们不由自主地伤感起来。就是没有这件事，我们内心仍充满惆怅和不安。

这一切好像是在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夜晚，春天的时辰。
一个疯狂的女子在前厅哭泣，

为了什么事情而恳求我们。
然后我们坐在暗淡的灯下，
灯光将薄薄的烟雾染成金黄。
而入夜的，敞开的窗户
反射出湛蓝的光芒。

在我的工作室里，在这“暗淡”的灯下，勃洛克不慌不忙地，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细长的烟卷，听我念完我的措辞相当激烈的反驳他的文章。我想从我们两人身上扫去这次见面的空洞的伤感。最后是争论，发火，生气……

争论有过，但就连这争论也是伤感的。勃洛克先是反驳我，然后又突然默不作声。过一会儿他谈起另外一个问题——其实还是原来的问题，只不过他不直说，而是跟平常一样——“兜圈子”。

我也不想说了。是的，这一切就是如此，不能不要求每个人都是人，我也不能不要求勃洛克这样，然而……太痛苦了：我既力不从心又欲罢不能。此时此刻软弱和柔情要求的是不可能的东西：但愿不可谅解的一切像勃洛克一样得到谅解。就像有什么事情会因谅解而改变！就像勃洛克自身不曾承受他不可谅解的东西，他的悲剧！

我们坐到很晚，不知不觉天已放亮。似乎我们从来没有谈得这么安静，这么亲切，这么难受。

甚至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在清新的花园旁边，他还停了下来，于是我们又交谈起来，谈花园，谈春天，又跟在夜里一样，说话悄声细语——我家的窗户很低。

你走出门，在栅栏旁停下，

我与你隔着窗户交谈。
而幼嫩的枝条在天空的
衬托下,显得比酒还绿。
笔直的马路空空荡荡。
我不会原谅你。你心地纯洁。
我不会原谅你——永远。

1916年秋从乡下回到彼得堡时,我们得知勃洛克不是在前线,就是在离前线不远的城乡联盟里服役。关于他,传来的都是好消息:精神饱满,工作积极,脸晒黑了,经常骑马……他母亲告诉我,对他的来信很满意,尽管很短——没时间写。

二十六

我也许太过拘泥与勃洛克见面的细节了。但关心勃洛克的人想必也会对细节感兴趣。现在把剩下的讲完。

革命期间。就在最紧张激烈的一天,而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刻(普罗托波波夫机关枪开始从房顶朝我们的窗户扫射,子弹忽而从院子里,忽而从马路上呼啸飞来),鲍利斯·布加耶夫——安德列·别雷突然出现了。他从瑞士回到莫斯科已有一年,一个人,说是响应号召回来的,但没有去前线。跟一个阴险的人——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掌握的一家出版社联系上了,在他那儿写过什么东西,去过皇村他家。这一天,他若无其事地乘火车从宁静的皇村回来,一下火车,踏上革命城市的街道,他立刻惊呆了。穿着到脚的皮大衣,步行三个小时,才算勉强走到我们家,一路上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忽而蹲在墙角下,忽而趴在雪地上,躲避子弹。走不动了,只好留在我们家(另外也害怕出

门)。

这些天,我又看到别雷手舞足蹈的步态,惊异地乜斜着的眼睛,还有他的口若悬河,谈笑风生:"对对对,如今的俄罗斯旗将成为红旗?真的?真的应该让它变红?"由于我的日记已经遗失,故我无法确定这些天的日期,但很快,革命后没多久,过了不是一个星期就是两个星期,勃洛克就来了,系着使他完全变了样的男式围裙,情绪激昂地在我宽敞的房间里阔步行走。他是从前线,或者说是从他的驻地——离西北战场不远的地方回来的。

在匆忙而快乐的日子里,这一切都是快乐而匆忙的,人来人往,聚散无常——记住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但穿着高筒靴、挺拔地系着围裙、生硬地在我的地毯上阔步行走的勃洛克,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还有他反复念叨的那句话:

——现在该怎样……更好地为他们……俄罗斯人民……服务……

他的脸上没有光彩,不时地现出茫然和困惑的神情。周围的一切已经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勃洛克的脸,那张同样茫然、只是要年轻些和光亮些的脸,还有他的话:

——现在该怎样……培养他……米奇卡……

当时只是在头脑里一闪,而如今,当我陷入这段回忆时,我感到害怕。或许,这里也为勃洛克敞开了希望之门?是否太晚了?

二十七

到了我关于勃洛克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好像他又去了服役地。后来我们到高加索去了几个星期。在那儿收到了别雷从

莫斯科寄来的两三封信。跟通常一样，这些信既疯疯癫癫，又才情横溢，只是带有一种令人不快的风格和倾向。他兴高采烈地说起社会革命党人。还做出种种模糊但讨厌的预言。又能要求别雷什么呢？他永远是夸张的，或是传奇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返回彼得堡。科尔尼洛夫事件——这次事变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离我们这么近，因而，我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缠绕着它的谎言（这谎言至今还未消散）。我们见过勃洛克没有？可能仓促间见过。我之所以说可能见过，我想，是因为我秋天打的那个令我震惊不已的电话，是一次简单的行动，似乎并不是开春以来的第一次接触。

末日，崩溃，瓦解——已不仅仅是预感，也是现实的感觉。我们全都处于流亡之中。为之奈何，妥协，沉默，等待？人人都在尽己所能，设法自救。不能不自救。在科尔尼洛夫之后脱离政府的萨文科夫，在筹划一份反布尔什维克报纸。他成功地团结了一批正派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知名作家都同意予以支持。很多人都是委托我邀请的。如果说向勃洛克发出的邀请稍微延迟了一点，那恰好是因为，我对勃洛克是深信不疑的。

这一切发生在 10 月初。晚上，空闲的时候，我拨通了勃洛克的电话。他当即拿起听筒。我匆忙、简要、准确地（毕竟是打电话）解释是怎么回事。我叫他来我们家，参加第一次会议。

停顿。然后：

——不，我大概来不了。

——为什么？您太忙？

——不是，这样的报纸我不能参与。

——您说什么呀！您不同意？究竟是怎么回事？

通话的间歇我猜想着出了什么事，可猜不出来。我做了一大堆荒唐的假设。可就是猜不出来。

又传来勃洛克沙哑的声音。他的语速比平时略快，听上去有点生气：

——还在打仗。战争不能再继续了。应该议和。

——怎么……议和？单独议和？现在跟德国人议和？

——是的。我热爱德国。应该与之签定和约。

我手里的听筒差点掉到地上：

——您……不想跟我们一起干……您想签定和约……您莫不是支持布尔什维克？

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荒唐。而勃洛克的回答是(他是非常真实的，从来不说假话)：

——不错，如果您愿意，我更支持布尔什维克……他们要求和平，他们……

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可俄罗斯呢?！俄罗斯呢?！

——俄罗斯又怎么了？

——您支持布尔什维克，忘记了俄罗斯。要知道俄罗斯在受苦受难！

——得啦，俄罗斯并没怎么受苦受难。

我喘不过气来。这太意外了。勃洛克出人意外之处很多，但就是这件事不该。我心平气和地说：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我知道，鲍利亚能做得出来……假如他去支持布尔什维克，我会理解。可要知道，他是一个“迷路的孩子”。而您！我无法相信，您……您！

沉默。然后又突然传来他判若两人的声音：

——可万一我……我也是一个……“迷路的孩子”呢？

这些话，我跟勃洛克的最后一次通话，简直要把我的耳朵炸开：

"俄罗斯并没怎么受苦受难……我更支持布尔什维克……万一我也是一个'迷路的孩子'呢?"

当然,我不会去扩散灾难。冬天过去了。还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可怕和耻辱的冬天。是的,就是这一点人们通常会淡忘,而这恰是应该记住的:布尔什维克是俄罗斯的耻辱,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即便是用俄罗斯仁人志士的苦难和鲜血也洗刷不掉。但我的俄罗斯啊,即便是这样的,你对我来说,仍比所有的地方都宝贵。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诗句是勃洛克在布尔什维克出现之前很久写的,而且"这样的"并不等于(在这首诗里)"布尔什维克的"。但这样就能聊以自慰吗?毫无疑问,勃洛克支持他们。显然,别雷也支持他们。两人都在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这个叛徒——不知他是左翼社会革命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西徐亚人"出版社写作和工作过。

听说,他们俩还自愿在一些不同的机关里工作过。勃洛克跟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共事。他的《十二个》就是在这个"西徐亚人"出版社发表的,长诗意外地以率领着十二个流氓赤卫队员的基督形象结尾,轰动一时。人们喜欢的是,赤卫队员共有十二个,他们是新的使徒。早在勃洛克活着的时候,就产生了一大批研究这些使徒的论著。有可能还请教过他本人是如何理解走在十二个赤卫队员前面的这位出人意料的基督的。也有可能他没告诉他们,"因为这是不可言说的"。布尔什维克可不会为不可言说为难,他们很乐意利用《十二个》。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

我们要让资本家吃尽苦头,
把世界性的大火燃起。

就连红军战士也厌倦了，更何况世界性的大火虽然煽过，但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

我们还见过更大胆的标语，也是摘自《十二个》：

> 哎，别胆小！
> 让我们瞄准神圣的俄罗斯开火！

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甚至不愿意听到勃洛克的消息。有些是因痛苦不愿意，而又不由自主地经常想听到。说实在的，不能把亵渎神圣全怪罪到他头上。他不懂亵渎神圣。更主要的是，他并不明白，他在此有所不懂。他无处不特别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什么都不明白"——感觉很敏锐，可偏偏就在这里，在宗教旁边，没有感觉到——感觉迟钝了。迟钝并不是他的过错。我们能要求勃洛克怎样呢，既然"最富基督教精神的人智学家"别雷这时都写了长诗《基督复活》——作品没能取得成功，不过就亵渎神圣的可怕程度而言，勃洛克的红军战士无论如何无法望其项背。

想到别雷，感到的是怜悯和鄙夷。想到勃洛克，感到的是怜悯和痛苦。但不总是这样。亵渎神圣——算了吧，何必对他要求这么高，他从来就不懂，也没有谎称他懂。可他的美妇人呢？他的陌生女郎呢？他的法伊娜——俄罗斯——"齐眉的花头巾"——他的爱呢？

说到这儿，我感到的已不是痛苦，而是对勃洛克的愤怒。

> 啊，我会倒下，既卑微，又惆怅，
> 假如我没能战胜致命的幻想！

二十八

我们想，苦难已经达到极限，而我们的日子还像节日。我们希望该死的旅途早日结束，可它，十恶不赦的，几乎还没有开始。布尔什维克，既不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也不了解俄罗斯人民，对自己缺乏自信，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合法性没有把握，却还是胆怯地把爪子伸向各种东西。他们在试探，发现没关系，胆子便大了起来。巧取豪夺。

例如，1918 年春他们只是有意查禁所有的刊物，但还没有决定下来（后来，过了一年，他们哈哈大笑：我们却像傻瓜一样与之客气）。反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当时也没有别的知识分子，个别例外独木难成林——表现得更加愚蠢，差点儿打算用"言论"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不错，这言论虽受到压迫，但毕竟还是自己的。可他们没有料想到，它是很容易被消灭的啊。

在被消灭前的一个月，有人建议出版我的一本篇幅不大的诗集，都是战争与革命期间写的。这本小册子，《最后的诗》，异常快速地排印完毕，好像是在一家军事印刷厂，然后整版卖给了某个人——不过，书还是随处可以买到的，当时书店还存在。很快这个集子被推荐为"禁书"。

现在说说我为什么要提及这件事。

这本新的、白色封面的小册子，收入了一些明确反对勃洛克"朋友们"的诗作，故我很难坚持不送给勃洛克一本。我想，毕竟还是有人固执地不相信布尔什维克是勃洛克的朋友。要知道，这简直不可思议！

我的一位年轻的女友——我身边还有许多友好、诚实的年轻人——主动要求去给勃洛克送书。没有信，只是第一页上有献

给他的一首诗:“这一切似乎是在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夜晚,春天的时辰……”“你的心地纯真。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我有些感到良心的责备……“不会原谅”——可书还是要送给人家?我是否还有所指望?指望什么?

得到勃洛克的回复后,我真的感到没什么可指望的了。

几本薄薄的、潮湿的书……长诗《十二个》,当然,还有《西徐亚人》。外加出版者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序言……最好别提它。其中一本的封面上,写了一首直接给我的诗。最好也别提它。我不记得它,只记得,勃洛克从未写过如此庸俗的东西。说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或者类似的话):“您——注定是绿眼睛的女河神在爱尔兰的礁岩下戏水”(?),“我”(不记得是什么)“注定要高唱《国际歌》……”

不,当然,当然不是这样的。我把几本小册子藏起来,决不再看。够了,联系的桥梁被炸毁了。

又过了几个月——就像几年。

二十九

我坐在从涅瓦大街开出、沿花园街行驶的有轨电车上。有轨电车暂时还在,其余的东西几乎一无所有。早已没有什么报纸了,除非官方的。杂志和书籍则是荡然无存。风平浪静。

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力变得日益严酷,使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愿,尽快离开彼得堡,到那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去。相信:已经没有了。(而如果是——还没有呢?)

反正都一样,理想——绝对的理想使人不得安宁,向往自由。

秋季的一天,阳光明媚。我跟一位年轻的女友乘车去看另一

位女友:这另一位女友过命名日,今天是旧历九月十七日。

我和 Ш 并排而坐,脸朝向千疮百孔的商场。有轨电车已经坐满,到干草街那站时乘客只好站在过道上。

第一个上车并站在过道上的人恰好是站在我旁边,他突然说道:

——您好。

这声音无法跟别人混淆。我抬起眼睛。勃洛克。

制帽(是制帽,而非鸭舌帽)下面,一张瘦长、枯黄的脸。

——您能把手伸给我吗?

他缓慢地说,跟从前一样吃力。

我向他伸出手并说:

——从个人角度——可以。只是从个人角度。不是从社会角度。

他吻我的手。沉默片刻:

——谢谢您。

又沉默片刻:

——听说,您要走了?

——有啥办法……要么死,要么走。当然,跟我们处境不同就另当别论了……

他沉默良久,然后特别忧郁和清楚地说:

——死在任何处境下都是可以的。

突然又补充道:

——要知道,我很爱您……

——您可知道,我也爱您。

有些空下来的车厢早就在倾听这奇特的一幕。我们没有害羞,说话声音很大,尽管别人都在默不作声。我不知道,旁听的人会怎么想,但勃洛克的神色无疑是那么凄惨(这段时间他与生俱

来的悲剧性变得大概人人都能看得出来），以至这一幕在他们看来也是凄惨的。

我站起来，我要下车了。

——再见。谢谢您把手伸给我。

——从社会角度讲，我们之间已不存在联系。您知道，永远……但从个人来说，我们仍一如既往。

站在他面前时，我再次把手伸给他，他再次垂下枯黄、病态的脸，慢慢地吻我的手。"谢谢您"……我站在泥土路面上，而车厢从一旁驶过，依然看得见随我走到车门口的勃洛克，看得清他身上那件深色的……对了，是深蓝色的衬衫……

完了。到此结束了。我们在人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让人高兴不已的是，我想补充几句。

去世前几年的勃洛克我没有见过。但有两三个人，我相信他们的眼睛如同相信自己的。因为我相信，他们像我一样是勃洛克的朋友，像我一样对勃洛克"苦涩的堕落"感到痛心疾首。其中一位，就天性而言跟勃洛克一样忠诚和真实，甚至严厉地责备我把《最后的诗》送给勃洛克：

——您为何要这样做呢？

我把自己仅仅局限于——故意的——这些人的不容争辩的见证，仅仅局限于他们的所见所闻。

而他们见到的是，勃洛克在慢慢反抗，似乎他在精神上复活了，悲剧以胜利告终。他从谷底崛起，甚至可能达到了那些不曾堕落、保持坚定信念和敏锐目光的人所未达到的高度。然而勃洛克，在目睹和看穿那些欺凌、侮辱和戕害他的恋人——他的俄罗斯之后，已经不能不走到底。

我们当中能否找得出一个信念无比坚定、目光无比敏锐的人，虽身陷彼得堡的囹圄，仍不肯做出丝毫的妥协，不肯向高尔

基委屈求全，不肯吃敌人手里的草皮？我知道这草皮——该死的口粮——的滋味，我知道。翻译无用的谁也不需要的小说换来的苏维埃钞票的哗啦啦的响声——我也知道。

而勃洛克，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放弃了一切。他完全沉默下来，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他恨自己的长诗《十二个》，不能容忍别人当他的面提起它。趁还走得动的时候，他乘车出城，离彼得堡一站地的地方，一呆就是一整天。回来，还是不说话。他知道他要死了。可是——据说——他不肯从凶手的手中接受任何东西。他已经卧床不起时，亲人们只能骗他。他真的是在气喘吁吁了——终于没有透过气来。

我不想涉及细节。总有一天会为人所知的。在此我只想说，他以伟大的痛苦和死亡不光赎回了自己所有有意无意的过错，或许还部分地洗刷了俄罗斯的耻辱和罪孽。

> 任凭群鸦发出声声哀鸣，
> 盘旋在我们的眠床上方，
> 那些当之无愧者，上帝啊，上帝，
> 将进入你的天堂！

令人欣慰的是，他成了这些当之无愧者中的一员。令人欣慰的还有，他永远是我们的，我们今天的人，以及未来的、复活的俄罗斯，可以欣悦地爱他，活着的勃洛克。

1922

译注：

① 奥·米·索洛维约娃(1855—1903)，翻译家和画家。勃洛克的表姨妈。

② 符·索洛维约夫(1843—1900),哲学家,诗人。

③ 米·谢·索洛维约夫(1862—1903),教育家,翻译家,符·索洛维约夫的弟弟。

④ 鲍·布加耶夫(安德列·别雷)(1880—1934),诗人,小说家,文学理论家。

⑤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诗人,作家,批评家,政论家,季·吉皮乌斯的丈夫。

⑥ 维·康·普列维(1846—1904),内务部长兼宪兵司令(1902—1904)。

⑦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1857—1914),俄国内政部长(1904.8—1905.1)。

⑧ 谢·尼·布尔加科夫(1871—1944),经济学家,神学家,哲学家。

⑨ 尼·阿·别尔嘉耶夫(1874—1848),哲学家,宗教思想家。

⑩ 格·伊·丘尔科夫(1879—1939),作家,诗人,批评家。

⑪ 法语,先生。

⑫ 玛·加·萨文娜(1854—1915),演员。

⑬ 阿·阿·格利戈里耶夫(1822—1864),诗人和文学评论家。

一个如痴如狂的人——回忆勃留索夫[1]

> 但在征服人人的同时，你也被征服：
> 忽而绿色，忽而红色，忽而粉色，忽而黑色。

世上没有什么比"人"更有意思。真正的，活生生的，由自然、历史（或神）创造出来的人。但自然（或神）的创造异常细腻，复杂，它的花纹不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作家们在塑造虚构的人物——典型时，也是在向不具理解力的读者诠释"人"。他们有意强调一些细微的特征，使之粗糙化。他们加强个别心灵的声音，或用另一心灵的相似的声音对之加以补充。他们浓墨重彩地挥洒，渲染，就像制作布景一样。这是一项庞大的事业——可以做得才华横溢，可以做得平淡无奇。

我的"现实生活故事"不诠释"人"。我讲述的是我亲眼所见，留下印象的真实的人，真正的人。这人有名与否，才华出众与否，没有关系。要知道，作为人，那些最不出名、最不显眼者往往会比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更有意思。

我写的只是那些在这个世界上我已不指望与之见面的人——这要么是因为他们超越了尘世的界限，要么是因为他们超越了对我来说不可逾越的人的界限，如布尔什维克勃留索夫，以及其他人。不过，我要重复一遍我在回忆勃洛克时说过的一句话：写活人也好，写死者也罢——都要说真话。写活人也好，写死者也罢——都要有所保留，对那些荒诞不经的真实，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要尽量回避。回避并非歪曲形象。但不要涉及"个人秘密"。"个人秘密"应该而且不管怎样都将永远是秘密。

诗人瓦列里·勃留索夫——好像是从 1918 年起——是共产党员。不仅如此：他马上进入了布尔什维克新闻检查委员会（我不知道他们那里叫什么），还差点儿成为委员会的主席，宣称自己是一个严格、严厉、严酷的新闻检查官。我们还在的时候他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为什么会成为共产主义者》，只是没有见识过，说实话，我也不感兴趣：只要对作者稍有了解，不看书也能猜得出来瓦列里·勃留索夫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

我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也从未有过内心的亲近。有过这一切的影子和表象。在漫长的岁月延续中，我们经常见面，有几个时期还在同一些刊物中共同工作过。跟讲述勃洛克一样，讲述他时，我将仅限于与他的直接交往——当然是尽可能这样。如果说我同勃洛克的关系内在的多于外在的，那么，同勃留索夫，甚至不能说是相反，而只是单纯的外在的关系。不过，勃留索夫的外在面貌特征非常明显，细加观察不难看透，因此，我对这个独特的灵魂的本质做出的判断未必是错误的。

勃留索夫在肉体上还活着。然而，就他目前在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的状态来说，平心而论，我和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因为我在人间再也不可能见到他了。所以，从过去的时光中唤回（既然是唤回）他的影子——是一件完全适时的事

情。

我还要补充一句：作为诗人，勃留索夫同样死了。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合乎逻辑的。也只能是这样。谁若不信，就请他看看勃留索夫不久前在莫斯科出版的诗集：岂止是写得不好，简直是难以置信——文理不通。

一

很久以前，好像是1895年的夏天，《北方信使》编辑部收到一本小书《杰作》。类似的薄薄的小册子；取名还有更不谦虚的，编辑部当时收到一大堆："颓废派"的年代嘛。确实，最近几年，纯粹意义的"颓废派"已经趋于式微。未来的枝杈，象征主义，还处于发芽状态。索洛古勃刚刚开始发表他的古怪而清晰的小说，新的，同样清新的诗。

《杰作》毫无疑问是颓废派作品。一切都是为人所知的，"故意的"。突然，一首诗引起了我的注意。此诗名为《疯子》，内容我不记得，好像是说这个疯子坐在桥下，或是类似的什么东西。

我对编辑部多疑的评论家们担保说，这是一首不错的诗，作者"显然不无才气"。

——他是谁？名字好奇怪。莫非是笔名？让人想起伽普祖克的日历：勃留斯预言什么年……

不久我便得知，"勃留索夫"并不是笔名，而是真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莫斯科人，出身中等商人家庭，在莫斯科似乎已受到关注。在莫斯科还感觉不到"颓废派"的衰落，它眼下正如日中天。

文学的莫斯科和文学的彼得堡彼此间始终判然有别。并不是说时间上不同步：莫斯科绝对不是"跟"在彼得堡后头，相差一

个节气。不,这差别要复杂得多,有时甚至无法判断。普遍的生活节奏不同,气度不同,趣味不同。很多东西莫斯科挖掘更深,历时更久。彼得堡则更为敏锐,更为审慎。

二

收到诗集《杰作》以后,很快又收到另外几本署名勃留索夫的书。"颓废派"没能突破大约二十首诗的局限,烟消云散了。偃旗息鼓了。而勃留索夫还在不倦地写作和发表。同所有"颓废派"诗人的际遇一样,勃留索夫没能被那些大型的杂志接受。《北方信使》虽是例外,但它在彼得堡。

这些年,在 1900 年以前,我们很少去莫斯科,认识勃留索夫是在彼得堡,我们家里。

一个谦虚的、令人愉快的、彬彬有礼的青年。不过一眼看上去,他并不显得年轻——他当时已有一圈不大的黑色络腮胡。身体像树枝一样异常纤柔。他那身扣子系得严严的黑色常礼服,使他显得愈发纤柔。乌黑的眼睛,不大,眼窝很深,两眼之间的距离很近。不能说他英俊,也不能说他不英俊——不管怎么说,他有一张有趣的脸,一双生动的眼睛。只是如果细加观察,客观地稍加思索,你会惊讶地发现他跟大猩猩有相似之处。不错,距离很近的双眼和有些沉重的下巴确实给人这样的印象。

他的谨慎和礼貌讨人喜欢——好像他并不是"莫斯科的颓废派"!很快我们便发现,他其实文化修养很高,聪明过人,而且好嘲笑别人。

当时,他并没有摆出什么姿势,无论拿破仑式的,还是恶魔式的。是的,说实话,在我们面前,就是后来他也没有摆过什么姿势。外表上拿破仑式的姿势——两手高高地交叉在胸前——后

来成了他的习惯。但就连这一点我记得也更多地是在勃留索夫无数的画像上。在私人约会中他是非常朴实的，从不皱起天生有些高挑的眉毛，从不卖弄自己。他的男高音，略带几分年轻店员或莫斯科商人儿子意味的男高音，对他过分纤柔的身体来说，倒也合适。

三

他开始经常来彼得堡。每次会见过后都令人更加明确地感到：此人不是等闲之辈。除了出色的才华和独特的头脑，他还有敏锐的感觉和——顽强的精神。是顽强的精神还是坚定的意志……这一点很难做出判断。

没过多久，勃留索夫就同年轻的波利亚科夫一道，创办了《天平》杂志，俄罗斯第一本新型杂志，虽然还属"颓废"，却是文化性质。围绕这本杂志和与之相关的《天蝎》出版社，开始聚集年轻的力量，所有被传统的俄罗斯"大型杂志"公平与不公平地"拒之门外"的人。

勃留索夫是"颓废派"，但他也是"古典派"：他是普希金专家，被遗忘的丘特切夫和被忽视的费特的崇拜者。他不知疲倦地致力于俄国诗歌宝库的研究并将之从"自由主义习性"的废物堆中解放出来，像他说的那样。在他的主持下，"天蝎"出版社开始出版集刊《北方之花》，取这样的刊名是为纪念普希金的《北方之花》。

然而除此之外，勃留索夫还向往"欧洲风格"。他希望在新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的相应倾向之间建立联系。

当然，并不是勃留索夫创立了文学中的新流派。新流派是自己自然而然生成的。颓废派，象征主义（勃留索夫与它的衔接并

不紧密)“纯艺术”原则,最后是对“欧洲风格”的向往——这一切都是为反对确实导致了文学贫乏化的别林斯基和皮萨列夫继承者们的多年统治而进行的必然革命。

旧的框框被打碎。这中间有过很多丑陋的,不必要的——但也是没有料到的东西。年轻的工作者当时都是来自千差万别的社会阶层。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勤奋。而论这些和工作能力,再加上非凡的敏锐和机智,勃留索夫无疑是相当出类拔萃的。他有资格在新的文学流派中占据显要的一席,他当时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然而,他出身的环境和氛围,对他选择的路线并不是太有利。作为莫斯科一个瓶塞厂厂主——而且是个破了产的厂主——的儿子,为了受到体面的教育并成为一个“欧洲人”,或者像一个“欧洲人”,他不得不花些力气。但勃留索夫的勤奋、机智的头脑和专心致志的意志力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品质都在忠实地效力于他。

四

问题是,勃留索夫绝对是个虚荣心极强、功名心极重的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找不到更有力的词来表达将勃留索夫搞得神魂颠倒的那种狂热的“利己主义”、严格的自我约束、对君临一切和唯我独尊的强烈渴望。这里除了神魂颠倒,无法用别的字眼来形容他。

这一点在他身上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癫狂掩饰得几乎无懈可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隐藏着勃留索夫最为真正的疯狂。

说起掩饰,只要勃留索夫想掩饰什么,他会掩饰得很巧妙的。即便是最平凡不过的狂人,也善于掩饰自己的癫狂。而勃留

索夫，天生机灵绝顶，只要不发作，他会表现得相当理智，深沉，喜欢冷酷而辛辣地讥笑别人，也能很好地把握自己。（我说的是最初那些年月的勃留索夫。）他看人看得很准，知道在什么人面前系多少扣子。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他身上有一种疯狂的东西。但疯在哪里，狂在何处，却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人们把不时地闪烁在深陷的、距离很近的两只眼睛里的火光，当做诗人神圣的疯狂。勃留索夫当然一点也不反对这样的感受。他甚至不反对在可能的地方、可能的程度上加强这一印象。他的“恶魔式的”姿势和种种其他姿势都是由此而来。

虚荣心可以只是诸多欲望的一种，且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也可以是局部的：文学的虚荣心，战争的虚荣心，演说家的虚荣心，乃至爱情的虚荣心。如此，别的欲望才能与之和平共处，自身仍旧保持欲望的本色。例如，战争的虚荣心丝毫不排斥对女人的欲望，或者说，文学的虚荣心丝毫不排斥对美酒的欲望。可勃留索夫的“虚荣心”是一种如此充沛的欲望，以至能包罗生存的所有方面，成为——实际上也的确是——他的唯一欲望。

他爱艺术吗？他爱女人——他的这些“mille e tre②”吗？当然不爱。他能用什么去爱呢？吞噬一切的欲望，唯一的欲望，把女人、美酒、扑克牌、工作、诗歌，甚至自己的诗歌，只是变成一系列的手段，手段，手段……到头来就连勃留索夫本人（不管这有多么离奇）也要成为它的手段。只有它才是目的。

在他达到成就的顶峰时，一些愚蠢但又敏感的人说：勃留索夫是个冰冷的诗人。即便是他最“热情”的诗作，也仍然是非常寡情的：控制他的不是爱俄罗斯。他需要的是所有，所有 mille e tre 的爱。而她们自己，连同她们的爱本身，没有一个是他需要的。他需要的只有手段，手段……

关于这颗烧毁的心里残存的——发育不全的——人的情

感，我留待后面说。而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五

勃留索夫唯一的神秘欲望的“秘密”并不是一下子揭开的。只是随着我们见面的日益频繁，“庐山真面目”才逐渐显露出来。

我跟《天平》和“天蝎”的关系一度相当密切。我甚至记不清我在这个杂志上总共用过多少个笔名。

去莫斯科时（我们已开始经常去那儿），我们一般都在“斯拉夫集市”下榻，并专挑窗户与“大都会”饭店隔院相望的房间住。《天平》编辑部就设在“大都会”。当时“大都会”尚未完全建成，当然也没有开业。每天晚上，一见到熟悉的窗户亮了，我们便马上过去。我笑着说：你们的编辑部是莫斯科最新、最有文化的一角。说它最新，一点不假：这是这家还没有开业、还空空荡荡、散发着泥灰味儿的现代化大饭店最先装饰完毕的几个房间。编辑部里窗明几净，典雅气派。从那些漂亮的物件、书籍和绘画来看，波利亚科夫不愧是个有钱人，勃留索夫不愧是个“高手”和“欧洲人”。茶是用当时还很少见的电茶壶烧的。（假如有谁能早点儿告诉我，就是这个勃留索夫，几年后要“燃起世界性的大火”，“要让所有的资本家吃苦头”，那该多好！不过，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此之多，直让人觉得世上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也去过勃留索夫家。他已成家。他似乎很早就结婚了。他的妻子，一个矮小的女人，波兰人，平常得出奇。如果说她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的话，那恰是她的平凡。

然而，这样的惊奇却是无根据的，因为她实在是一位出色的女性。可不是！要知道，这是唯一一位让勃留索夫爱了一生的女人。尽管出于虚荣心，他曾疯狂地渴望情场得意，别有用心地追

求女人，有过不少mille e tre，体验过不少悲剧，有时甚至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但从人的角度，他倾心所爱的却只有这个不起眼儿的女人——他的妻子。他从未跟她闹过离婚，甚至很少分开。有好几次，她因难产而险些死去，这时就见勃留索夫成天愁眉不展，简直跟换了一个人似的。顺便说说，这爱也是我们唯一目击过的他的一场悲剧的起因。但这件事我们放在后面谈，它发生的时间要晚多了。

那时，即1901—1903年间，勃留索夫住在茨维特诺伊街心花园一幢"私房"里。也就是住在从他父亲的房子中分隔出来的一套不大的住宅里。

这儿已不是《天平》编辑部摩登风格的电茶壶，而是古老的莫斯科。敲大门时要叩门环，然后要沿着过道，在积雪之间，穿过院子。深色的木头楼梯，冻得发硬打滑的楼梯板。里边——窄小的房间烧得很热，但地板上却冷飕飕的。《天平》编辑的风格和藏书——旁边是折好的餐巾和纱布窗帘。

勃留索夫在讽刺挖苦别人方面，永远是机智俏皮的，而且，他的机智俏皮有时同诽谤纠缠不清。但在自己家他特别活跃，热情，周到，表现出莫斯科人特有的好客性格。总的说来他还是个莫斯科人，别看他追求"欧洲风格"，甚至还有几分"世界主义"的姿态。

长期以勃留索夫为灵魂（他还是主席）的著名的莫斯科"小组"，在1901—1902年似乎尚未完全到达极盛期。我们每次到莫斯科，梅列日科夫斯基都不是在"小组"里，而是在某个大学教室中做报告。

有一次，梅列日科夫斯基做完一场报告后，校方设晚宴款待我们。宴会安排在"斯拉夫集市"的餐厅里，桌子很大。出席宴会的全是白发长须、派头十足的教授，但瘦削而年轻的勃留索夫也

在他们中间。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尼·布加耶夫教授,数学家,秃顶,令人愉快。让大家惊讶不已的是,他整个晚上都在谈论鬼神。他大声笑着,讲他如何被鬼拉在马车上,以及他生平中另外一些无疑是碰到鬼的事。

接着是勃留索夫朗诵诗。他从桌边站起来,开始亮出他的男高音,而且调子越拔越高:

> 我长久为奴,逆来顺受,
> 侍奉着世上最美的皇后。
> …………
> 突然有一天她勃然大怒:
> 要对侮辱神圣者无情报复!

勃留索夫的朗诵一阵一阵的,呼吸短促。当他的高音转化为歌唱性的呐喊,例如在这首诗的结尾——

> 但这一夜我记得!我记得!

他的嗓音会变得近乎女人。

六

很自然,由于控制勃留索夫的只有一种欲望,因此,他什么艺术都不喜欢,也不可能喜欢。然而,如果说他"认为有必要"承认老一辈艺术家,研究他们,甚至对他们顶礼膜拜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同辈作家(非作家也一样)则是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抱着绝对蔑视的态度。不过天生的机灵使他能够在与人交往时表

现得特别灵活，精明过人。在与勃留索夫的交往和交谈中，即便是一个不算笨的人也能容忍他对所有的人的蔑视(也是活该!)。是的，所有的人——除了他自己。要知道，同某某一道谩骂所有其他的人，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优雅的阿谀逢迎。而勃留索夫甚至从来用不着“谩骂”，他总是半明半暗，点到即止，虽只恶毒的三言两语，但被他谈论的人会立刻变得一钱不值。而与之交谈的人，不知不觉地被勃留索夫的“信任”迷惑，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是他的同道。

跟那些虽然不算笨，但却不很高明的人打交道，这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喜欢勃留索夫的清楚明白。我也喜欢他故意遮掩、始终如一的对别人的蔑视。没有这一点，他的形象将是不够完整的，不够艺术的。

七

莫斯科，布列斯特火车站。“天蝎人”送我们出国。

我们又跟勃留索夫聊了起来。聊的是诗。对了，不是抽象的诗论，而是具体的诗技。跟勃洛克我们几乎从未有过这样的谈话，跟勃留索夫则是习以为常，而且始终谈得很“专业”。

我们在设想，能不能将韵脚押在行首，而不是行尾？或者这样，把韵设在每行最后一个词的前音节，而不是后音节？

不知何故，后来回想起这种游戏时我有种负疚感。《天平》发表过我的几首诗，共同的标题是《不恰当的韵脚》。不用问，我没有把它们收到我的书里，只是勉强还记得：

……Сквозь цепкое и леп-кое

Скользнуть бы с Ча-шей……
По самой темной ле-стнице
Дойти до сча-стья……
(……真想捧着杯盏
穿过粘着和有弹性的事物……
沿着昏暗的楼梯
直抵幸福……)

就是这一路数的东西。另一次还要有意思些。我们挑选了一些“孤独的”词。这样的词很多。要知道,竟然找不到押“真理”的韵!不过我们俩决定还是再找一找,想一想。我什么恰当的东西也没想出来。我的一首半戏谑的诗(写给索洛古勃的)是这样写的:

……………………………извлек
Воду живую из-стены;
Только не знает мудрец и проро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ины.
(…………从墙壁中
提取活水;
只是智者和预言家不知道
自己的真理。)

而勃留索夫却写出了一首具有惊人的代表性的诗。这首诗对他来说如此具有代表性,以至我要将其中的八行全部摘录下来。诗是献给我的,韵脚算不上特别成功,但问题不在这里:

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早已不再相信。
我爱所有的大海，所有的码头，
从无半点儿偏心。
我愿自由的航船
能够在处处航行，
无论魔鬼，无论上帝，
我统统予以称颂。

当然喽，称颂上帝还是魔鬼，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愿意——而且能够——你也可以只称颂你自己。谁在此时此刻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最适合，就称颂谁好了。

关于“自由的航船”，这不过是装腔作势，凑韵罢了。一个被完全勃留索夫式的欲望所控制的人能有什么自由，或者哪怕是关于自由的想法和概念呢？

八

日本战争与革命期间，我们同勃留索夫很少见面。我们忙于清理《新路》，一本在最近一个时期将我的精力从《天平》转移开的杂志。

勃留索夫当时是成功地开始了对革命的“讴歌”呢，还是聪明地保持中立，等待观望——我一无所知。这期间我们只见过他一次，很仓促，是在彼得堡，维·伊万诺夫[③]的家里。此后不久我们去了巴黎，在那儿一连呆了两年半。但在巴黎我与之通信最积极的正是勃留索夫。于是重新开始了跟《天平》的频繁合作（我甚至还有他们发的记者证）。

在莫斯科(还有彼得堡),这时正是“文学复兴”期和文学繁忙期。《天平》遇到了几个新对手,如《金羊毛》以及其他一些“美学”杂志。另一方面,安德列耶夫的创作也进入了鼎盛期,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景观(高尔基在此要稍逊一筹)。

勃留索夫机智而刻薄的来信使我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天平》的立场是积极主战的。

就在这时勃留索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诗人的散步》(我的评论文章当然不是发表在《天平》上,而是发表在《俄罗斯思想》上)。就实质而言,这本书既没为勃留索夫增加什么,也没使他减少什么。只是解释了一些已知的东西——对我来说。散文能使作为人的诗人失去遮拦。散文不比诗歌,在散文中,诗人用以藏身的“灌木丛”要少得多。

无论是在永远属于幻想性质的短篇小说里,还是在半历史半幻想性质的长篇小说里,勃留索夫都是依然如故,他执著一念的依然是那个唯一的神秘欲望,此外对什么都兴味索然。幻想,更主要的是色情,加以绝望的渲染,是勃留索夫为自己的糊涂套上的衣衫。通常语言叫做“内容空洞”,而美学语言叫做“无倾向性”的东西,勃留索夫全都具备。但这恰好表现了他的糊涂,他严重的——绝对是对一切——漠不关心。

> 我爱所有的大海,所有的码头,
> 绝无半点偏心。

——虽然他已准备好“讴歌”随便什么事,什么人,但还是要伺机而动。

讴歌所谓的“爱”欲,色情,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勃留索夫在这一方面的冷漠即便是在他的诗中也能充分感觉到。可在难

以藏身的散文里,他却无节制地、绝望地突出“情爱”场景,将之几乎变成了死亡墓地。这是不是恋尸癖呢?

再说,谁也没有勃留索夫这么多的——诗。在维 · 伊万诺夫的“星期三”晚会上——那是我们同勃留索夫在 1905 年的唯一一次会面——出了一桩滑稽事。

出席晚会的是当代诗歌的“精英”(不过,也有非精英)。文学的唯美主义当时正处于危机关头——受没有成功的革命影响。热闹的场面有些像是发了疯,紧张激烈,但又肆无忌惮。后来又部分地蜕变为淫秽作品。

“星期三”晚会规定,不管是已经成名的诗人还是初出茅庐的诗人,朗诵完自己的诗作以后,听众必须依次当场提出自己的看法。批评不讲情面,尖锐程度甚至被夸大。但这种批评涉及的主要是形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专业诗人批评青年诗人,但谁都不生气。

索洛古勃[4]一动不动地坐着,很少发言。他似乎没有朗诵任何作品。而勃留索夫,轮到他的时候,朗诵了整整一组恋尸癖性质的诗。一开始,诗的内容甚至让在场的一些勇敢的革新家大吃一惊。但很快大家又恢复了常态,而勃留索夫“大胆地”用他的男高音朗诵的、以勃留索夫式的高超技巧制作的诗,获得一片恭维。轮到索洛古勃了。一声不吭。于是全都一声不吭。主人热情而固执地一再请求“费奥多尔 · 库兹米奇”发表高论。又是片刻的沉默。终于——索洛古勃开口了,周围鸦雀无声: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没有经验。

这话很恶毒,特别是他说话的语气。主人马上满脸堆笑,机智地开了几句不太成功的玩笑,敷衍过去。但勃留索夫,我想,肯定听出了索洛古勃的弦外之音——而且忘不了。

九

返回俄罗斯不久,我们就去了莫斯科。《俄罗斯思想》当时交给彼·斯特鲁威⑤,基泽维特⑥,弗兰克⑦等人主持。革命后新闻和报业热闹非凡。规模不同的新刊物层出不穷,老刊物则在力求推陈出新。文学丛刊空前繁荣。

我们在彼得堡为一家大型期刊已经遭遇过一次相当愚蠢的失败。我们想跟库斯科娃⑧和波古恰尔斯基⑨小组联合从当时的拥有者瓦西列夫斯基-涅布克瓦(他当时第一次出面是跟格尔热宾一起——提起他就伤心)手中买下这份刊物。涅布克瓦把刊物卖给了我们(连同一份每周一出版的报纸),可第二天(就是第二天)便欺骗了我们,一句承诺也没兑现,害得我们只有垂头丧气,无可奈何,还是没有自己的刊物。

此后不久斯特鲁威邀请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主持《俄罗斯思想》的文学部,为了认识编辑部的同仁和熟悉我们的职责,我们来到莫斯科。

莫斯科的热火朝天比彼得堡更让我们惊讶。不说沃兹德维仁卡街,《俄罗斯思想》有条不紊的编辑部:那里要相对安静些。但《金羊毛》,《金牛星》,还有《天平》和"天蝎"忙得不亦乐乎的地方,简直就是闹市。这里的一切变化真大——至少是在我看来——无论巨细,皆今非昔比。

我们不是住在"斯拉夫集市"光线昏暗的老房间里,而是住在"现代享受"招牌刚刚开始发脏的"国家"饭店。一大早,便开始接待来访者,作家,编辑。而且我很快就明白了,最好每个人都单独接待,因为你搞不清楚谁跟谁有仇,——大概人人都不好对付。

还是说说勃留索夫吧。他也变了。神经质,好冲动,动作幅度很大,比以前更恶毒,更爱挖苦人。原来,他是没有见到《金羊毛》的编辑,那人到我们这儿是来过又走了呢,还是该来还没来——我忘记了。谈起勃留索夫同这位编辑的决斗。这件事安德列·别雷也掺乎进来了,他充当的是决斗的"公证人"还是其他什么角色——我不知道,也想不起来了。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团乱麻,也没有心思把它理清,还是保持原样吧。

再说"小组",如今已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大俱乐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报告做完后,那里安排晚餐,平时也是这样:报告,晚餐,然后又是报告,又是晚餐……

勃留索夫离开了茨维特诺伊街心花园和父亲分给他的住宅,积雪的后院里的那间木厢房。他如今舒服地住在苏哈辽夫卡对面富丽堂皇的大楼底层里,房间里是红色的墙壁和叫不出名的吊灯。一切都今非昔比。只有勃留索夫的妻子没变。还是那么文静,平稳,不可动摇地坐在自己的位置——勃留索夫永远的妻子的位置上。一般说来,跟其他名人一样,名作家的妻子往往都是"忠诚"型的,特别型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甘愿"服侍天才",眼睛里只有他,爱他至死不渝,从前今后什么都原谅,什么都不计较。勃留索夫的妻子有超越这一切之处。忠诚——不用说。宽宏大度——不用说。但首先——她是"永远的"妻子。她的安稳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无论你走多远,有一点是雷打不动的:她和勃留索夫在一起。世界可以崩溃,但勃留索夫最终会留下,同她长相厮守。

怎么说呢,她是对的。只要她现在还活着,我绝不会怀疑勃留索夫跟她在一起。

《天平》已走向衰落。晚上,我跟勃留索夫乘马车走在特维尔大街上。他对我详细介绍了波利亚科夫(出版家),《天平》和"天

蝎”的状况……很快《天平》确实销声匿迹了。《北方之花》丛刊支撑得要久一些。

十

主持一家在另外一座城市出版的刊物的文学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很高兴能吸收勃留索夫这个莫斯科人。不过，让他负责的是诗歌。勃留索夫费心给我寄书，供我写文学评论用。编辑部寄来的手稿(散文的)乱七八糟，有时简直令人绝望。感觉得出来，工作还没理顺。不久我们跟《俄罗斯思想》的事便完全闹僵了。

都怪我们。根据条件，我们的职责限于审读小说来稿，可我们竟忽然想起要给编辑部提供一些我们认为够格发表但又不是纯小说的作品。另外，不该忘记，我们的超越“艺术”的观点同杂志编辑的观点并不一致。

所有这些人我们早就认识。我们尤其了解彼·斯特鲁威，这个聪明可爱、才华横溢的人，这位……作家？教授？记者？政治家？学者？怎么称呼他？他似乎始终在做那些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事，也不是主要的事，但做什么都做得非常好。早在他和图甘-巴拉诺夫斯基[10]还是“俄国首批马克思主义者”时，我们就认识他了。光阴荏苒，可斯特鲁威实际上还是依然如故：有点固执，难打交道，注意力分散，看问题深刻，还有——非同寻常和绝无仅有的直率。从脱离马克思主义开始，他做过多次转向，然而，凭借他的直率和认真，他恰恰具备转向的本领：他从来不在原地“打转”。

在我现在所写的那个时期，他不是转向了我们的轨道。我们跟他保持过——至今仍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关系，后来我们

甚至还密切配合，共同探讨同一些问题，但具体的合作，尽管是办杂志，要求的却是另一种程度的密切配合，——当然，如果这种合作不是纯粹流于形式。

弗兰克，特别是基泽维特，跟我们关系较为疏远。

我再说一遍：错误在我们一边：我们不应该超越“文学”的樊篱。

不过，导致我们之间第一次冲突的勃洛克的《三套车》是“文学”还是“非文学”呢？我认为是“文学”，甚至是高雅的“文学”，不是转义的，而是直义的。但“小说”可以称为“高雅”的，而勃洛克的《三套车》的形式是“文章”。它是抒情的——这反而糟糕，因为既然这是“文章”。文中讲的是俄罗斯——这就更加糟糕，因为涉及俄罗斯的文章就是涉及政治的文章。也就是说，要看一看，这种政治是否符合刊物的政治。根本用不着费脑筋，这不是明摆着的嘛：无论怎样“抒情的”政治都不符合刊物的要求。

勃洛克在宗教—哲学协会的第一次（我们回到彼得堡后）会议上宣读了这篇文章。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文章非常清新，有力。但《俄罗斯思想》却不肯发表它。

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尽管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的职务被解除，不再主持文学散文，只剩下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我还是当每月文学评论员。

我们的副手勃留索夫开始正式走马上任，但他实际上是在分担斯特鲁威本人的工作。关于这种共同的工作，勃留索夫后来每次跟我们见面都要说起。他牢骚很多。这并不奇怪。两个如此不同的人——勃留索夫和斯特鲁威——竟能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这才奇怪呢。

十一

论对诗的外在理解的精细程度，勃留索夫是无与伦比的。他驾驭“风格”和形式的才能（奇怪的是，如今就连这一才能他也丧失殆尽）使他竟然像做游戏一般出版了一大本模拟女人口吻、署名“奈丽”的诗集。这当然还是从前那个勃留索夫，在色欲方面反应冷淡（因而也寡廉鲜耻），天生内容空洞。不过，借助外在的技巧，他伪装得相当巧妙。

论对诗的内在感觉和趣味——这种感觉和趣味应该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勃留索夫可谓一无所有。我可以举出很多事例证明这一点。试举一例。

有人介绍了一位青年诗人给我。此人个子不高，皮肤略黑，有点驼背。他是那么谦虚，那么胆怯，以致读起诗来只是勉强听得见，而且双手冰凉，汗津津的。以前我们对他一无所知，谁介绍来的我也忘记了（可能是他自己来的）。我对青年诗人一般来说是不大信任的。他的诗远非完美，但我觉得，它们无疑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跟我每天不得不耐着性子听的数以十计（如果我不给拦住的话，还会数以百计）的篇什毕竟不完全是一路。

用我们当时话来说，这小伙子的诗“还有点东西”。

我私下里断定，这个男孩不无才能，便自告奋勇，要把他的诗拿去发表（这似乎是我生平第一次主动帮助别人）：“比如，可以给《俄罗斯思想》——我要寄给勃留索夫。”

答复并不是很快，而且，更有甚者，回信是另有原因。信中的口气是嘲弄的，漫不经心的，粗鲁的：至于说到您的“有才能”的小伙子，我可以告诉您，我这里同样有才能的，甚至比他更有才能的小伙子，在莫斯科比比皆是。我奉劝此人不要投稿……还有

一些诸如此类不大好听的话。

然而这个小伙子却异常迅速地成为一位诗人，并且不管怎么说，是一位得到公认的诗人，论形式的精致典雅，他甚至可与勃留索夫比肩。这便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1]。

勃留索夫1909年1月曾经送给我一个漂亮的、皮面的笔记本，用于写诗(我后来把它带出了苏维埃俄国，从1909年开始，我的诗全记在这个本子上，如今虽然已14个年头，还是没有写满)。第一页上有勃留索夫很长一段亲切而又客气的题诗。这首诗后来发表在什么地方。无论它如何客气，我都认为，它跟我的写作完全不相干。我自然是同情勃留索夫同辈所有同仁的遭遇的：他与他们交往时，或客气，或粗鲁，全是随机应变，他似乎谁都瞧不起，而实际上，他是目中无人，视而不见：他并不觉得需要注意别人，没功夫。

不过，在应约为《俄国文学史》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勃留索夫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的一首诗的头韵，不厌其烦地对其中的辅音和元音做了相应的统计……

我们的会面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半。我们仓促间听说，勃留索夫病了一场，又康复了，但变得神经质，过着急风暴雨似的生活，而且滥用麻醉品。

当这段相当长的时间过后，他第一次顺路来看我们，他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不由得回忆起当年那个年轻人：身体纤柔如树枝，留一圈络腮胡，出言谦虚谨慎，举止老成绵软，稳重而又自信，稳重而又尖刻。而今……这就是勃留索夫？不过，回忆一闪即逝。我已经认出勃留索夫——就是同不久前相比，他外表的变化也实在是太大了啊。

他坐在饭厅的餐桌旁。不停地吸烟(这竟然是勃留索夫！)，青筋暴起，瘦骨嶙峋的手(这竟然是勃留索夫！)抖得那么厉害，

以致他把烟灰撒到了桌布上,茶杯里,然后开始撕扯桌布的一角,再然后又离开座位,开始在窄小的饭厅里胡乱地踱来踱去。他的脸又黑又瘦,一双黑眼暗淡无光——否则会在眼窝里突然间放出奇怪的光芒。络腮胡已经斑白,头上也开始长出白发。他是那么焦虑不安,以至坐在他旁边的人也变得焦虑不安起来。

他一个劲儿地说啊,说……一个劲儿地埋怨斯特鲁威。为《俄罗斯思想》的事情他来过不知多少趟了。他们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他们发表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斯特鲁威亲自处理文学稿件。把勃留索夫当成编辑的听差。勃留索夫决心已定,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他将辞职。他,勃留索夫……他,斯特鲁威……

我显然已经想不起来斯特鲁威错在何处,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些令人不安的冲突。也不可能有谁会想得起来,因为这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为勃留索夫的焦虑不安担心,建议他既然如此,还是辞职为好。

——我要辞职,我要辞职。

勃留索夫反复说,可他没有辞职。又从莫斯科来了,又在我们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埋怨斯特鲁威: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要辞职……

我们逐渐习惯了勃留索夫的新外貌,而他在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似乎也变得稍微心平气和些,从前那个尖刻而又机智的勃留索夫好像又回来了。

当然,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内心的东西。不光一次也没触及过我们整个小组所关心的,在宗教—哲学协会有着广泛反映的那些问题,其他问题也从未触及。我们只谈文学,就连这文学也只是限于事务性质,主要是关于《俄罗斯思想》和斯特鲁威……

至于斯特鲁威,对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当时所关注的宗教问题,应该说,他是涉猎很深的。他甚至还是协会的理事。理事会

里有左派和右派。后来，当两派斗争激化且左派取得了胜利（由贝利斯案件[12]引起的关于将瓦·洛扎诺夫[13]开除出人数众多的宗教哲学会的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斯特鲁威和他的集团脱离了理事会。斯特鲁威原则上反对把社会因素乃至社会道德因素纳入宗教领域。

我是无论如何想也不会想到要跟勃留索夫谈这些的。在遥远的“颓废主义”年代，他一有机会便对“自由主义者”表示轻蔑甚至仇恨。不过这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可后来——我不记得勃留索夫对任何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发表过意见。我们也从未听说他跟别人在什么场合明确涉及过普遍问题。一只玻璃罩扣在他头上。他于是便停留在这只玻璃罩下，在自己唯一的欲望的没有空气的空间里。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要问一问：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活人还是死人？

没有人，从来没有：他的手腕太高明，太善于掩盖自己灵魂、思想和内心的苍白。

十二

我故意略去了别人对我讲述的有关勃留索夫及其生活的一切。这类讲述我也很少能记住。要知道，你永远难以辨别其中的真假——不论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意义的事实不言自明。至于说勃留索夫开始在各方面放纵自己，但在哪方面都不能完全沉浸下去，最后便尝试麻醉品，听起来倒也合乎情理，不得不信。爱情悲剧呢？可能，爱情悲剧都是根据勃留索夫所固有的模式发生的，而其数量并不令人感兴趣。

但有一次我们听说，莫斯科有位年轻的女诗人，一个文静的姑娘，开枪自杀了，而且这件事跟勃留索夫有关。

详细情况我不记得,也可能是并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报界。

听到自杀的消息总是不好受的。不过我,很抱歉,很少想到勃留索夫。他是无辜的,即便他有错:因为他毕竟感觉不到自己的过错……

不久传来消息说,勃留索夫要来彼得堡,对此,我丝毫不感到吃惊:我们彼得堡知识界准备为顺道来访的客人维尔哈仑[14]举行欢迎会。勃留索夫跟维尔哈仑关系很好,当年差点去他家作客。由于崇尚欧洲,勃留索夫同外国作家一直保持着积极的联系。安德列·纪德[15]甚至给《天平》写过文章。

显然勃留索夫是为维尔哈仑而来。他说忙,没时间到我们家来,宴会上见。

可就在宴会前夕,勃留索夫出现了。当时只有我们几个人在——我、梅列日科夫斯基、费洛索弗夫[16]。时间是吃饭前,已经点了灯。

勃留索夫进门的样子,看人的眼神,还有他的脸,让人一见便知:这完全是另一个勃留索夫。这才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且是处于最后的绝望中的人。正是因为那天我们见到了一个富于人性和痛苦不堪的勃留索夫,感觉到了他的亲近,我们才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关于这次会面我不想多说。我只想提些个人看法。勃留索夫是否像感觉的那样有过错?当然不是。但他被自己的过错,被这个姑娘的死刺痛,或许笼统地说,被死亡刺痛,这是第一次。这悲剧的确是爱情悲剧。她爱他,相信他的爱情。当她明白过来勃留索夫爱的并不是她,她便寻了短见。

勃留索夫当初也是这么对她说的。临死前她说不想活了,要见勃留索夫,勃留索夫没信,所以没去,等再见到她时,她已经死了。

然而够了。我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人们能够理解勃留索夫所受的“刺激”和痛苦,对勃留索夫这样的遭遇,任何一个真正的、深沉的人,都会感同身受的。

在如此特殊的、绝无仅有的时刻,勃留索夫也感觉到了我们的亲近。有可能,这种亲近助了他一臂之力。

不用说,他当时并不是为维尔哈仑而来:他是为了“逃避”才来到彼得堡,他真想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人独处,与世隔绝。我不知道,还有谁在他来彼得堡期间见过他。至少他自己没有出席过一次宴会。

他也再没有到我们家来。过了一段时间,收到莫斯科的一封信,还不是勃留索夫式的:温馨、深沉、亲切。可随即又音信杳无。好几个月以后,当我们在家里再次见到勃留索夫时(差不多是在大战前夕),他已经恢复了常态:依然苍老,依然神经质,依然用他那颤抖的手一根接一根地点烟,依然高傲而又不屑地对《俄罗斯思想》的事情发泄着满腹怨气。眼睛里又闪射出昔日疯狂的欲火。

十三

很多人都有“猴子”,甚至可能每一个稍微出众的人都有自己的“猴子”,只不过我们不常把他们放在一起观察而已。我说的“猴子”绝对不是模仿者的意思。不,我说的是一种现象:第二个人会突然重复第一个人,在变形镜中反映第一个人。这种扭曲的重复,可怕的漫画式的相像,不是人人都看得出来的。这不是粗糙的相似。它源远流长。“我嘲笑我的猴子。”《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对韦尔霍文斯基说。的确,渺小空虚、卑鄙下流的韦尔霍文斯基是一只“猴子”。伊万王子的“猴子”,斯塔夫罗金的“猴子”。

他们仿佛并不相像吗？不，相像。猴子的作用是揭穿和解释。

魔鬼为勃留索夫臆造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猴子（而魔鬼是精通滑稽的）。勃留索夫不是斯塔夫罗金，不是伊万王子，他的猴子也不是韦尔霍文斯基。而且生活会减少清晰度。

勃留索夫的猴子是伊戈尔·谢维里亚宁[17]。

如果我们将勃留索夫最基本的特征取下来，换上谢维里亚宁的经过零碎处理和漫画处理的相应特征，便可以做成一个完整的游戏。魔鬼甚至是太过努力了，把他们俩拉得过于相近，把谢维里亚宁的形象雕刻得过于像勃留索夫。他把谢维里亚宁也造就成了"诗人"，而且也是"革新家"、"流派的创立者"……在勃留索夫出道25年以后。

勃留索夫聪明地对自己的家庭严密封锁，闭口不提，而谢维里亚宁则对自己的所有方面都喜欢曝光。要知道，他是专门为揭穿勃留索夫的秘密而被造就的。他对同时代人统统不屑一顾，可他把这阉割得一干二净的同时，竟然丝毫也不担心和怀疑自己的面目有多么可笑。他完全不喜欢也不承认"任何普希金"，但一有机会便大声声明这一点，他的声明甚至使人生厌了。不过在此他又不能完全放弃朝勃留索夫挤眉弄眼：如果说勃留索夫"认为需要"喜爱普希金和丘特切夫，那么伊戈尔"承认"的则是——米拉·罗赫维茨卡娅[18]（好在她也死了）。但他忠于自己，又抛出一个秘密：勃留索夫不是做不到，可就是一次也没说："你们真好看，不承认我和丘特切夫"或是"不承认我和普希金"。伊戈尔呢，在谩骂支撑着上流社会的某些诗人的"读者"和"崇拜者"时，还加了一句说明：

而我和米拉——被冷落在一旁！

勃留索夫的"欧洲情结"以商品推销员的形式，扭曲地反映在伊戈尔身上。这位天生的商品推销员，还没来得及在人间走一回，便饥不择食地摆出一副"洋腔洋调"。"他们想炫耀自己的修养。"契诃夫笔下的小市民说。

伊戈尔跟勃留索夫一样，知道"色情"永远是适时的，永远是有用的和重要的。"您是那么狂热，您如同神秘的面纱……"他尽力这样说——内心同样很冷淡，只是勃留索夫病态的紧张及其"色情"的可怕的死者的冷淡在伊戈尔笔下转化成一种不冷不热的、"冰状糖果"的温度。

而勃留索夫最主要的、核心的东西，烧毁了他的心灵的欲望，谢维里亚宁并没忘记公之于众并给予无比幼稚而精确的界定：

> 我是天才伊戈尔·谢维里亚宁，
> 陶醉于自己的成功，
> 我登上整个城市的屏幕，
> 深入每个人的内心！

勃留索夫对整个生活的"埋怨"折射成伊戈尔的"成就"。不用说，只有伊戈尔一个人确信自己取得了"成就"。对"陶醉于自己的成功"的人来说，这种成功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并无区别。

勃留索夫的猴子当然是迫不及待的。在什么地方，差不多就是在那首《我是天才》里，他解释说，他要在一年的期限内，使自己的天才得到普遍肯定，"深入每个人的内心"：

> ……我说过：我将是！

一年过去了,看吧,我已是!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就连在这一年的存在也是值得怀疑的,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的存在已经化为乌有,情况就会有什么改变吗?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立刻给我留下不安的印象。当你想要回忆什么,你却明明知道,不管你怎样冥思苦想,你都会一无所获,你该是多么不安啊。

这天晚上,除了我们,索洛古勃(当时他跟刚崭露头角的诗人打得火热)家里只有两三个人。伊戈尔又长又苍白的鼻子,高大的身躯(略微有点弯曲),扣子系得严严的黑色常礼服。他没有耍流氓——这种时尚已经初露端倪,而且他只是一个自我未来主义者。相反,他很渴望"温文尔雅",跟任何天生的商品推销员一样。然而可惜的是,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偏远地区的土气。那天晚上他自己大概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每念完一首"大胆"的诗,便老实巴交地坐下。

可能,勃留索夫隐约地给我吹的第一次风便是朗诵诗的风格。两位诗人的朗诵风格全然不同。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是唱。不是吟诵,而是唱,就像没有嗓子的歌手,在台上唱情歌,而且是千篇一律的情歌。勃留索夫的朗诵平淡无奇。只是他越拔越高的男高音,有时会紧张地转换成呐喊——这呐喊中有一个音符,被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粗俗地重复。伊戈尔就是直接从这个音符开始自己的歌唱的:

我是天才……

勃留索夫有一行悲壮的诗句:

我厌倦了做“瓦列里·勃留索夫”……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会这样回答他：不管你多么厌倦，你反正还是，因为：

……看吧，我已是！

猴子的对比游戏可以没完没了地做下去。有些对比我们还将提到。但现在我要指出，跟不自觉地依附斯塔夫罗金的韦尔霍文斯基一样，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本人也感觉到了那条将他和勃留索夫联系起来的纽带。他不止一次谈起它，毫无顾虑，同谈论其他事情一样。我还记得这样几句诗，说的是在他伊戈尔·谢维里亚宁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周围尽是平庸之辈，
只有您，
瓦列里·勃留索夫，
才是真正的
无冕之王……

十四

战争刚开始时，有谁不曾为我们将来的胜利呐喊呢？小说家，戏剧家，更不用说诗人。所有的低声劝告都是徒劳的：

诗人啊,不要过早地写作,
胜利还在上帝的手中。
如今,伤口还在冒烟,
说什么话如今都没有用。

不过一年以后,这股浪潮有所消退。但有些人依然如故。其中就有瓦列里·勃留索夫(当然还有伊戈尔·谢维里亚宁)。

没有一个人能像勃留索夫那样年复一年、顽固而"英勇"地讴歌战争。没有一个人能像勃留索夫那样在战争期间写出如此粗野的沙文主义诗歌(谢维里亚宁的粗野表现在文字上:"让俄国士兵把鼻涕——擤在俾士麦身上。")。

君士坦丁堡和圣索菲亚曾激发勃留索夫的诗情,使他创作出一系列诗篇,歌唱俄罗斯未来的强大。这些诗篇我们当然没有全读过,我无法一一列举。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些情绪,我们与勃留索夫在战争期间中断了联系。我们听说,他经常坐车到前线去,有时是随民间组织,有时是随军事组织。或者是找熟人,随军代表去——我不清楚,恐怕说的并不确切。这期间我们彼此之间很少打交道。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在彼得堡东游西逛。突然他被抓走,要动员他当兵。他被关进营房。男女崇拜者们纷纷涌向各个办公室——要求放人。哪怕是从营房里。他们成功了。谢维里亚宁又回到涅瓦大街。这件事并没减少他的战争热情。他写道,在涅瓦大街上散步"还不等于叛变投敌",而当别人全都支持不住了,你们应该知道:

那时,你们温柔的,你们唯一的,
我,将率领你们攻陷柏林!

至于说到"女崇拜者",并不会造成误解: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尽管有那么多狂热和披着短面纱的女士,尽管服用可卡因,调皮捣蛋,甚至保证率领部队攻打柏林,但从本质上说,毕竟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革命。从2月到10月——克伦斯基政权只维持了短暂而动荡的几个月。这一时期我们很少听到勃留索夫的消息,至于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他简直就像融化在了云雾里,随风飘散了。就是10月以后也是不见他的踪影,十月革命党人中没有他,反十月革命党人中也没有他。我对他的一无所知简直令人吃惊。我极力回忆——似乎隐约听到过一些模糊的传闻,但也有可能,实际上并没听到过。他变成了幽灵。

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第一个迅速转向新政权的作家是伊耶罗尼姆·雅辛斯基[19]老人。他是当时唯一受到布尔什维克厚待者。他们在报纸上赞扬他,带他坐汽车出行,拉他参观克隆施塔德。很久以来,他一直是唯一出卖和背叛了自己的名字的俄罗斯——毕竟还是——作家。而第二个是莫斯科人,勃留索夫。

当梅耶荷德还在我们作家协会,在一群战战兢兢但却不肯屈服的老知识分子中间,大声叫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传来了有关勃留索夫的模糊而奇怪的消息。

为什么说这消息奇怪呢?"无论魔鬼,无论上帝,我统统加以称颂……"

既然"称颂"开始了,勃留索夫的"我"便需要快马加鞭,只争朝夕:要当第一名,跑在前面。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会跟不上,会掉队,他可不是勃留索夫,而只是勃留索夫的猴子……

俄语的写法还未因反革命而被禁止使用,勃留索夫就开始

按布尔什维克的写法写作了，并且声明，他不会按别的写法发表文章。他们刚要消灭书刊，勃留索夫就坐到新闻检查官的交椅上了——密切监视，这些书刊被消灭得是否彻底，有否对布尔什维克不利的走私品混进布尔什维克书刊。他们刚想抛弃“社会民主的腐朽襁褓”并受洗为“共产党员”，勃留索夫便匆忙发表了《我为什么会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小册子。

为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不令人吃惊。当然，他的小册子里有自己的说法，如果那里有说法。这本小册子索然无味。只有一个问题可以针对勃留索夫提出来：为什么他，勃留索夫，如此坚毅自持，做出如此大的牺牲（肯定要跟卢那察尔斯基有交情，凡是有点理解力的人都知道，卢那察尔斯基对文学的悟性并不比写了《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赫列斯塔科夫高），还是没能得到更高的职位？为什么他没有“陶醉于自己的成功”，而且似乎并没有获得什么特别的成功？

尽管他狂热地执著一念，全身心地投入自我，他至今仍然未能“登上整个城市的屏幕”，也未能“深入每个人的内心”。跟卢那察尔斯基同事多年，他也不得不重复多年：

> 只有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
> 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由于收效甚微，勃留索夫对此也会感到厌倦。

不知何故，就连马雅可夫斯基的地位都要显赫一些。勃留索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不久前做了一场关于普希金诗歌的报告。作为一种“无用的手段”，勃留索夫不再需要普希金。他说，普希金没有找到适合于俄语的协和音，而马雅可夫斯基找到了。

我担心，由于上了年纪，勃留索夫的感觉已经开始失灵。我担心，在发掘一切“手段”时，他已经不能细致地区分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他的“航船”的确是在“到处航行”。要知道

他爱所有的大海，所有的码头，
从无半点偏心……

如今，到了魔鬼的大海，这船会不会沉没呢？

假如勃留索夫看得见，他应该悲痛欲绝。被欲望，甚至是最可怕的贪欲烧毁的灵魂，只剩下忍受痛苦的能力。

生活多么残酷。人多么不幸。

1922

译注：

① 瓦·雅·勃留索夫（1873—1924），诗人，作家，评论家，俄国象征主义领袖。

② 意大利语，一千零三个。

③ 维·伊·伊万诺夫（1866—1949），诗人，文学理论家，学者。

④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索洛古勃（1863—1927），诗人，小说家。

⑤ 彼·斯特鲁威（1870—1964），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

⑥ 亚·亚·基泽维特（1866—1933），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⑦ 谢·留·弗兰克（1877—1950），宗教哲学家。

⑧ 叶·德·库斯科娃（1869—1958），政论家，“经济主义”思想家。

⑨ 瓦·雅·波古恰尔斯基（1861—1915），历史学家。

⑩ 图甘-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之一。

⑪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诗人。

⑫ 贝利斯案件:1913年在基辅对犹太人贝利斯的一次审判。诬告他为举行宗教仪式而杀害了一名俄罗斯男孩。审判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策划的,激起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抗议。法院最后宣布贝利斯无罪。

⑬ 瓦·瓦·洛扎诺夫(1856—1919),作家,政论家,哲学家。

⑭ 维尔哈仑(1855—1916),比利时法语诗人,戏剧家。

⑮ 安德列·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

⑯ 德·费·费洛索弗夫(1872—1940),政论家,文学批评家。

⑰ 伊·谢维里亚宁(1886—1941),诗人。

⑱ 米拉·罗赫维茨卡娅(1869—1905),诗人。

⑲ 伊耶罗尼姆·雅辛斯基(1850—1931),作家。

安尼雅的小屋——回忆维鲁波娃[1]

一 这是在昨天

我想模仿童话的开篇：从前有一个王国，一个国家，里面住着皇帝和皇后……

怎么，难道俄罗斯的事实不正是一个可怕的童话？

今天的，似乎可怕得无以复加的童话，篇幅很长，而且还未讲完。但它赖以滋生的昨天的童话是多么令人惊叹不已啊。童话由三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构成：皇后[2]，她忠实的仆人安娜·维鲁波娃(皇后，还有我们这些无能为力和身不由己的事件的参与者，通常叫她"安尼雅")，而第三个——是身材矮小的西伯利亚农夫拉斯普庭[3]。

我要预先声明：我写这篇东西的目的不是谴责，甚至不是审判。没有我法官已经够多了。我只是讲述。童话并不新鲜——但每个人的讲法不同，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也不同。而且，每重复一次，它都会变得更为可怕。

二 安尼雅

我们第一次见到“皇后忠实的仆人”安娜·维鲁波娃(安尼雅)已经是在革命以后,后来便经常见面。

初次见面前不久,有人给我看过她的一张大照片。奇怪:我有一见如故的感觉。甚至一眼便能将她整个看透:她有一张不算开朗,但很坦率的脸。明眼人很容易就能看出,她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她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而且全清楚地写在了脸上。

照片是旧的,即被捕入狱之前拍的。这是个脸颊圆圆的俄罗斯“倩女”,就连衣着也是俄罗斯的,宫廷的,对她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照片是旧的,但我并不怀疑,历经磨难之后,她会依然如故。这张脸是不会变的,因为它是无法改变的。别人的脸可以今非昔比,唯独她的脸不能。它是始终如一、静止不动的。

她就这么坐着,穿着黑色的连衣裙,留着朴素的发型,略微有点发胖——但这是照片上的安尼雅。皇后的忠实仆人。拉斯普庭的忠实“伴侣”。忠实——这是她首要的特点。

她坐在沙发椅上,显得有些吃力(骨折手术失败以后她瘸得厉害,行动不便),但身姿挺拔,不断地讲啊,讲,像孩子一样挥舞着圆润的手。她说话也像孩子——或者说像村妇——语速很快,上气不接下气,稍微有点平卷舌不分。“嘴里有粥。”有一次皇后生气地嘟囔道。

安尼雅在讲述自己最近遭遇的不幸,自己在狱中所受的屈辱。

——有多少次是上帝把我从士兵手中救出来的,是怎么救的,我自己也记不得了……

她的样子可能是由于习惯，故作诚恳，故作天真。要知道，她的眼睛也是这样的：坦率，大而明亮，但同时又会突然变得深不可测，茫然无神。不过我并不怀疑她的故事的真实：因为皇后也好，拉斯普庭也罢，她都只字未提。

这种沉默令人高兴，令人轻松。对一些重要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她不愿意别人多问。觉得无聊。万一有谁问起，她肯定会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从生理学上讲，也无可厚非。她只能如此，她是忠实的。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彻底的，完美的，对她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正是这种精神使她变得钢铁一般坚强，执拗和狡猾。

皇后也是执拗和忠实的。然而她们，这两个女人，皇后及其唯一的女友——安娜·维鲁波娃，是何等天差地别啊！

早在还是皇储年轻的未婚妻时，皇后就不讨人喜欢。她轮廓分明，漂亮，但却凶恶，阴沉的脸不讨人喜欢。还有噘得很高的薄嘴唇，德国人的笨拙高大的体态。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且慢，她或许是出色的。要知道，她给自己选了个怎样的名字？叶卡捷琳娜！"

荒唐的是，东正教里把阿利莎叫做亚历山德拉。不过，看了多年后阿利莎写给丈夫的信，你也许会觉得并不十分荒唐："多好啊，你把最高委员会交给了我！……你可以想象，我马上就要掌管内阁了！……自叶卡捷琳娜时代以来，还不曾有一位皇后亲自独立掌管内阁呢。格利高里（拉斯普庭）兴奋不已。"

顺便说明一下，这里讲的是她的信，亦即讲的不是他们，而是公开发表一个女人，一个妻子给丈夫的私信这一事实本身。而且，这个女人跟丈夫和孩子一起刚被残酷而耻辱地处死。

这样公开私人信件，令人不寒而栗。即使是一个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尤其是在战前，也不会相信这是可能的。然而，不可能的已成事实，——既然如此，也好。否则，关于这个女人，这个忠实

且富于爱心的女人，忠实且富于爱心的妻子，富于牺牲精神的母亲，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真相。

我们也不会知道她——皇后的真相。不会准确无误地知道她是如何献身于自己的可怕的时代的。而我们应该知道，这真相不属于她。还好，它没有被封存起来。

三 在宫中

1914年夏天（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会爆发战争），《白天报》的编辑来到我们的别墅，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起记者与拉斯普庭伯爵同车赴西伯利亚的旅行（拉斯普庭不久也受了伤）。

派记者是不切实际的：当时严禁提及拉斯普庭。

真相一旦被封锁就会畸形生长，演变成谣言和诽谤。几年来，拉斯普庭的处境就是这样，顶着丑闻的恶名忍辱负重。宫廷里其实对此事一无所知。那里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大大小小的苦恼，有自己的事情和自己的环境。那是市侩的环境吗？我不知道，不过，至少那是一种不文明的环境，蒙昧得令人震惊。

不过皇后并没忘记她是皇后，而她的丈夫是说一不二的沙皇。这意味着，他绝对是权力无边的所有人的主宰，可以根据上帝的意志在自己的国家里为所欲为。人们是凶恶的，奴隶经常造反。为此需要严厉。上帝想要这样。

皇后从没听过其他的话，自然也就无从知道。她不是没有头脑，但她的头脑很平常。而要穿透蒙昧这堵厚墙，需要特殊的、非凡的头脑。

但皇后毕竟能对耳中所闻、儿时所学心领神会。她有自己的路线。安尼雅还活着，如鱼得水，如鸟在林。她会到处寻找她崇拜的人，侍奉的人，为之献身的人。而且随时随地都能找到。

皇后也有些瞧不起安尼雅，但她需要安尼雅。没有安尼雅的忠心她活不下去。可她时常不公平地对安尼雅大发雷霆，甚至还有几分妒忌。

当然，她的妒忌并不是认真的。她不怀疑丈夫的忠实。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心理上的逆反的妒忌。安尼雅对谁更忠心，是皇帝还是皇后？一般认为是皇后。可实际上，她对皇帝同样毫无二心。皇后一发火，就认为安尼雅对她“无礼”……“她在克里米亚的行为发生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彼此间的联系没有了……她对我永远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亲密了……”

她的火气虽然算不上很大，但直到1916年末才完全平息。是拉斯普庭使她们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巩固。

四　装疯卖傻的好色之徒

彼得堡有过一个迷人的女郎。她是那么迷人，以至人见人爱，或持久，或短暂。

在这个美丽的上流社会女人身上，沸腾着一股特殊的、积极而又好奇的生命活力。凡是引人注目的东西，只要一上升到普遍层面，都会立刻引起她的注意，不管是现象还是人。不亲眼看一看，不亲手摸一摸，以自己的方式做一番分析，她会坐立不安。当年，没有一个艺术、文学、法律、政论——随便什么领域的代表不曾光临过她的沙龙。已经来了的人想尽可能多留一会儿，还没有来的人恨不得马上赶到。我在那儿见到过列宾，戈耶④，斯塔索夫⑤，乌卢索夫，安德列耶夫斯基⑥，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契诃夫……她善于对不同的人加以调配，组合，“世俗”的熟人永远不会跟她“精神”的朋友混在一起。有时，那里可以见到一个老

头，沉默寡言，没人注意。人们管他叫“灰色的朋友”。就是这位后来由灰变白，并变得老态龙钟的“灰色的朋友”，在战争期间被认为是内阁总理大臣当之无愧的人选。1915年，他以自己的“合理分析”征服了皇后，他认为，皇上“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拉斯普庭善意地称他为“老人家”。“我有一个无形的法宝，”皇后肯定地说，“我可以强迫老头子随叫随到，并让他保持旺盛的精力。他今天来找我了，就跟见‘后台’似的，因为，据他说，他精力旺盛。我们的朋友会发电报给他表示赞赏……”

此人是葛列梅金。

不过我得继续讲那位迷人的女郎的沙龙。

当格利高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刚进入彼得堡的视野时，他有否可能被这个沙龙拒之门外呢？

没有，他并没有被拒之门外。我要赶快交待一句：迷人的女郎没有成为拉斯普庭的追随者。她拥有非凡的平衡能力和丰富的健全理智。她对所有的人都“虚心求教”，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不过她的鉴别能力也是惊人的——甚至不是鉴别一个人，而是鉴别他的成就。

拉斯普庭大概明白，在此不会收获很多，但他还是常来。他赠给她一大堆照片，还文理不通地在上面题了词。她曾笑着给我们看这些照片，讲这位“长老”的故事，还叫我们去她家——见一见他。

但我们没有去，一如后来拉斯普庭几乎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去见他。

我们太了解拉斯普庭了，尽管没见过。早在他出现在第一个漂亮的沙龙之前，我们就知道他了。大概比鬼使神差地把西伯利亚“长老”举荐到罗曼诺夫宫中的不幸的费欧凡大主教认识他还早。费欧凡大主教是个非常谦虚、虔诚的僧侣，过着宁静的生活。

我记得他，矮小，瘦削，少言寡语，面孔阴沉，严肃，头发乌黑，熨帖，好像粘上去的一样。但他只见"痛苦"，不见其人，没能一下子看透狡猾的西伯利亚农夫。

拉斯普庭最初极力靠拢宗教界人士，参加过当时相当有名、也相当古怪的牧师M的晚会。他迷上了这些晚会：那里聚集了许多小姐——女中学生和大学生。当然，他是不会错过机会凑上去吻她们的。跟我关系很密切的一位女士告诉我，她躲了他很久，最后还是给他亲了一下，害得她只好跑到女主人的房间里去洗脸。"我警告他说，如果他胆敢再来吻我，我会给他一记最'神圣的'耳光。如今离得远了些，可比以前纠缠得更紧了：'黑姑娘啊，黑姑娘！别慌，我不会碰你，别发脾气！'"

然而一般说来，并没有谁对拉斯普庭的"好色"感到特别吃惊：因为这位"长老"毕竟在"装疯卖傻"。每个俄国人的内心都有装疯卖傻的倾向。甚至没有一种欧洲语言中有"装疯卖傻"一词，而俄国人离开装疯卖傻似乎就无法理解神圣二字。

拉斯普庭当然不是真"傻"，他是在不断地装傻，而且装得很大胆：他在动脑筋，何处该花多大力气。

凡是写过拉斯普庭的人，甚至包括他的敌人，无不承认他有过人之处，头脑聪明，目光敏锐，等等。

我敢肯定，他是个极其平凡、极其平常的农民。如果说他确有什么不凡之处的话，那只是指他的地位，他在时空中的位置，他的作用，而不是指他本人。他的平庸使形势变得更为可怕。仅仅通过一次短暂的会面，法国人吉利亚尔便发现拉斯普庭的目光中有一股"邪恶的力量"。这位法国人哪里会知道，俄罗斯自古以来便充斥着这些机灵、粗壮、淫荡的"浪游圣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不习惯朝这边看，而且很幼稚。可就连我都见过好几个酷似拉斯普庭的人。

其中一个特别像，好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我说的不是伊利奥多尔，他比拉斯普庭还要愚蠢、卑鄙、无法无天，是个十足的骗子。我说的是谢吉宁，切姆里亚茨克的"神父"——他跟拉斯普庭简直一模一样，毫无区别。他和拉斯普庭大体上是同一时间来到彼得堡的。我们不仅见过他，还见过他的主要学生列赫科贝托夫，以及一些女信徒，都是工人家庭出身。谢吉宁运气不好：更善于钻营，可惜没有机会，不得已，只好继续在工人中间活动。

同样的酒瓶一样的皮靴，同样的俄罗斯的衬衫，同样的带挂钩的长裤，同样的"锐利"的目光，同样的粗壮结实，情欲强烈——不多不少，活脱脱一个拉斯普庭。确实，谢吉宁不光是个实践家，还是个理论家，甚至还是个写作狂。拉斯普庭是用他含糊不清、耸人听闻、装疯卖傻、故意不讲文法的语言发出简短的预言，或给高层人物草拟私人电报。他的胡说八道里永远有简单明确的目的，这样或那样的暗示，要求。谢吉宁的胡说八道则滔滔不绝，一泻千里，高雅而又抽象：他有时是在愚弄听众，把人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再落实到文字——我见过他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和几张纸头。不过我想，假如他能有拉斯普庭那样的"机遇"，他肯定会改弦更张，停止愚弄公众，放弃胡说八道。

他跟拉斯普庭一样，放荡不羁，装疯卖傻，贪恋女色。他在彼得堡连续活动好几年(战争爆发前)，卷入刑事案件完全是偶然的。刚开始立案(不久又大事化小，把谢吉宁调到了别处)，还未及认真调查这个老色鬼，结论就出来了：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受害人"的指认，此案不能成立。跟拉斯普庭一样，他喜欢拍照。他那张男扮女装、周围簇拥着一群女崇拜者的照片非同寻常。

还有瓦尔纳瓦——这是拉斯普庭和谢吉宁的廉价翻版。他刚一承认自己是"小弟弟"便立刻得到了拉斯普庭的保护(不过始终在暗中嫉妒他)。皮季利姆，沙皇的最后一位都主教，是同一

类型的人，尽管身居高位，走的是自己的轨道，却没有那样的气魄，只派了个秘书出席拉斯普庭的狂欢节。

我这里举出的是我最先看到的几个人。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人。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过去——历史，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五　皇帝与皇后

是的，作为个人，拉斯普庭是渺小的，平凡的。只有作为典型，他才是耐人寻味的。关于他，我还要花费不少笔墨。安尼雅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皇后要复杂些，尽管她的局限性不容置疑。可这三个人组合起来，在时间和空间上，便不可等闲视之。他们共同写下了俄国历史的一页，这一页不会很快就被忘记。

那么皇帝呢？我对皇帝竟只字未提，难道不奇怪吗？

该说说他了，虽然这很难。之所以难，是因为没有皇帝了。皇帝没有了，而人似乎还存在，这本身就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毕竟皇后还在，她忠实的仆人还在，格利什卡"长老"还在，可皇帝彻底没了，不可逆转地没了。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作为一个人，稍微有点像一个苍白的影子，尽管轮廓还算分明。皇后爱他，这是妻子对丈夫的爱。可能孩子们也依恋他。可都已经化为泡影了——对眼睛明亮的安尼雅的宠爱。她认为，她侍奉的是"皇帝"，他根本不想分辨这是不是一个苍白的影子。

也很难分辨。因而也很难爱他。因而刚一宣布"没有皇帝了"，几乎所有的人便轻而易举地离开了他。皇帝没有了，他们离开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就像离开一个形同虚设的职位。

皇帝没有了，人——丈夫勉强还在，对此，神情恍惚的皇后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她难以抑制的痛苦就在这里。她

是个胆怯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不善于分析思考，当然也就对问题认识不清。她总是觉得，皇帝还在，还在，还在，她概念中的真正的皇帝还在，她所深爱的真正的人还在。她对儿子（“皇储”）爱护备至，在她眼里，他不仅仅是儿子，更是皇帝的化身。她老是抓住“皇储”不放，由于过度紧张，她几乎分不清他们俩谁是谁。她也顾不上许多了，她要和他们一起去投奔——还有何处可投奔呢？当然，只有投奔上帝。上帝不会见死不救，不会不捍卫她的真理——这毕竟是他的，上帝的真理！

可皇后是唯物主义者。在她所谓的“宗教”和“精神”领域里，她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血有肉的，人性的东西。她离不开拉斯普庭：没有他，她会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为完成她尘世的事业，她需要得到上帝的批准，付诸语言的，听得见的批准。

要创造一定的奇迹，事无巨细——从家庭的成功到皇储的康复，直至把尼基塑造成彼得大帝，登上荣誉的顶峰——拉斯普庭都是不可或缺的。

意志薄弱、天生胆小懦弱的皇后听信了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在支持她以后，变得无所顾忌，刚愎自用。她到处寻找这种力量显灵的征兆，而且总能找得到：这些或清晰，或朦胧的梦，还有似乎正在应验的拉斯普庭的预言。梳子、酒瓶、苹果、圣像——都是他的，都是他给的。一切都跟他一样，是具体的，可见的，不容置疑的。为了她，他将“无形”化为“有形”，将“期待”与“渴望”化为现实……

她离不开拉斯普庭。

六　安尼雅的《回忆录》

因有事，安尼雅到我们家来坐了一会儿。这是在她两次被捕

之间:她的东西尚未来得及被全部没收。照片还在——整整几大册。她来请我们帮助出出主意,看能否找到个合适的地方把它们藏起来,以免下次被搜去。

和平常一样。她的眼睛水晶般清澈,明亮。她依照女人的习惯,装出一副可怜相:"有什么办法呢,我毕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我听从上帝的旨意……随便上帝怎么处置吧……"

可突然,一提起照片,她又来了精神。要知道,这些照片都是她随皇帝和皇后旅行时拍的。很多是她个人的。有些照片很珍贵,"价值连城"。

这是她第一次谈起往事,谈起皇室。她沉浸在回忆中。在战前,他们过着多么宁静、朴素、无忧无虑的生活啊。散步,读书,喝茶,然后又散步……皇后喜欢绘画,喜欢编织……皇帝喜欢长时间地散步……

我听着,应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却有些令人后怕——试想,这是怎样的田园牧歌啊!真希望有人能请她再讲讲后来的事,讲讲战争和拉斯普庭。可惜,她会编织谎话,拐弯抹角,"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至今仍对她听信别人劝告,撰写和发表什么"回忆录"感到惋惜。

她仍旧用孩子的语言,或者说是村妇的语言,讲述革命后的苦难,过去的生活,随皇帝散步的情景。可她在这里应该讲的是战争,是拉斯普庭——真拿她没办法——她先是久久地、令人感动地守口如瓶,然后又陷入谎言中,不能自拔。她的雕虫小技算不上很高明,还是那个简单的方法——欲盖弥彰,到头来,不但荒唐的谎言要露出破绽,就连明显的真话也难免受到怀疑。纠缠不清,绕来绕去……谁需要这样?这是多余的,一如审讯,坐牢,调查。

所有可怕的和无可挽回的事，凡是她能做到的，她都已经做了。更确切地说——这些事已经做完，已经越过她，宣告结束了。如今，她已经荡然无存。她已经无话可说，无法“揭开”任何事情的真相，因为她不知道。

当然，安尼雅的谎言是毁灭不了真相的，但有时却会给真相覆上一层尘埃。因此，我在某些地方将不得不对这些“回忆”稍作分析，以便抹去这层尘埃。

七 小 屋

战争把皇后惊呆了。但很快她又镇静下来。战争进入了她的概念范围，作为一种可能性，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外，皇后把战争首先当作家事。我们很难理解，可这又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战争是在所有的“乔治”、“威廉”、“尼基”之间展开的。战争是尼基的事，所以打败威廉也将是他的胜利，他的光荣。

皇后没有忘记“俄罗斯”。关于俄罗斯，所有的话都是现成的，到时可以信手拈来，就像签发命令，只消两个主要人物——尼基和她本人大笔一挥。

她，皇后，“俄罗斯（还有皇储）的母亲”，需要首先成为“给人带来安慰的人”，照顾伤员，为“沙皇的军队”服务，她立即付诸行动。她创建小型医院，带领年纪非常轻的女儿们去当义务护士。至于说皇村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赫德罗伊茨是个不学无术的医生和心肠不大好的女人，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只要“她爱我们”，其余的都好办。

安尼雅当然也在医院，也在给伤员包扎伤口。可皇后自从决心尽“义务”，便再也舍不得离开医院，只顾不知疲倦地工作。安尼雅不一样，她已经对暗无天日的医院感到厌倦。这还算不上什

么过错，她毕竟不是“皇后”。但皇后不讲情面：“起初天天要求做手术，可现在烦了。老是开小差。包扎漫不经心……”“她想要个十字架，为此事花了不少心思。如今得到了，又不希罕了。”

皇后为战争尽的义务，不限于眼前的工作，伤员，医院。正因为战争是私事，家事，她才有责任用行动加以干预，与尼基并肩战斗，不光要抗击“威廉”，还要抗击他的其他敌人——所有会把他的胜利果实占为己有的人。比如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她管他叫“尼古拉沙”)。尼基善良，单纯，看不见坏人，可她皇后看得见。要知道，这是洞察一切，无所不知的上帝(通过拉斯普庭)告诉她的。尼基应该把自己的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应该独立行事，应该成为真正的皇帝，皇帝，皇帝！

拉斯普庭伤口刚一复原，便匆忙赶来(当时是9月份)。皇储又病了，不过皇后不是特别担心：“他会很快康复的，既然我们的朋友见过了他。”(到处都称拉斯普庭为“我们的朋友”，而且大写。)

尼古拉二世本人对拉斯普庭的态度如何？有可能不错，也有可能很冷淡。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而且永远不会有人知道。难怪尼古拉二世要保持沉默。他就这样在沉默中退出了历史舞台。没留下一句话。他在招待会上的照本宣科已经被人遗忘了。

大概，就连皇后本人也不大清楚他对拉斯普庭的态度。她宁愿让自己相信，皇帝对拉斯普庭的态度跟她没什么两样。如果尼基还做不到始终明白，拉斯普庭是“我们共同的救星”，她会帮助他明白，强迫他明白——仅此而已。

“朋友为你能去大本营而感到幸福，他为昨天能见到你而高兴不已。”她在9月20日的信中写道。“他忠实地爱着你，无法容忍尼古拉沙扮演什么角色。”

昨天见皇帝，今天见皇后……

安尼雅在自己的笔记中兜圈子:他们说的全是假话。例如,他们说,拉斯普庭"经常"去见皇帝和皇后陛下。而我可以证明,他很少进宫。宫中有卫队,有记录(接着详细介绍了卫队的情况),可以核对一下记录,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可以是可以,但不值得:她说的是真话。可她却极力要用这形式上的真话掩盖实质性的谎言。问题不在于拉斯普庭是在何处经常与皇帝和皇后见面,而在于他经常与他们见面。皇后每星期与拉斯普庭约会两三次,这是真的,而皇后与皇帝——在他从大本营回来时——见面情况如何,可以核对皇后本人的记录,其准确程度并不亚于宫廷卫队的记录。

约会的地点不是在宫中,而是在安尼雅的"小屋"里。她对此闭口不谈。对"小屋"只一笔带过,"我一个人住在那里"。然而,这间与皇宫近在咫尺的"小屋"却应该载入史册。俄罗斯悲剧的第四幕是在那里写成的。那里滞留过最后一个专制政府。

皇后在战争头几个月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尼基对拉斯普庭的信任,确立他们之间的全面联系。这是她建设一座大厦的基础。她的目的是明确的,建设方案也不复杂。要选拔一些忠心耿耿,爱戴尼基和她,皇帝和皇后的人,让他们帮助尼基不光要战胜威廉,还要战胜所有其余的"敌人"——那些或亲或疏,对皇帝和皇后不忠不爱的人。她对"人民"和"军队"的概念是模糊的,笼统的。她知道"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她不想把军队拉进来,它与游戏和斗争无关。这游戏和斗争发生在皇村,在皇后接见"老人家"和写信的这个房间里。一切决定都是在这里,在这间"小屋"里做出的。

然而,有用的、忠实的人在哪里呢?如何才能找到他们呢?这一点皇后并不担心。她相信自己,相信上天的指引——只要她需要,她永远能通过拉斯普庭得到这种指引。当然,还需要尼基拿

出皇帝的气魄来。在这方面，皇帝首先会得到她的帮助，其次会得到上帝的帮助（拉斯普庭）。

这就是皇后的全部“政治”。除此以外，她别无他法。

不过她工作起来倒是夜以继日。一切在悄无声息、不知不觉中进行。一年下来，她还是未能适应，未能进入“战争状态”。她关心的仍然是旧的、宁静的家庭生活，为一些无关紧要流言蜚语分心，为皇储的身体担忧，为安尼雅的情绪波动和偶然的一次调情发火……不过第一件事已经有了眉目，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罢免“尼古拉沙”。首先，如果说，皇帝是整个俄罗斯的首脑，却不是军队的首脑，这就意味着，他还不是真正的皇帝。其次，“尼古拉沙”是敌人（拉斯普庭的敌人）。尼基应该明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退休是上帝的旨意（通过拉斯普庭传授的）。

八　宣　战

——您知道吗，“安尼雅”在皇村的列车上受了重伤，可能活不长了。

——不会的！只是到头来她会很可悲。在这场皇室丑闻中，她个人其实是无辜的。她宠爱格利什卡吗？宠爱他的娘们儿够多了！她天生命运不济，这是真的，不过这里不怪她。

安尼雅活了下来，尽管给她的第一次帮助附带着漫不经心导致的残酷。愚昧的赫德罗伊茨医生非常成功地使她变成了终身残废。

——这件事拉斯普庭早就预见到了。

安尼雅说。其实不然。当安尼雅已经奄奄一息，皇后问情况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时，拉斯普庭异常灵活地答道：

——如果你和俄罗斯还需要她，上帝会保佑她。如果相反，

她要伤害别人,上帝会把她带走。

安尼雅活了下来——就是说,“对俄罗斯有好处”。

然而皇后对安尼雅仍然很冷淡。灾难没能改变她的态度。大约过了一星期,已经是1月22日,皇后写道:“我坐在正在恢复的安尼雅身旁……她总是要人坐在她旁边……说她瘦了,可我发现,她的腿粗得不得了……脸颊红扑扑的……自从发生了那件下流的事,她离我越来越远了……我们的关系永远不会恢复如初……”

不过这只是顺便说说,她没有忘记主要的东西:“安尼雅以我们的朋友的名义,请求你无论如何不要在宣言中提总司令(尼古拉沙)的名字……”

2月、3月——依旧是“朋友充满柔情的来信”:“安尼雅太讨厌,唠唠叨叨,假模假样,纠缠不休……我们把她给宠坏了……”4月——安尼雅已经回到“小屋”。与“朋友”的新一轮约会开始了(孩子们经常在那儿)。

信写得有点教堂风格:“就是圣灵也会准许我们……”

“我们的朋友和我一样感到震惊:尼(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效仿你草拟电文,回答省长们的提问……”“你太善良,太软弱……响亮的声音和严厉的目光能创造奇迹……”

到6月底,反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主要战役已经进入紧锣密鼓阶段。与此同时,其他战役也已展开。拉斯普庭呆在“小屋”里,几乎是足不出户。

“安尼雅一收到你的电报就转交给了他。他祝福你,并且很满意……”有一次约会结束后:“他心地善良,问了好多你的情况……”她谈了一些军事设想,如可否派几个哥萨克军团开赴利巴瓦等等——显然是来自谈话,因为后面还补充了一句:“我们的朋友说,德国人狡猾得很。”

6月里，皇后在晚上10点钟领着孩子们溜进“小屋”。她“绕道而行”，以便骗过守卫。朋友要回老家，但临行前一切已经筹划周全，皇后只消依计行事。就连“宗教大游行”都安排好了，命令将直接由皇帝发出，而不是宗教事务管理总局。

这一次约会，拉斯普庭“说了很多，很精彩”。

他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尽量不要增加有轨电车的费用；新币应该设计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责令生产糖果的工厂生产炮弹……

“他很遗憾你没有跟他就你的想法和意图，你打算跟你的大臣们说的话，你打算做出的一些改变多谈谈……如果你能开诚布公地跟他讲话，他给你的帮助会更多。”

皇帝知错即改，没过多少时间，皇后便感谢丈夫给她发来前线的战况和其他信息，“使我能告诉我们的朋友……”“除了他，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可怜的安尼雅！她为何会被逼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她竟然写出：“这是一个单纯的西伯利亚朝圣者。皇帝和皇后陛下跟他谈的始终只是一些抽象的问题，或者是皇储的身体。”

皇帝该回家了。兴奋而自信的皇后在等待他。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呢？“他知道我的意愿，而且害怕格利高里通过我对你施加的影响……”

可以说，这种害怕不是没有道理。

皇帝是6月26日回来的——已经胸有成竹。计划开始实施了：首先当然是要由他亲自出任军队首脑，以取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然后一切按部就班，该任命的任命，该撤职的撤职，还有宗教大游行……另外还要解散杜马。

8月间，他走后的第一封信，喜悦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数月前我们的朋友还在说这件事……上帝保佑你，上帝支持

你……如今军队已在你的手中。你是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你证明了这一点！"

皇后如此自信，对自己（还有拉斯普庭）的正确如此深信不疑，对"敌人"（社会，杜马等等）如此不屑一顾，导致她并不特别在意对"小屋"的"影响"加以掩盖。皇帝是总司令，她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过："我们的朋友及时地看清了形势并来拯救你，恳求你驱逐尼古拉沙，亲自执掌军权……"或者："跟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谈话时，不要避讳格利高里的名字，正是因为有了他，你才保持了强硬，并在一年前掌握了军权。"她告诉萨布林，是拉斯普庭"迫使我们相信这一步是绝对必要的"。

只有安尼雅，可怜的安尼雅，还在稀里糊涂地说什么："华沙陷落以后，在没有受到拉斯普庭或皇后的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亲自出任军队首脑。这是他唯一个人的、不可动摇的愿望和信念。我可以证明，他迈出这一步绝对不是因为受到皇后的怂恿。"

或许，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对这类"证明"加以点评？

社会上对皇帝亲自执掌军权困惑不解。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一行动都过于缺乏"政治色彩"。随后采取的另外一些同样缺乏"政治色彩"的行动，已经引起社会的恐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渐渐地，大家都明白了。明白了俄国政府有两个敌人，它在两线作战——一面是德国，一面是整个俄国社会。

"别妨碍我们，我们要跟你们一道抗击德国人，保卫俄罗斯。"这就是社会和杜马对政府（其实也是对皇帝）的第一个要求。

政府回答：

——不，对德战争是我的战争，你们是我的敌人，而我跟俄罗斯乃是一体，故你们也是俄罗斯的敌人。

于是一切都变得徒劳无功：无论是妥协让步，温和派与右派联合，还是这样地呼吁："……但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强大的，外来的敌人……"就是这样。这第二场战争是在安尼雅的"小屋"里决定的。"小屋"前面的道利达宫意味着什么呢？它能否拒绝应战？军事行动已经公开化。

道利达宫清楚，应战等于自取灭亡，不应战也等于自取灭亡。于是它采取了第三条路线——半应战。

我们看到，这也是自取灭亡。

九　反对教会

成功使皇后深受鼓舞。她的能量倍增。现在应该加紧选拔有用之人，以取代所有其余的人。不喜欢她和朋友的坏人很多。可只要有他在，她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内阁已经够让人头疼了，教会——宗教事务管理总局，大主教们现在又来凑热闹。还有总检察长，皇帝在宗教事务管理总局的"耳目"，也是一个大麻烦。将可恨的萨马林（一个诚实的莫斯科人，在温和自由派中知名度很高）免职，皇后没废吹灰之力，但到了最后一个小人物拉耶夫（"他敬仰我们的朋友"）时，却颇废周折。总之，跟教会（她认为是跟宗教事务管理总局，跟主教们）的斗争是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西伯利亚的修道士瓦尔纳瓦是个拉斯普庭式的老奸巨猾的农民，他马上投到"朋友"帐下，随即开始有恃无恐地反对宗教事务管理总局。他自称在拉斯普庭的家乡发现了新圣徒的干尸并要求教会将之列为合法的圣徒。正是这种厚颜无耻（瓦尔纳瓦几乎目不识丁，而且行为放肆，举止粗野）导致了一桩令人发指的丑闻。皇后由于发狂而失去控制。难道东正教教会的首脑不是皇帝吗？"亲爱的，你要好好教训一

通他们，这些野兽(主教们)。他们不敢……你的到来应该是一次讨伐……”

她接受了瓦尔纳瓦，甚至还亲切地叫他苏斯利克。

这件事以宗教事务管理总局蒙羞而告终。半数主教被驱逐，拉斯普庭的亲信皮季利姆被任命为都主教(皇后力荐，多次施加压力)。瓦尔纳瓦得到了大主教的职位，并被授予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发现了“圣徒”。“敌人”——这次是教会的代表——又一次被皇后及其朋友打败。

不过，教会的事并没使皇后忘记更重要的事：必须挑选一位内务部长。

至于“总理”——以后再说：“老头子”(从前的“灰色朋友”——葛列梅金)还在位子上，没问题。可他毕竟老了，所以拉斯普庭要随时寻找接班人：“明天朋友约见X，然后晚上再来见我。他会告诉我，此人是否适合接替葛列梅金……”第二天皇后又写道：“五点到七点在安尼雅那儿约见朋友。他不同意解除老头子的职务。他认为最好等等。说他极有头脑……”显然，接受考察的人没有通过。葛列梅金于是继续留任。

十 格利什卡的“过分”

然而，既然安尼雅注定要明显地撒谎，说什么拉斯普庭对政治没有影响，他不过问政治，他本来可以过问，部长们来找过他，可他不感兴趣，他只谈论抽象的东西——既然她在撒谎，且我们也看得出来，除了吵闹，拉斯普庭从事的只有政治，那么，我们不免要问，拉斯普庭的政治究竟是怎样的？

是皇后的单纯的政治吗？是捍卫以尼基对代表的专制制度吗？可尼基的事跟拉斯普庭有何关系呢？他是希望他所理解的

“真理”取得胜利吗？他是在为俄罗斯着想吗？

不是，即使是最无耻的谎言中，也含有可怕的真实成分。尽管拉斯普庭不间断地从事政治——也可以说是制造政治——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从事政治，或者说，他从事的不是政治：他对政治甚至一窍不通，在他那里，没有任何政治可言，就连皇后那种简单之极的政治也没有。

为了理解事情的原委，让我们透视一下这位俄国农民——来自森林和土地的格利什卡·拉斯普庭的内心深处。

首先，他愚昧，愚昧得几乎难以想象，而且不可救药。其次，他聪明。两者合而为一便产生出“农民的聪明”——一种天才的“机灵”，一种特殊的机智和灵活。

这种机灵使拉斯普庭能够异常迅速地调整自身，以锐利的目光审时度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渐逼近自己的目标。然而，他的愿望极其简单，跟“政治”风马牛不相及。拉斯普庭甚至没有“虚荣心”：这个概念对他来说过于微妙。如果用语言来表达拉斯普庭的愿望，那么大致可以这样概括：“我要活得自由自在，当然还要体面。不要让任何人妨碍我，我要为所欲为。而别人——让他们羡慕去好了。”

除此以外，拉斯普庭再无其他愿望。他并不怀疑，还可以存有一些其他愿望。它们本身平常而又平常。如果我们不理解拉斯普庭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还是无法理解他。

他这样的俄罗斯朝圣者的内心——或天性——中的任何一个简单愿望都可能无限扩大，不受约束。何为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只知道应该“令人生畏”。何为体面？就是闻所未闻。而为所欲为——这意味着可以傲视整个世界，可以呼风唤雨，畅通无阻，所有的人都要退避三舍！

欲望的过度膨胀能使简单的愿望变得耸人听闻。只有文明

人才会懂得分寸的概念。可拉斯普庭是个野蛮人,来自远古的原始社会。

跟许多与他相仿的较有天赋的人一样,他从青年时代起便深受欲望的折磨。他投身"宗教"(只有这是他能够接受的,只有这是伸手可及的:修道院,朝圣者,"圣物")。当然,在这方面他仍是没有节制的,本能缠住了他——他放纵无度,不知羞耻——我来了,全都给我闪开!

不过"农民的聪明"——机灵——并没有昏昏欲睡。真正的甜蜜、体面、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不存在的。一旦"时来运转",他可不会失之交臂。他会紧抓不放,因势而动,径直奔向理想中的福地。

淫欲,虚荣,恐惧——乃是常见的人性的三位一体,意志的原始动力。但时间是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它,而锤子就是意识,我们称为文化的东西。拉斯普庭的淫欲、虚荣和恐惧尚处于未开垦的处女状态,并具有明显的俄罗斯特点,缺少节制,缺少限度。而且他只有这三样东西,别无其他。如此,所谓"拉斯普庭的政治"又从何谈起呢?

十一 吹牛大王与德国人

进入"福地"以后,拉斯普庭很清楚自己应该依靠什么,仰仗什么。他恰到好处地装疯卖傻,对自己的预言含糊其词,有意渲染"人民"、"农民"的神圣。这不需要太多的狡猾和精明。他置身的那个环境毕竟也有不文明和愚昧之处。拉斯普庭的俄罗斯丝绸衬衫对这个环境来说,是令人信服的,感人至深的。试想,他若是穿一件廉价的西装,讲一口地道的人话(他与人常来常往,精通此道),称呼别人用"您",而称呼皇帝和皇后不是"爸爸和妈

妈”,还真不知道情况会怎样呢。

他谨小慎微,绝不涉足危险地带。当然,由于放纵,他也有过闪失,但能迅速纠正自己。战争开始时他犯过错误:发出的预言过于明确,具体,滑入了“政治”和“地理”,说什么俄国军舰逼近维也纳之时,就是俄国打败德国之日。

举荐,选拔,安排“忠诚”的人——这一主要“政治”角色甚合拉斯普庭的心意。简单,体面而又有利可图。他选拔的人不但不会危害他的利益,剥夺他的自由和体面,还应该知恩图报,千方百计维护他的地位。

拉斯普庭跟皇后一样,坚信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在皇帝身边,没有办不成的事。再远一些、广阔一些的地方呢?那里四面是雾的墙,不可救药的愚昧。而他也不感兴趣。他只关心他认为会触及他自身的东西。假如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他才不会说应该派军舰进攻维也纳呢。他会推测英国将要扮演的角色,并认为基奇纳的死是有利的。可他对英国知之甚少,一如他对俄国知之甚少,而且对两个国家一样的漠不关心。

他并不希望打仗(没有一个俄国农民希望打仗,他们痛恨打仗,不论他们住的有多么偏僻)。但既然已经开战,他当然希望俄国皇帝打败威廉皇帝(对战争,皇后有自己的看法,拉斯普庭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个农民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把战争当做皇帝之间的争斗)。他的直接兴趣是希望皇帝能够打赢,这样他就可以在皇帝身边高枕无忧,自在而体面地生活。所有关于拉斯普庭(更不必说皇后)亲德的传言,都是胡说八道。明知战胜对他直接有好处,他怎么会不希望战胜呢?

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拉斯普庭还是个酒鬼和色鬼。“凡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不希望遇到障碍……”他的好酒贪杯是俄罗斯式的,毫无节制,一旦喝醉,便手舞足蹈,大喊大叫,举止下作,丑

态百出,不跟哪个“娘们儿”胡闹一番绝不罢休。同他的酩酊大醉和丢人现眼相比,就连最不文明的俄罗斯人也要甘拜下风。格利什卡接下来会怎样,可想而知。

他喝起酒来确实没完没了。他不会很快倒下,他很健壮。因而外面风传,他永远喝不醉。似乎并非如此:他是不饮则已,一饮必醉,而且醉到不能再醉。一切都无以复加:放肆的手舞足蹈,野蛮的大喊大叫,天花乱坠的吹牛。这时,他狡猾的机灵和清醒荡然无存。他确实是“大海淹到了膝盖”。而他需要的是保持镇静。

有关他与皇后的关系的肮脏传闻来源于拉斯普庭本人。在一定的时候,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哪位酒友不小心说露了一句话,或是故意机灵地说一句试探的话,拉斯普庭当场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皱皱巴巴的纸——皇后的信。他不会撒手,但会在空中挥舞,或者指指点点,嗓音嘶哑地说:“啊?怎么?这件事她在信上没说?可她在我那儿……而且我把她……”

机灵、冷静的人此时没有必要回避他。

有一个事实并不令我吃惊,它也许不是尽人皆知,但却真实可信:彼得堡有过一个很严肃的德国组织——成员全是俄国人。这些人相当阴险,完全可以同时为拉斯普庭所用。他们没向他提过任何要求:这只是一些常来陪他豪饮的忠实的酒友。他们自己也曾通宵达旦地豪饮,有时是为了向拉斯普庭“致敬”。

当然,这些酒友很善于从拉斯普庭那儿打探他所知道的一切。他的话三分之一是瞎编,三分之一是吹牛,但三分之一是有用的:近年来皇后不断为“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的朋友”向皇帝询问军事(秘密)计划和意图,不断重复:“就所有问题同他开诚布公地谈谈吧。”

于是,好像拉斯普庭本人在逐渐插手军务。忽而建议“在利巴瓦附近发起进攻”,忽而坚决要求“命令布鲁西洛夫迅速阻止

南线的进攻”。皇后有关军情的信写得异常详细，甚至还指明了保卫后方，左翼等部队的番号，如此具体，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她当然是在重复别人的话，还有拉斯普庭的话。然而，就是拉斯普庭，也觉得这些话奇怪。它们在清早传进“罗德别墅”，传进醉醺醺的吹牛大王的耳朵，然后他又稀里糊涂地泄露给那些极有心计、不露声色的“酒友”。

德国人对我们的“秘密”计划掌握得过于一清二楚。我们在前线的失败过于连续不断。这不能说跟格利什卡的吹牛和贪杯没有一点关系。不过我们敢肯定，他从未有意背叛“自己的皇帝”。这对他没有好处。

没有背叛，这并不等于没有出卖。在这方面，德国人精通心理学。我想，他们不会主动直接送钱给拉斯普庭，尽管他们知道他需要钱，而且“来者不拒”。

他收起钱来如此明目张胆，甚至吓坏了部长们。他们跟侦探局窃窃私语一番之后，决定按月付给他薪水，每月分两次发放，数目当然是保密的。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格利什卡按时到场，领钱，但还是入不敷出，因为他把钱全花在了酒上。再说，这区区几千卢布又能干什么？一张嘴就没了。那些女崇拜者对拉斯普庭的宠爱简直不可思议，她们给他吃好的，穿好的，还用鲜花装点他的房间，对他好极了。对有求于他的有钱人，他也收取实物：皮大衣或茶具。他并不是诚心要实物，而是想要钱。而且他要钱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喜欢挥霍。这也是俄罗斯人的特点：尽管纵情豪饮，大海不会喝干，不要舍不得花钱，也不必劳神数钱。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白白浪费，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一切都拿走。

为此需要很多钱。所以，拉斯普庭要毫不犹豫地索取，这并不奇怪。

不过，他有个原则，即从来不向皇后要钱。吝啬的皇后大概也不会给他。就是给了，他也未必会要。他需要在“那儿”博得个廉洁的好名声。他做到了。他并不担心流言蜚语会传到圣上的耳朵里，他只希望圣上听到的不是对他的“诽谤”，而是这样的传闻：有钱人把钱给了他，而他又把钱给了穷人。

难怪安尼雅“回忆”说：“他做过多少好事啊！他接见过形形色色的穷人，对所有的人都慷慨解囊。”

安尼雅未必了解事情的真相，在此，她是怀着真挚的感情讲起拉斯普庭的。不过，皇后好像是信以为真。

十二　选内阁

皇帝成为俄军总司令以后，皇宫里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现在成天坐镇大本营，回宫的时候更少了。

皇后忙得不亦乐乎。她的事务在增多。她坚持把儿子留在大本营，留在父亲身边。他不是有病吗？会好的。重要的是要让他学习如何当皇帝。

大家共同努力（安尼雅从未起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终于找到了内务部长的人选——赫沃斯托夫⑦。

赫沃斯托夫当然是先过拉斯普庭这一关的。他邀请拉斯普庭作客尼日尼（他还是尼热戈罗德的省长）并安排了如此丰盛的酒宴，以至皇后赶紧给皇帝写信：“我们的朋友来电说赫沃斯托夫将是个很好的部长。”

接着，赫沃斯托夫又带着形影不离的安德罗尼科夫去见安尼雅。

安德罗尼科夫是个没有固定职业的胖绅士，无人不知的冒险家。在外面无人不知，但在宫内却从来不为人知：要是知道了

“外面的人”是如何看待他的，那才好呢。“他们”抨击他——这就等于说，他是个好人。是“他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安德罗尼科夫和赫沃斯托夫迷住了安尼雅。于是皇后赶紧写信（尽管忙得很），做皇帝的工作。

“赫沃斯托夫又来找安尼雅，恳求我接见他。我今天就接见他。有些人害怕我干预朝政，也有些人，如安德罗尼科夫、赫沃斯托夫、瓦尔纳瓦等人，认为我应该助一臂之力。”

“喂，亲爱的，我和‘尾巴’（喜欢亲昵地叫别人的外号，这是皇后的弱点）谈过了，印象极佳。我本来不大放心，因为安尼雅爱夸大其词，可和他谈过以后我感到，与这样的人共事将是愉快的。头脑清楚，精力旺盛，了解农民，了解大众，将会保护我们的朋友。”“安尼雅说他人高马大，但内心是高尚和纯洁的。”晚上又得意地附加了一句：“大胖子安德罗尼科夫致电安尼雅，说赫沃斯托夫很满意我的谈话，还转达了另外一些客气话。”

安德罗尼科夫，赫沃斯托夫，别列茨基……安尼雅全是在“小屋”里接见的，而且很自豪她也能够“助一臂之力”。只是由于不习惯，她有些胆怯。但“安德罗尼科夫对安尼雅保证说，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赫沃斯托夫来找过她”。“快点任命他吧，亲爱的！”

皇帝第一次回宫，即满足了“小屋”的所有愿望。赫沃斯托夫和别列茨基得到任命。皇后的心腹之患被撤职。

赫沃斯托夫就是在上任之后也没忘记安尼雅，认为值得继续保持他的魅力。但皇后已经有怨言了：“赫沃斯托夫和别列茨基在安尼雅那儿吃饭，我觉得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好像她想扮演什么政治角色，而她又是那么爱慕虚荣，自信，不够谨慎。不错，他们请求接见，又有什么事情需要转达，可我们的朋友始终希望她为这些事情而活着。”（没良心的安尼雅！忘记了自己的痴迷，自己的热情，现在反要说什么：“赫沃斯托夫给人印象不佳。”）

这是个令人伤心的、俄军接连遭到惨败的冬天(1915—1916),拉斯普庭豪饮无度的冬天。丑闻传得沸沸扬扬。安尼雅对这些“诽谤”可能有所耳闻,可能曾经长吁短叹,怒不可遏。但皇后却全然不知:她既没听到什么风声,也无暇顾及,她只顾接见“自己的”部长,出席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多好啊,你把最高委员会交给了我!”——晚上到安尼雅那儿会见清醒、严肃、坚定的朋友。“把皮季利姆调过来吧。朋友请求你保持强硬,因为这是唯一合适的人选。”此外,朋友还就皇帝拟定的罗马尼亚方案、圣旨,以及何时召集杜马等问题提了很多建议。“他认为,如果能够打个胜仗,就完全没有必要召集杜马了。”

这不,朋友“看见了夜间幻象,请求下令在里加附近发起进攻。他是认真请求你”。

这次进攻应该在11月发起,因为这是拉斯普庭的“夜间幻象”说的!

可要是不征求他的意见就发起进攻,他会生气:“他们还没问过他就开始行动了。要知道,他总能找到进攻的最佳时机。”皇后写道。

皇帝又回来了。他像是橱窗里的模特,一言不发,要他签署什么他就签署什么,任命一些人,撤职一些人,然后——又走了。

刚被任命的都主教皮季利姆(他跟拉斯普庭是一丘之貉)知恩图报。为拉斯普庭提供早餐,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热情得近乎肉麻——这样的生活确实“自在,体面”。安尼雅身体稍觉欠安,他就会马上来到“小屋”,守在她的床前。“真是个好人!”

彼得堡的生活奇怪而可耻。人人都觉得重负在肩。杜马很少开会,而且会期总是一再推迟。即使最终开了,杜马的车轮也是空转。事情大部分由安尼雅的小屋包办了。少量的留给了格利什卡身穿白色长衫接见部长的所在地——三一街。比较热心

的部长还会吻他长衫的下摆。而且恋恋不舍——反正他们不在乎。既然是格利什卡,为什么不能穿长衫?既然穿了长衫,为什么不能吻它?既然一个人已经“善始”,为什么不让他“善终”?

这长衫是个标志,说明拉斯普庭在家也有清醒的时候,还不完全至于满嘴酒气。他希望过得一天比一天“体面”。他手心发痒,想搞出点什么名堂。长衫就是他琢磨出来的。要让他们看得见,感觉得到。

由于了解赫沃斯托夫,我们对他起初是抱着不屑一顾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后来则希望他能制造点闹剧。毕竟胡说八道传得很厉害。赫沃斯托夫的密探在监视拉斯普庭的密探,拉斯普庭的密探又接到命令监视赫沃斯托夫的密探。结果,彼此间发生了冲突,然后又互相和好,再然后则你我不分,没有一个人搞得清到底应该监视谁。

但拉斯普庭镇定自若。依旧通宵达旦地胡作非为,从一个窝挪到另一个窝。天亮时,烂醉如泥的他会被从最后一个最为低级的地方送回家。睡醒觉,洗把脸,或者到浴室洗个澡,他又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部长,女士,申请人,鲜花,然后又是部长,女士,女士,部长……这当然是在没有电话让他进宫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安尼雅没有亲自出马来找他的情况下。

“小屋”里正进行一项新的热火朝天的工作:选总理。无论有些人怎么舍不得日渐衰弱的“老人家”——不行,该是挑选接班人的时候了。

拉斯普庭的目光停留在了施秋梅尔的身上。这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葛列梅金老人家不是觉得冤枉;有名望,在身边已转悠多时,有钱,而且将会知恩图报……

“亲爱的,起用施秋梅尔吧,他是个真正的人。我们的朋友这样说了。他很敬重我们的朋友,这一点非同小可……”

皇帝越来越容易受到左右,越来越听话。

皇后未必不肯下功夫,对皇帝进行反复劝说,但不知为什么,一切来得比预想的还快。1月,皇帝回到家中,他一言不发,在10天内批准了"小屋"的所有决定:葛列梅金"老人家"离职,施秋梅尔继任。还当即驱逐了一些与皮季利姆作对的主教("无耻的野兽")。"秘密"通报了军事计划,而且非常详细:将向何处派遣炮兵,近卫军是否开赴"凯勒的南线",哪些部队留在何处"保卫左翼",等等。醉得迷迷糊糊的格利什卡能全都准确地记住吗?我怀疑。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很快便要求任用伊万诺夫将军。皇后也跟着操起心来:"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考虑一下伊万诺夫将军吧……""伊万诺夫的事你意下如何?我们的朋友希望能够起用他……"(不用说,他得到起用。)

"小屋政府"同新总理施秋梅尔正处于蜜月阶段。施秋梅尔天天向皇后汇报。

施秋梅尔是何许人也?12—15年前,他是雅罗斯拉弗尔的省长。当时已经不年轻,高大魁梧,身穿白色军服,热情好客——给人的印象还算愉快,尽管稍微有点虚伪。看得出,他想在"彼得堡的作家们"面前表现出他首先是个有文化的人。是个温和的自由派。

但与此同时,他对教会,对神职人员,对"东正教"又明显地心向往之。看得出,德国人的姓氏和少许的德国血统使他苦恼不已:他认为这会影响他的前途。于是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地道的俄国贵族。他把"曾祖父"的共济会标志用玻璃镜框镶起来,挂在墙上显眼的地方。他的"传家宝"——签名册里,有俄国皇帝乃至叶卡捷琳娜本人的手迹……

"德国人的影子"使他耿耿于怀。正因如此,他才极力表现自己的亲俄态度,对东正教的虔诚信仰。

恰好我们有机会陪同名噪一时的克隆施塔得的约翰神父进行布道演说(他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三世的拉斯普庭”,不过这种说法有失公允:约翰神父尽管有些糊涂和粗鲁,但与拉斯普庭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他蓝色的、漫不经心的眼睛中,闪烁着天真的、孩子般的虔诚。)

我们同施秋梅尔和约翰神父走遍了大街小巷,约翰神父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所到之处,人群如潮水一般涌向约翰神父。那场面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就连施秋梅尔也显得不同寻常。他是多么谦和,多么恭敬啊!整个身心都得到了安慰。

可一旦到了自己的豪华宴会上,他就会判若两人。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高官,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价。因而不免有些官腔。不过看看他周围,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一个古尔良德,他永远的红人,已经够得上“金不换”了。他刚一登上总理宝座,就给这位古尔良德安排了一个舒服的职位,而将在这个职位上干了 25 年的原任无情解职。就连皇后也大吃一惊。

我们当时给他取了个外号——“狡猾的廷臣”。当了总理以后,他依然如故。如果说,他始终没能清醒过来,那只是因为,就连他也被这空前绝后的宫廷的疯狂吞噬了。要适应环境,仅有狡猾是不够的,必须自己也成为疯子。

施秋梅尔始终企图谨慎行事。他认为,既然杜马还不幸地存在,就只宜与它暗斗,而不宜明争。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他要巴结拉斯普庭,讨好皇后,对他们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他出言谨慎,遇事小心。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点小聪明在拯救他。但没能最后拯救他……他晕头转向,最后自己认输了。皇后在 1916 年底他退休前不久指出:“他早已不把我们的朋友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失去支柱。”

十三　小小的闹剧

可暂时还找不到比施秋梅尔更好的人选，所以他还照样“经常同朋友谈话”。

蜜月进入高潮时，最忠实的宠儿之一赫沃斯托夫出了一桩丑事。我不想详细叙述这件难堪而又肮脏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知是纠缠不清的密探们嗅出了什么味道，还是从前的修道士伊利奥多尔出于嫉妒打了小报告——总之，是事情暴露了：讨人欢喜的“尾巴”原来是个阴谋家，他在私下里招兵买马，准备刺杀拉斯普庭。这一秘密事件让人哭笑不得。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唆使赫沃斯托夫走出这一步，此事是否动了真格——无从知道。赫沃斯托夫试图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说他的目的是“解放俄罗斯”——他很清楚公众普遍痛恨拉斯普庭。但就连这一点也没能如愿以偿。他只好像个小丑似的灰溜溜地下台，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特别同情。

皇宫里的情形不一样。皇后和安尼雅正“度日如年”。“我太不幸了，”皇后写道，“是我和安尼雅通过朋友向你推荐的赫沃斯托夫……”然而，她要把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我只不过对他们的压力做出了让步……”她忘了自己曾为这个“开朗和高尚的人”欣喜若狂——可能是真的忘了。安尼雅受到严重刺激：“她疯狂地打电话询问我们的朋友的事，在屋子里把拐棍摔来摔去，不停地哈哈大笑。”

然而同“朋友”本人受到的刺激相比，这一切实在算不了什么。他确实是失态了，而且不是因为恼怒，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恐惧。极其平常的，无理性的，对他称之为“凶手”的赫沃斯托夫的恐惧。他挥舞着双拳，怒不可遏地拿可怜的安尼雅撒气。每

时每刻都要求她过来(自己坐在家里闭门不出),稍有耽搁,他就会派老婆去给她好看。就连皇后也不避讳:“他现在情绪暴躁,神经紧张,对安尼雅大吼大叫……害怕出门,说他会被杀死……走着瞧吧,上帝会保佑他的……”

十四　“再见了,亲人……”

1916年的夏天,凉爽,安静。

6月的一个傍晚,我站在彼得堡自家的阳台上。阳台在二楼,离木块铺成的马路很近。我们的房子是最后一栋,右边,围墙后面,是道利达花园苍翠的参天大树。绿树掩映中依稀可以看到一座宫殿宽阔的圆顶——这是杜马。而左边,是笔直,宽敞的谢尔吉大街,它是那么笔直,以至街尾是消失在夕阳金色的余辉中,天空的光芒里。

街上寂静而冷清。突然,好像是从远处,传来了持续不断的声音——这是歌声。歌声由远及近,转眼到了近旁,接着我看到,士兵的队列从小巷中走出,他们紧贴着围墙,好像是径直朝我走来。转眼间,整齐的队列又拐到了大直街上,朝那边,朝夕阳走去。他们走啊,走啊——就是走不完。他们没法走完,他们的人太多了。他们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拐过街角,填满了长长的大街,而且连续不断,有如一条浅灰色的巨蛇向落日延伸开去,把螺丝一般旋入人的内心深处的呻吟的歌声撒向天空:

再见了,亲人,
再见了,朋友,
再见了,我的
亲爱的新娘……

远处，走在前面，现在已经快要完全淹没在金色暮霭中的士兵，唱的是同样的歌：

再见了，亲人……

街道仿佛在应和：

再见了，朋友……

近处的人流哭泣道：

再见了，我的
亲爱的新娘……

该如何讲述这一切？迎着落日的斜辉，迎着金色的利剑，歌声悲壮的人的海洋奔涌而去，并消失在其中。那里是他们所有人的末日，看不见的末日，一批又一批的新人走向那里，有去无回：

再见了，亲人，
再见了，朋友，
再见了，我的
亲爱的新娘……

这个夏日的傍晚，太阳好像在天上停止了运行。我离开阳台，关上门，我无法再看下去。但就是这样，隔着窗户，隔着墙壁，仍能听见歌声，这就是说，他们的队伍还没走完。

这是战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人们如潮水一般去送死——

是为祖国？但愿他们这样想。或者索性什么也不想。因为正是这些此时此刻还在行进，还在唱歌的人，要为格利什卡的自在而体面的生活赴汤蹈火。一旦愚昧无知的格利什卡心血来潮，要求下令发动进攻，他们就得去送死。

我知道我有些夸大其词。但在双重战争的紧张气氛中，人们难免要做恶梦。何况这第二场战争，“发疯的小屋”向整个俄罗斯发起的战争，比第一场战争更令人痛心呢。

15　敌　人

可以说，1916 年夏，俄罗斯社会各界全被卷入了这第二场战争。都是不知不觉地相继卷进去的——从左派中的温和派到右派中的激进派。对“敌人”要铁面无私，一视同仁。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点干预对德战争的企图，都会受到追究和严惩。乡村联盟和城市联盟如何？“派‘耳目’去监视……必要时马上予以取缔……”杜马怎么办？“不必担心，只是要尽快解散杜马……”国务委员会呢？“它的行为欠考虑……”“我真想把内阁成员痛打一顿，全都赶走。统统捻成粉末……”

这些“统统”要被“捻成粉末”的人，深知自己的处境危险。“小屋”的恶梦压得人们透不过气。就连一些远离政治、不问政治的人都在怪罪格利什卡。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但有可能，关于格利什卡的“法力”——这“法力”是非凡的，尽管同时也是邪恶的——关于他的“与众不同”的神话，就是由此产生的。要知道，这是难以接受、令人汗颜的：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乡巴佬，一来便骑在了黑压压的人群的后背上，而且人们还得乖乖地背着他走。

王公大臣们，皇亲国戚们，除少数例外，基本都是些平常而

又平常的人，出身于行武之家，在较少文化气息乃至愚昧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习惯了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举止粗野，行为放纵。有的人成年后会成为一个不错的一家之主，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保持游手好闲、视野狭窄的本色。

他们把拉斯普庭的闹剧首先视为家庭的耻辱。只不过对这一耻辱反应特别强烈，因为这毕竟是“皇室”!“小屋”立刻对他们采取了军事行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牺牲品。而当另外一些皇室成员纷纷出面劝说，调停，要求拯救“皇室的荣誉”，驱逐格利什卡——“小屋”又迅速对他们采取了军事行动。流放开始了……

十六 最后一个宠儿和最后几次战役

为了加快工作进度，皇后亲自出马，赶赴大本营。安尼雅起初留守。她要去叶甫帕托里亚，然后陪同朋友和他的崇拜者回老家，朝拜瓦尔纳瓦发现的新“圣徒”的干尸。

在叶甫帕托里亚她认识了卡拉伊姆人加汉，此人后来被皇后戏称为她的“物件”。安尼雅甚至把他介绍给皇后，这个卡拉伊姆人一开口便对英国公使布坎南的阴谋和拉斯普庭面临的危险胡说八道了一通，说什么应该学会像安尼雅和俄国皇后那样察纳雅言，从善如流。

很快朋友便提出要求，希望也能允许安尼雅去大本营。他们去了。而且不止一两次。安尼雅写道：“皇后没有意识到她在那里是个多么不受欢迎的客人……外国军官们牢骚满腹：瞧，她又来向丈夫传达拉斯普庭的最新指令了。”“侍从们讨厌她的到来——这标志着政府中出现了转变……”

如此神圣的真话竟是出自安尼雅的笔下，简直难以置信。拉

斯普庭的指令在那里刚被迅速执行,他又用电报发出了新的指令。有一次,仅皇后在大本营逗留期间,拉斯普庭就发出了十道指令。

但时间不等人,需要物色新的内务部长。

格利高里没有忘记赫沃斯托夫的教训。他不再相信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他宁要"头脑简单一点"的。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傻"的。这样的人终于找到了:普罗托波波夫[8]。拉斯普庭已经不相信安尼雅,他要亲自对此人进行考察。主要方法是——拉着他大吃大喝,甚至到莫斯科去大吃大喝。没问题,"不错"……

9月,皇后约见普罗托波波夫,地点是"小屋",朋友在场。一次短暂的谈话,外加去一趟大本营——普罗托波波夫就当上了部长。而且比所有的前任都"结实"。他(还有皇帝)是执法机关,要服从立法机关——"小屋"。

我亲眼看到一位相当理智的、严肃的社会活动家,在听说普罗托波波夫被任命为内务部长之后,狂笑不止。而当我们拿到简报——内务部长与杜马议员和政治家们的第一次见面——我们险些笑破肚皮。

——这是故意的!这是谁杜撰的?

——这不是杜撰,这是半官方的简报……

普罗托波波夫每年都要住院治疗两三个月。出院后,一时还清醒不过来,成天失魂落魄、心不在焉的样子,要么谨小慎微得愚蠢,要么胆大妄为得幼稚。他的傻尽管带有躁狂的性质,但还没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皇后和拉斯普庭很珍惜这幸运的发现。至于安尼雅,没什么可说的。尽管安尼雅如今要讲:"我个人觉得普罗托波波夫是个性格软弱的人",可实际上,她跟他并没有什么区别,两个人都很

"简单",也都很听话。在"小屋"里,他当着她的面,对"敌人"——罗德济扬科、古奇科夫、特列波夫等——恶语中伤。然后,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张开嘴,开怀大笑。但时不我待,皇后认真道:"我们的朋友和加里宁(不知为何给普罗托波波夫取了这样一个外号)恳求你关闭杜马……要不是担心你心慈手软,一旦得不到我、安尼雅和朋友的支持,便会缴械投降,我就不给你写信了。赶快解散杜马吧。别忘了我们的朋友的梦。除了普罗托波波夫,你不需要接见任何人。布鲁西洛夫是个傻瓜,要禁止他乱说乱动……"

似乎感觉到仇恨的墙在移动(拉斯普庭什么也感觉不到,他对普罗托波波夫很放心,依旧沉湎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神吹胡侃),皇后开始变得紧张,近乎发疯。

他在信中已经几乎不提孩子,不提家事。谈起皇亲国戚——只有责备和要求:"流放他们吧,制止他们吧……要知道,你是皇帝!"几乎想不起儿子:他一直在大本营里,法国教师吉里亚尔把道理说尽,再三向她证明这对孩子的身心没有好处——她就是不听。对她来说,丈夫和儿子已经奇怪地融为一体,融为同一个概念——"皇帝"。"继承人"留在皇帝身边,就等于是对他的存在的肯定。她当然认识不到这件事有多么可怕,却要反复说:"孩子和你在一起……为了应该使你变得坚强的孩子,你要拿出皇帝的权威来!"

在她的心目中,拉斯普庭早就成了基督的化身。"书呆子和伪君子像排斥基督一样排斥他……"他们在安尼雅的"小屋"里几乎天天见面。白天是部长们,主要是普罗托波波夫,晚上是朋友,还有他的(上帝的)指点。

除了打仗的事(他们处理得很细致),还有一个内部问题——食品问题。朋友坚持认为,跟大本营接洽是浪费时间,不如皇后亲自处理。

“原谅我做了这件事。不过朋友说，这是绝对必要的。”她把紧急文件发往大本营，要皇帝批准把食品问题移交给普罗托波波夫负责：“此事要赶在杜马之前。我不得不迈出这一步，因为格利高里说，只有这样普罗托波波夫才能解散所有的联盟，从而拯救俄罗斯。”

杜马，所有的联盟……接着是直言不讳：“在对它们的战争中，我们必须保持强硬。”

安尼雅的角色变得模糊起来：她不过是皇后与朋友的“联络员”。每天早晨她都要提着公文包，风风火火地往返于皇后和拉斯普庭之间。然而，就连她也感觉到了，气氛在变得紧张，大本营里好像有人要谋反，要把皇后“关进修道院”……拉斯普庭镇定自若。他只关心一件事——要把普罗托波波夫留住。“有他在，一切都好说。”

而“无耻的敌人”，杜马和所有其余的人，乃至某些羽翼尚未丰满的部长，却在群起攻击可怜的“加里宁”。他们真是“无耻”之极，竟然要求撤换傻头傻脑的部长，“掌管一切”的部长。

皇后的信变得越来越狂暴。信中如今只有一个内容：“保住，保住普罗托波波夫。别撤换，别撤换普罗托波波夫。”不谈理由，没有劝说和请求：翻来覆去，一天五六次，六七次，总是那几句话。意在敲打皇帝。

11 月 13 日，皇后按捺不住，带着安尼雅又来到大本营。拉斯普庭天天给那里发电报，措辞含糊，忽而危言耸听，忽而和言悦色，故意拐弯抹角，但中心只有一个：要保住“加里宁”。“这位加里宁是我的保证，而您只消拿出一碗粥就能养活他。把权力交给一个人吧，为了诺维依能用理智工作。”（译注：拉斯普庭原姓诺维赫，由于拉斯普庭一贯不讲文法，文理不通，故“诺维依”疑是“诺维赫”之误。）

一边是“敌人”此起彼伏的抗议声，一边是皇后连续不断的施压：“不能换人，不能换人……你要拍案而起，决不让步。一国之主是皇帝，而不是杜马！”

直到12月与皇帝匆忙见过一面以后，皇后才松一口气：“我们的辛苦没有付诸东流。你赢得了斗争的胜利，保住了普罗托波波夫。保持强硬吧，不要屈服。我会同你，同柔弱的儿子（他又跟父亲去了大本营）患难与共的。你需要掌握主动，上帝的使者告诉你：要行动。”

普罗托波波夫的事，皇后已经高枕无忧，但对“敌人”的怨恨却在变本加厉。

“我们的朋友请求你关闭杜马，安尼雅和我为此给你写过信。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皇帝。要做彼得大帝，伊凡雷帝，保罗皇帝……要把利沃夫发配西伯利亚。古奇科夫，米留科夫⑨，波利瓦诺夫——统统发配西伯利亚……”

眼看大难临头，她还在说：“米留科夫怎么还没抓起来？内阁为何如此软弱无能？别再拖延了，亲爱的，相信我们的朋友和普罗托波波夫的建议吧……”

所谓建议，就是建议皇帝采取镇压手段。为之奈何，战争毕竟是战争！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皇后写最后一封短信时竟会如此惊慌失措：“我不相信，我无法相信他会被杀死……赶快回来吧……”

报载：“一个人去找过另一个人，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人。事件发生后第一个人失踪了。另外几个人中的一个宣称，第一个人并没找过第二个人，尽管知道，第二个人深夜里来找过第一个人。”云云。

拉斯普庭是在酒桌上被杀死的。杀他的是皇室成员和杜马的极右议员普里什凯维奇。

这一暗杀事件绝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抵御俄国政府——其实是"小屋"政府——向其所有臣民发动的战争的第一次行动。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交战双方凡是参加战斗的，都遭到了灭顶之灾，没参加战斗的，几乎也全都未能幸免于难。

渐趋冷清的战场上走来一伙局外人，俘虏了他们。

十七 "再见了，亲爱的……"

6月的傍晚。我还是站在那个阳台上。右边，围墙后面，是道利达花园的参天大树。依稀可见那座宫殿宽阔的圆顶，但这已经不是杜马，而是"乌利茨基⑩的行宫"。而那条笔直的大街也已不是大街，而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跟三年前一样(才三年!)，小道上依旧撒满夕阳的余辉，它的尽头依旧消失在金色的暮霭中。

光脚赤足、衣不蔽体的孩子们在人行道的地砖缝里淘气地乱挖乱刨。对面——是一栋肮脏的、墙面已经脱落的房子。窗户开着。窗台上躺着——一些士兵。

也有可能不是士兵。假如当年那些排成整齐的方阵，潮水般通过街角，唱着"再见了，亲人，再见了，朋友"，消失在夕阳余辉中的是士兵，假如他们是士兵，眼前的这些就不是士兵。只不过是农村的小伙子，无事可做的青年农民，不知为什么都穿着护身的短上衣，皱皱巴巴，不系扣子，或者是没有扣子。

这些敞着肚皮躺在窗台上的农民，把痰吐在马路上。在他们身后，在房间里，一台老式带喇叭的留声机在咿咿呀呀地播放音乐。放的是一首由男高音演唱的欢快的爱情歌曲，但唱片已经走调。

不会再有战争——同"威廉皇帝"的战争了。也许哪个偏远的地方，太阳还在滚动的地方有，但何必朝那儿看呢？士兵们不

会朝那儿看。他们朝下看,朝人行道上看,朝他们吐痰的地方看。他们跟威廉皇帝如今已经讲和,如果说,他们认为讲和是“奇耻大辱”,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和平与生命的宝贵,一如他们不懂战争与死亡的残酷。

街道如阳光照耀下的荒漠。就连淘气的孩子们也不见了。远远地,远远地,在半俄里以外,出现了一个过路人。还能看到人,真是奇迹!此人正朝我们方向走来。

很快我便认出来了这是谁。凭熟悉的、一瘸一拐的步态。这是瘸了腿的安尼雅。她虽然拄着拐棍,但情绪很好,走起路来格外精神,转眼间便到了我们近前。她穿一件朴素的短上衣,一条黑色的旧短裙,腋下夹着一个纸包——她又搞到吃的东西了。

她看见我们,便在阳台下站住,同我们攀谈起来。她是到我们这栋楼来。先是在一个熟人的家里待了一会儿,然后来到我们家。

她坐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沙发椅上,虽然有些吃力,但身板很直,一双圆圆的眼睛犹如水晶,或是玻璃。她讲起自己的事。

她又进了一趟契卡。大概是一个义务护士告的密,此人盗窃契卡财物,甚至想把地毯也给拖走,被抓住了……安尼雅又一次受到审讯,审讯了整整一夜,好像她还没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交代清楚。还算客气,没有折磨她,很快就放了回来。

——您应该离开这里,安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如果可能……

我低声说道。

听了我的话,安尼雅提起一位“隐士”,说他尚未让她逃走,他让她留下。这位隐士住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他在那儿已经隐居了25年,直到最近才抛头露面。安尼雅有幸见到他,跟他交谈过。他说得多好啊!无法形容。确实是上帝派来的。安

尼雅如今经常到修道院去找他。就是他不让安尼雅出走。他让她留下……

安尼雅说“让不让”这几个字时，发音很特别。她需要别人对她发号施令，犹如呼吸之于空气。我不认为这位隐士能取代拉斯普庭在她心目中的位置。这只不过是本能的，必然的探索的开始。这样的探索将会很多。

安尼雅当然没有忘记拉斯普庭。不，从本质上说，她是忠实的，天生忠实。她永远不会出卖拉斯普庭，哪怕将她千刀万剐。但拉斯普庭已经死了，而她还活着。为了活下去，她需要“上帝”的帮助。这帮助既是神奇的，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要知道，安尼雅是唯物主义者，跟皇后一模一样。只不过皇后是积极的唯物主义者，而安尼雅是彻头彻尾的消极唯物主义者。为了实实在在地活着，她必需失去自我，把别人的意愿化为自己的意愿，愉快地听从别人的指令。到头来，上帝对她是形同虚设。可她确实需要一个可以当做上帝来信仰的人。

我注视着安尼雅的眼睛。倾听着她孩子一般含糊，却并不可笑的唠叨。可悲吗？不知道。奇怪的是，一个故事刚结束，另一个故事又开始了，或许，比前一个更可怕，然而这已不是安尼雅的故事了，而是另外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安尼雅好像一个活的影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犹如从一个虚空进入另一个虚空——她什么也不知道，始终如一，不怕伤害。

而且，似乎好极了。她是有过错，严重的过错，可谁该为此负责呢？是不能说话的皇帝，虚无飘渺的幽灵？是被凌迟处死、烧成灰烬的皇后？是被成功冲昏头脑、荒淫无度、好酒贪杯的西伯利亚农夫？或是这位长着一双清澈的眼睛、一张圆脸的俄罗斯宫中女官，瘸了腿的安尼雅？

谁都一样。谁都一样。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挽回。回顾历

史，理解历史，牢记历史，目的不是谴责什么人，报复什么人，而是要为现在，更重要的是为将来借取一面镜子。故事还得讲下去……

窗户依旧，金色的阳光依旧，街道依旧：

再见了，亲人，
再见了，朋友，
再见了，我的
亲爱的新娘……

安尼雅还在唠叨，对面的留声机还在低吟。我听而不闻，我为将来感到恐怖。我好像看到——一支无形的军队正在窗外行进，行进，涌向夕阳，在夕阳下消失……

再见了，朋友，
再见了，我的
亲爱的新娘！

1923

译注：

① 安·阿·维鲁波娃(1884—1929以后)，宫廷女官，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私人朋友，拉斯普庭的崇拜者。

② 皇后：指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妻。

③ 格·叶·拉斯普庭(1872—1916)，又姓诺维赫，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的宠信。农民出身。被视为预言家和神医，对沙皇、皇后及其亲信极有影响，干预政务。后被保皇派杀害。

④　戈耶(1831—1894),俄国画家。

⑤　弗·瓦·斯塔索夫(1824—1906),艺术与音乐评论家,艺术史家。

⑥　伊·叶·安德列耶夫斯基(1831—1891),法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

⑦　阿·尼·赫沃斯托夫(1872—1918),1915—1916年间任内务部长和宪兵司令。后被临时政府逮捕并枪决。他的姓在俄语中是“尾巴”的意思。

⑧　阿·德·普罗托波波夫(1866—1918),内务部长(1916—1917年2月),拉斯普廷的傀儡。

⑨　彼·尼·米留科夫(1850—1943),立宪党人的组织者之一,第四届杜马进步集团领袖,临时政府外交部长。

⑩　莫·索·乌利茨基(1873—1918),俄国革命活动家,俄共党员,法学家,曾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肃反委员会主席,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耽于沉思的朝圣者——回忆洛扎诺夫

"朝圣者,只是朝圣者,到哪里都只是朝圣者……"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甚至是'被拉着急驰',而不是自己行走。有种'天然的,而非人的东西'。"
"我身上有种骇人听闻的东西:这便是我的耽于沉思。"
——瓦·洛扎诺夫:《隐居》

第一部

一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洛扎诺夫

关于洛扎诺夫,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该写的,他自己全都写了。

而且写得那么精彩,以至在他生前无人能写他,在他死后还是无人能写他,因为……

有很多很多的"因为"。但主要的是:他是那么与众不同,那么遗世独立,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旁边,以至与其说他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是一个"现象"。而且无论

如何他不是个作家——他算什么作家啊!写作,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倾诉”,在他那儿只不过是一种功能。机体会呼吸,会把这件事做得异常出色,精确和持久。洛扎诺夫就是这样写——“倾诉”——他所感觉到的一切,他在自己身上所看到的一切,而他对自身的观察是经常的,仔细的。

作家的写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便最成功的写作也毕竟是“近似的”。也就是说,感觉(或思想)是一回事,用文字来表达这一感觉又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永远存在距离。但洛扎诺夫没有这种距离:无论好坏,这都是心灵的波动本身。

“我心灵的每一次波动都伴随着倾诉,”洛扎诺夫强调并补充道:“这是本能。”尽管他知道,他与众不同,但他不是始终明白,问题的原因何在。拿自己跟别人做比较时,他时而胆战心惊,时而假装“满不在乎”。他说,这样也好,他不想隐瞒什么。“道德?我甚至从来不知道这个词是如何拼写的。”

因而有人指责洛扎诺夫厚颜无耻。纵然是公允的指责,也会明显地失之公允,因为把人类一般的尺度和通常的要求加在洛扎诺夫头上,至少是不明智的。他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但要看到这一点,就必须换个角度。否则就会忽略和损失这笔财富,让洛扎诺夫不幸而言中:“我是不被需要的,除了我是不被需要的这一点,我对任何事情都不这么自信。”他,除了“自我”,还逗留在自己旁边的某个地方,他自己也不知晓的某个深处。

“有时我感到自己身上有种骇人听闻的东西。这骇人听闻的东西就是我的耽于沉思。这时什么都别想进入它的范围。

我就像一块顽石。

而顽石是阴森可怖的巨怪……

……在沉思中我什么也不能干。

而从另一方面讲，我又什么都能干。

《罪孽》

后来我变得郁郁寡欢：但为时已晚。它已经吞噬了我和我周围的一切。”

不过当然，洛扎诺夫身上也有“人性的东西”。他也谈论它，并以魔术师的才能准确地将它化为文字。不错，他是一种现象，但毕竟还是人的现象。

继续解释下去是没有作用的。只有揣摩他的“倾诉”，洞察他“手书的心灵”，才能感觉到洛扎诺夫是这样一个人。但也可能感觉不到。如此则任何解释都是无用的：洛扎诺夫确实是“不被需要”了。

不过，考虑到洛扎诺夫这一对我来说是十分明显的特殊性，我谈论的将是他这个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生活的，以及我们交往的环境。有时我将借助洛扎诺夫本人，借助他的自述——要知道，同样精确的文字世上再也找不到了。

此外我别无他法。

可惜，我手头没有他的信，无论早期的，还是临终的。就连他的书（确实如他喜欢形容的那样，是“手书性的”）我也只有两本：《隐居》和《落叶》第一卷。

二　春天的时候

一个墨绿色的2月的傍晚，我们第一次从洛扎诺夫家返回，走在彼得堡老城区木板铺成的人行道上。洛扎诺夫当时（1897还是1898年？）住在巴甫洛夫街一幢很小的房子里。

刚下过雨，破碎的黑云还在头上游动，木板和地面很湿润，刚发芽的白杨树的嫩叶散发出春天沁人心脾的气息（这样的气息只有俄罗斯，只有北方才会有）。

——是的，这就是春天；春天！

费洛索弗夫说（他跟我们一起去的洛扎诺夫家，还有一个人）。

我们全都在默默地想着春天，所以对他说的并不感到惊奇。

——春天。“粘性的嫩叶”……而您对洛扎诺夫有什么想法？

于是我们议论起洛扎诺夫。

我已经全然忘记了是谁介绍我们和他相识的。可能是年轻的哲学家施佩尔克吧（他英年早逝）。但我们早就听说过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作家，从事婚姻问题的研究。出于这个问题（婚姻和生育）的需要，也关注犹太问题。在外省当过老师（跟索洛古勃一样）。

晚上，在巴甫洛夫街自己家中，他给我们的印象是确实很有意思。其貌不扬，但中等个，肩膀有点宽，戴眼镜，清瘦，总是忙来忙去，不知是腼腆呢，还是大胆。说话很快，很流利，声音不大，样子很特别，好像无论说什么，都带有一层隐秘的色彩。就像是窃窃私语。对“问题”他无拘无束，用“自己的话”（的确是自己的话，贴切，准确极了，因而也有几分生涩）娓娓道来。

在窄小的客厅里，他的妻子，一个憔悴、年轻、不起眼儿的女人，为我们沏茶。她当时有个吃奶的孩子（好像是第二个）。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洛扎诺夫的继女，浅色的头发上绷着一把小梳子，腼腆地躲在角落里眨巴眼睛。

家里很清贫。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清贫，拮据，窘迫。洛扎诺夫当时在监察机关任职。一看便知，这真是荒唐透顶。

要知道，从外表来看，他也许确实像一个官员，一个“小得可

怜”的官员(关于这小公务员的外表他说过,写过,忿忿不平过多少次啊),可是他,见鬼,又算个什么监察官呢?只不过是无处可去罢了。

我不知道,他曾是个怎样的老师(他讲过一些),不过我觉得,他之所以当老师,大概也是因为无处可去吧。

三 永远独处

好像从1900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洛扎诺夫开始接近彼得堡文学美学界。他汇入这股潮流了吗?绝对没有。他内里是“不屈不挠”的。但他温和,可爱,有趣,所以就逐渐成为受到普遍欢迎的客人,尤其是所谓的“唯美主义者”,对他更是翘首以待。他跟当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艺术世界》的圈内人士也建立了友谊。

洛扎诺夫经常到我们这儿来。顺便说说,当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年轻的索洛维约夫信徒,洛扎诺夫的忠实崇拜者佩尔卓夫。佩尔卓夫是个相当有意思的人物。外省人,固执,内向,谨慎(特别内向可能是因为失聪),对所有新生的流派非常敏感,拥有非凡的哲学头脑。作为作家,他本人的水平堪称低下,但论对文学的热爱,对艺术的理解,他是虔诚的,有悟性的。

他们是如何成为朋友的——言谈举止最为隐秘,甚至跟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能保持隐秘的洛扎诺夫和一动不动、举止木讷的佩尔卓夫?不可理解,但却成了朋友。洛扎诺夫像温柔的浪花一样涌向他:“亲爱的,亲爱的,这算怎么回事呀!咳,您怎么谈恋爱呢?要知道,这可是窃窃私语,而您又听不见。这种事情又不能满屋子喊。”

佩尔卓夫的嘴角在浅黄色的长须后面哑然一笑——既不生

气，也不回答。

有一次，在《艺术世界》编辑部，洛扎诺夫跟另一个还要谨慎、呆板（如果说佩尔卓夫是木讷）的人讲话，就没那么投机了。

编辑部经常的"核心"，团结友爱的小组，成员有：加吉列夫①，费洛索弗夫，别努阿②，巴克斯特③，努威尔④和努罗克⑤（已故）。他们的身边还聚集了许多亲疏不同的人。每周三编辑部里开会，尽管人不太多：有选择地邀请。洛扎诺夫喜欢这"人不太多"。不过他无论在何处都有点独来独往，或者跟某个人单独在一起，形影不离，而且哪儿也不去：他就是这样的姿态。要么是谁也看不见，要么是一次只看到一个人，并跟这一个人打招呼。

没有丝毫的忧郁：快活，甚至顽皮，镜片后面是一副略带散漫的目光，样子看上去极容易与人接近。

在《艺术世界》的餐厅里喝茶时，洛扎诺夫突然凑到一言不发、和平常一样呆板的索洛古勃跟前。

索洛古勃和洛扎诺夫之间没什么交情。即便是在洛扎诺夫的"复活"达到鼎盛、家里经常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可不是有选择地邀请）的时候，我也不记得索洛古勃去过。

然而，对洛扎诺夫与生俱来的隐秘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洛扎诺夫于是乎便凑到了索洛古勃跟前。

——怎么回事，亲爱的，您怎么光是坐着，一句话也不跟别人讲。这是什么颓废派呀。看着您，说实话，我发现您不是人，而是穿着礼服的砖头！

这时，大家全都沉默不语。索洛古勃也沉吟片刻，然后单调、冷酷而清楚地说道：

——而我发现，您很粗鲁。

洛扎诺夫不响了。他一向温和、客气，现在竟有人说他粗鲁！不过，这也是一句真话：他可能确有粗鲁的一面。

小小的风波马上被敷衍过去了，而洛扎诺夫当然没有学会有选择地与人保持隐秘关系：他的隐秘是天生的，万难改变的，特别的——既可爱，又讨厌。

四　最接近未出生的人

一天早晨，洛扎诺夫坐在铸造街穆鲁吉公寓我们家窄小的饭厅里，跷着二郎腿，一条腿悠来悠去，在一张大纸上写着什么东西——蝇头小字，如果不熟悉他的字体，谁都看不懂。他要尽量在一面写完，不喜欢翻过去。

他在赶一篇稿子，是要就宗教一哲学会问题，对什么人给予答复，批驳，还是对会议报告做些补充——反正一样。

他穿着褐色的皮筒靴，靴头很大。灰色格子裤，很肥。抽的始终是一种填充式的卷烟，两头封住的。(每逢星期天，在聚集了各路来宾的家里，他总是坐在长长的茶桌旁自己动手卷烟。背对窗户，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也是跷着二郎腿。)

我们早就看惯了他的脸，如今，一点“小官员”的痕迹也找不到了。浓密的络腮胡介于浅红和淡黄之间，面部平平，略微发红。而眼睛——突然间如此生动，如此顽皮，而且若有所思，以至让人感到愉快。

可洛扎诺夫总是不能满足，他经常反复说：

——要知道，我本来可以是个漂亮的人。可却不是：都怪当过这讨厌的老师。

后来他把这些写进了《隐居》。

“这别扭和讨厌的姓还附带给了我一副其貌不扬的外表。读中学时，当别的同学放学回家了，我却站在走廊里的一面大镜子前，不知‘偷偷地流过多少眼泪’。面颊通红，皮肤不好看，而且发

亮(不是干性的)。头发简直是火红色(中学生的),朝上直立着,却不像高贵的‘刺猬’(男人性格),而像汹涌的波涛,怪模怪样的,没见过有谁像我。我抹了发蜡,可头发还是不服贴。回到家,再照镜子(拿在手上的小镜子):‘唉,谁会爱上这么讨厌的人呢?’简直太可怕了。……可我在心里还是免不了要想:‘不,这可完了。女人永远不会爱我,没有一个女人会爱我。躲进自我之中,跟自己,为自己(不是利己主义的,而是精神上的),为将来而活着吧。’”

不过,他又补充道:

“如今,洛扎诺夫这个讨厌的姓甚至让我喜欢。补充一下:我从小就喜欢穿过的破旧衣服。‘新衣服’总是让我坐立不安,甚至浑身难受。”“我简直没有形式……一团乱麻。但这是因为,我整个是精神,整个是主体。主体的东西在我身上的确无限发达,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有谁能同我相比。‘太好了……’我是‘最最接近未出生的人’,仿佛‘还躺在母体中(如一团乱麻)’——我无限爱她,去世的妈妈——并‘倾听着天国的歌声’(我似乎总能听到音乐,这是我的特点)。‘太好了!好极了!’但我本身(在自己之中,在一团乱麻中)让人感到无限的兴趣,而灵魂既老成持重(好像我已一千岁),又天真年少(好像我还是一个孩子),我要一副‘漂亮面孔’和‘新衣服’何用?好!真好!……”

洛扎诺夫每一次即时的“倾诉”(记录)都是相当精确的。他的写就等于说:字里行间都听得见他的嗓音,他的话音,急促,亲昵,如窃窃私语。同时还有毫无保留的坦率:向人人敞开心扉,也就是不向任何人敞开心扉。

洛扎诺夫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环境里,在任何时候都能写作——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能影响他。而且写得一样好。要知道,对他来说,这不是“工作”,而是生命,呼吸。

洛扎诺夫已经通行无阻,他在《新时代报》编辑部备受赏识。持续不断地在那儿发表短小精干的杂文。苏沃林给他出书。年迈的苏沃林,这位举足轻重的俄国虚无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行我素者”,是个独具慧眼的人,对“才俊”宠爱有加。就像从前他帮助契诃夫一样,现在他又向洛扎诺夫伸出了援手,并不在乎洛扎诺夫是多大程度上的“《新时代报》分子”。或许他也清楚,无论如何,洛扎诺夫都不会对任何一家报纸、对任何一件事情抓住不放,他会到处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不理睬周围的人想法如何。在编辑部里,人们并不认真对待他,他的文章也远非每一篇都被采用,但有时他们会利用他的才能,让他急就一些应景的东西,他不动地方,眨眼间就能写出来,而且写得很精彩。好吧,只要他们接受“洛扎诺夫性格”,他也就衣食无忧了。

我们全都对《新时代》袖手旁观。但洛扎诺夫本能地原谅了它的“苏沃林作风”,原因很明显:他不是“他们的人”(他谁的人也不是),他不过是“为孩子挣牛奶而已”,他自己也乐意承认。这时他已有三个或是四个孩子。

所谓的“洛扎诺夫问题”——主要是指活在他体内,始终支撑着他,渲染他的各种表现的东西——就内容而言,要比形形色色的唯美主义宽泛,显然也要比形形色色的“政治”宽泛。它可以用两个词给出定义,但在洛扎诺夫心中,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寻常地交织在一起、存活于一个统一体的。这便是上帝和性。

洛扎诺夫是从上帝走向性呢,还是从性走向上帝?都不是。上帝和性对他而言——说得粗俗点——就是一个炉子,意味着永远要另起炉灶。当然,“关于上帝”问题因而变得十分新鲜,具有了洛扎诺夫意味。关于性的问题同样如此。后一个“问题”在当时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噤若寒蝉,羞于启齿的,一旦把它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怎能不引起各界一片哗然,褒贬不一呢?

也许不应该说各界，而是一些“小组”。毕竟“唯美主义”也好，彼得堡其他初露端倪的流派也罢，都只是一些小组。加之洛扎诺夫身上有着明显的“家常特点”和“自造特点”，故很难想象他的影响会扩大到“各界”。

五 精神之父

在洛扎诺夫所关心的领域里，“教会”是个令人忐忑不安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妻子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是一位牧师的遗孀，笃信东正教。不，是个人内在的纽带将洛扎诺夫和教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他对基督教和基督的态度，教会问题对他来说具有了自己的色彩。

然而，宗教—哲学会的思想不是诞生在洛扎诺夫家里，而是诞生在我们的一些文学美学小组中。这些小组当时已经开始解体。纯美学已经不能使人满足。新的争论和谈话早就在进行。人们想把这些家庭的争论扩大——把彼此间的隔墙推倒。

实际上对彼得堡知识界来说，宗教问题也是初次予以关注，也是生疏的，更不用说还关系到教会问题。神学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未知的世界。我们笑了：要知道，一块铁幕在尼古拉火车站附近将涅瓦大街一分为二。铁幕那边，通往大寺院的路上都有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对教会的代表人物一无所知，就无法讨论教会问题。应当设法拉起铁幕。

迟早会有人写出一部宗教—哲学会早期会议的历史的。这一切颇费艰辛。至于开放的协会，连想都不敢想。哪怕能够获准办成私人性质的也好啊。

关于宗教—哲学会的想法立即得到洛扎诺夫的热情支持。他家里已有一些普通的神职人员常来常往。跟他们认识很方便。

一条通向严实的铁幕那边的小路逐渐有了眉目。

可预先讨论行动方案却很少让洛扎诺夫参加。在需要实践设想和策略的时候，他总不宜在场。一般说来，跟他打交道要小心谨慎。他天生不懂"保密"，他不但会平白无故地把什么都告诉妻子，甚至会逢人便说。（跟他这个最为隐秘的人，最难保持隐秘。）

因此我们只是简单地对他说：我们现在要去哪儿或找什么人，申请什么。我们带上他，他便跟我们同去，这时，他往往会灵机一动，发挥他的作用，显得非常可爱。

宗教--哲学会，半私人性质的，终于批下来了。铁幕拉起来了。真是太好啦！主席是谢尔吉·芬兰斯基主教，当时任神学院院长；副主席是谢尔吉大主教，宗教学校校长，一个凶狠、英俊的僧侣，白净的双手上戴着戒指。这一切得到安东尼都主教的赞许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的默许。我们的主要王牌是"拉近知识界与教会的距离"。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手下斯克沃尔卓夫的虚荣心帮了我们的忙。这是一个善于钻营、头脑不笨，但举止粗鲁、身材矮小的乡巴佬。作为一名以残酷著称的传教士，他其实心地善良，可他的虚荣心，要打进"好的团体"的愿望实在是滑稽之至。他非常喜欢"拉近教会与知识界的距离"这一想法。他甚至幻想将自己的《传教评论》变成一本货真价实的"杂志"。

很惭愧，我们时常拿他开心，用一些最为暴露的笔名，几乎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莱蒙托夫的主人公，给这本"杂志"投寄各种各样的信件。无辜的斯克沃尔卓夫没察觉，还自豪地刊登了这些来信。考虑到他的传教士的奇谈怪论，我们没让他参加宗教—哲学会的活动。

斯克沃尔卓夫很自然地成了洛扎诺夫的朋友。洛扎诺夫家的"星期天"热闹非凡，成了小型的宗教—哲学会议。每星期也在

我们家聚一次。

然而奇怪:整个这“铁幕那边”的世界,精神的和教会的世界,投靠的主要是洛扎诺夫,觉得跟他在一起更舒服。可要知道,洛扎诺夫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异教徒”,而且相当危险。宗教—哲学会的活动好像是以他关于婚姻与性的报告拉开帷幕的,报告极有诱惑力,争论持续了三个晚上。

有一次出了这样一件事。

洛扎诺夫在会上不但没有上台发言,而且很少开口。这是怎样的“发言”啊,他写出来的报告,却没有一个他能够自己宣读。都是别人替他念。对别人的反驳,他把答复在下次开会前事先写好,而宣读又是找人替他。

有一回他请神学院年轻的副教授阿·卡尔塔舍夫代读两三页长的反驳稿。卡尔塔舍夫当时是第一次从“尼古拉火车站附近的铁幕那边”,从另一个世界,跟全体“神学”青年一起,来到彼得堡。顺便说说:这些“出行者”的身上,有很多令我们惊异的东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修养跟我们全然不同。但更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顽固的理性主义。这就是那些“神学”青年!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和卡尔塔舍夫值班,坐在会议厅门口登记入场的会员。会议一开始,我们就关了门。在一张勉强看得清的小桌旁边,我们小声交谈起来。年轻的卡尔塔舍夫当时的轮廓很像晚年的果戈理。

——我信吗?假如能像童年时那样信就好了……但却不能……理性……理性……

他一边坐下来,一边低声说道。

就这样,卡尔塔舍夫同意替洛扎诺夫宣读反驳稿(稿子绝对没有恶意)。他宣读了。第二天即被传唤到安东尼都主教那里,受到这位相对“自由”和温和的主教大人的严厉训斥。他本想为

自己辩解,说“我只不过把自己的嗓子借给了洛扎诺夫”,可刚一开口,就听到一句:

——下不为例。

卡尔塔舍夫走了,如果说他没被刺伤,那只是因为他习惯了。他们那里管教严格,对上级要绝对服从。

是的,在东正教高层的眼里,洛扎诺夫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异教徒”。可究竟为什么宗教界人士接近他要比接近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容易一些,简单一些,乐意跟他来往,跟他交朋友呢?

六 勤勉的“异教徒”

“东正教”发现了洛扎诺夫的“离经叛道”,并简单武断地称之为“反宗教”。它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这位“反宗教者”都说了些什么呢?

“放弃才华,放弃文学,放弃未来,放弃荣誉或名气……我轻而易举;放弃幸福,放弃安宁……我不知道能否做到。但放弃上帝我永远不能。对我来说,上帝乃是最大的‘热源’。跟上帝在一起,我感到最为温暖。跟上帝在一起,永不寂寞,永不寒冷。

“归根结底——上帝是我的生命。

“我为他而活着,通过他而活着。脱离上帝——我不存在。”

还有:

“如果你把祷告从世界的本质中取出,让我的舌头,我的智慧同祷告语言,祷告事业,祷告本质分离,让我不能祷告,别人也不能祷告,我会瞪大眼睛高声吼叫着跑出家门,跑啊,跑,直到倒下。没有祷告简直无法生活……没有祷告,这是恐怖和疯狂。

“但这一切只有在哭的时候才能理解……如果一个人从未哭过,也不会哭,该如何跟他解释呢?”

或者还有：

“上帝啊，上帝，你为何会忘记我？莫非你不知道，每当你忘记我，我就会迷失？”

洛扎诺夫的“离经叛道”本身来源于他对上帝的世界的宗教性的爱，来源于他对世界，对整个肉体的宗教性的兴趣。但东正教徒中有谁懂得，怎会懂得，何须懂得这一点呢？只有极少数人感觉到了。例如，异常深刻和迷人的乌斯廷斯基神父（他住在诺夫戈罗德，偶尔来彼得堡），可能还有捷尔纳夫采夫⑥，当时风华正茂，无拘无束。意大利血统赋予他巨大的生命活力。他整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似乎也很有才华。

而其他一些“宗教界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跟洛扎诺夫友好相处，能够谅解他对他们的猛烈攻击，那是因为：他热爱一切肉体的东西，对“教会的肉体”，对东正教，对东正教的生活方式、习俗和礼仪敬若神明。他饶有兴味地身体力行，把灵验的圣像迎引到家，每次祷告完毕都要钻到圣像下面（遵照旧俗）。干什么都那么勤勉，那么动情。

正是因为这勤勉和“诚恳”，神父们才对洛扎诺夫赏识有加。至于“离经叛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对他稍加防范，不让他伤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羔羊就行。

七　宗教—哲学会

开展活动才一年，宗教—哲学会便得到迅猛发展，尽管要成为它的会员并不容易，而“客人”根本不邀请。

地理学会那个不算大、角落里有一尊庞大而可怕的佛像（每到晚上开会时，便用什么东西把它盖上，以消除“诱惑”）的会议厅大概从未见识过这么驳杂的“语言”，如果不是部落的话。这里

有高级僧正,也有毛茸茸的狮子伊诺肯季,有修士大司祭,有主张禁欲的费欧凡(此人后来曾举荐拉斯普庭入宫),也有头戴羔毛帽、高大粗鲁的青年好汉安托宁(如今成了“鱼饵”)。这里有唯美主义者加吉列夫和《艺术世界》的全体同仁,也有世俗的大学生,神学院的大学生。有不同年龄层次的女士,也有名副其实、谨小慎微,但怀有好奇心的知识分子。

休息时博物馆里人声鼎沸,全都涌进后面供应茶水的房间。

洛扎诺夫肯定躲到某个角落里去了,而且肯定是被某一个人掩蔽起来了,在跟这个人密谈。

会议的秘书是捷尔纳夫采夫推荐的,名叫叶菲姆·叶,是他的朋友。“卷发的瓦连京”当时用形象的语言,哈哈笑着说:

——叶菲姆是一条狗。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秘书了。我要对你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一位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然,狗毕竟是狗,但这是一条机灵的狗。

叶菲姆确实派上了用场。他就像一条真正的“狗”,为会议看守大门,监督支出报告,还马上跟“牧师们”交上了朋友。特别是跟安托宁修士大司祭。他们一起逛小饭馆,叶菲姆肯定会给自己要一份素食,而安托宁肯定会要一份荤菜;他们还一起到我们家来;一旦安托宁在城里“迟迟不归”,那一定是住在叶菲姆那儿了。

跟神学检查机关叶菲姆也建立了友谊。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我们的《新路》杂志刚刚起步的时候。

但关于杂志以后再说。我在此只指出我们这位“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的秘书与神父们非同寻常的交情。至于“自由主义”——未必是60年代的遗教在他身上根深蒂固。几年后经洛扎诺夫推荐,他进入《新时代报》工作,并因通晓多种外语,一

直留任国外部主任一职。

在此，我不能不回忆起一个“新鲜但却难以置信的故事”。要知道，大战期间，曾有三个不道德的人以“俄国新闻出版代表”的名义访问英国，他们中一个是楚科夫斯基，一个是在《新时代报》任职的从前那条“狗”，再一个就是如今被布尔什维克可耻地收买了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可惜，没把瓦西列夫斯基-涅布克瓦也拉去。加上他，“代表团”就完整了。

八　令人头疼的老太婆

1902年夏，我们去了伏尔加河对岸的谢苗诺夫城。我们会同尼日戈罗德的两位神父，从该城出发，奔赴克尔热涅茨以外的光明湖（“吉特日城”），与分裂派教徒座谈。

回来途径尼日尼时，我们顺路到我们的一个同行者尼古拉神父家告别。这是一个大嗓门、能吵闹、好激动的人，在光明湖与那些守旧者争得声嘶力竭。

外省的“宗教界”女士在“首都客人”面前显得谦和而腼腆。很少有哪位牧师的妻子不是把茶端到客厅便马上躲开我们藏起来的。青年人要放得开一些，比如在尼古拉神父家，母亲跟另外几个闹哄哄的女人溜掉以后，留在客厅里招待我们的是神父年轻的女儿。

尼古拉神父还在嗓音嘶哑地谈论灵验的圣像，而女儿则给我看相册。

她一边给我看一边解释说：这个是姨妈……这个是叔叔尼科吉姆神父……这个是我们的熟人，家在科斯特罗马……

我看到一张大照片：一个头发灰白、皮肤白净的胖老太婆穿一件华丽的、带皱的裙子，很老派地、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她戴

一顶波浪式的包发帽，嘴唇绷得紧紧，用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盯着我们。

——而这又是谁呢？

我问道。

——这是我们的一个熟人。彼得堡一位作家的妻子。她姓洛扎诺娃。

——怎么会是洛扎诺娃？那位洛扎诺夫的妻子？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对了，就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妻子。她现在不在城里。她早就去了克里米亚。她家在我们斜对面。从阳台上看得见。

——指给我看。

我跟着神父的女儿走到拐角的一个小阳台上。楼下是一家面包店，巨大的金字招牌超出了阳台的铁栏杆，发出轻微的吱嘎声，略微挡住了暖和的、尘土飞扬的、用西瓜一般大的鹅卵石铺成的瓦尔瓦拉大街。

——看见了吧，正对面是一条胡同，左边第二个房子，灰色的，那就是洛扎诺娃家，她在那儿住过。

——那她的照片……是很久以前拍的吗？她有那么老吗？

——是的，她已经完全老了。可要知道，他好像也不年轻了。

我想反驳她说，洛扎诺夫"跟她相比，简直是个孩子"，正如伏尔加河对岸的人们说的那样，但神父的女儿在继续她的话：

——她很恶毒，恶毒得简直吓人。跟谁都过不到一起去，早就跟丈夫分居了。最后领了一个养女。本来是好事。可您想象得到吗，养女投河自尽了。她的性格实在太可怕。

我们回到客厅。在我端详照片上这位衰老不堪、眼睛恶毒而疯狂的女人时，神父的女儿又兴奋地对我讲了好久她的事情。

关于自己的这位妻子，洛扎诺夫从未对我讲过一句苦涩的话，指责的话，或者气愤的话。我们是从捷尔纳夫采夫等几位朋友那里了解到他第一次婚姻悲剧的整个情况的。不过，洛扎诺夫本人对此并不掩饰，他不时地对我们讲起他跟第一个妻子的生活，而且一讲就是很长时间。但没有一次是怀着怨恨，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在《隐居》里。而他似乎是可以这样的。要知道，她不光是在跟他共同生活的时候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就是在后来的整个生活中，仍对他纠缠不放。

对他的第二个妻子，信东正教的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来说，婚姻是一种宗教圣礼。她"不过是同一个已婚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一现实始终在折磨她，使她始终感到罪孽在身。但恶毒的老太婆死活不肯离婚。甚至到了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生病期间，捷尔纳夫采夫亲自出马，到克里米亚找她，希望她能成人之美的地步。他骂骂咧咧地讲起他空手而归的整个经过。阴险狡诈的老太婆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撅起嘴，厚着脸皮回答他："这是上帝的撮合，人无权把它拆开。"

捷尔纳夫采夫怒气冲冲地对我们说：

——是魔鬼，而不是上帝把十八岁的少年同四十岁的半老徐娘撮合到一起的！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半老徐娘啊！想一想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妇！当年她也是夺人所爱。是在他第一个妻子还在的时候。他妻子一死，她以为这下可好了，可以嫁给陀斯妥耶夫斯基了，可这是妄想，连他的影子都见不到了。

洛扎诺夫低声对我说：

——您知道吗，那段时间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一件事。每天吃完午饭我总要休息一下，然后起床——用清水冲洗一下脸。就是这件事留在记忆中了——洗脸时，感到冷水和热泪混合在一起。始终是这样，我忘不了。

——可您为什么不抛弃她呢,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唉,怎么能抛弃得了呢?我根本就没想抛弃她。对她总是怀有感激之情……毕竟我当时还是个孩子……

他对我讲起她严重的嫉妒心。在马路上监视他。有一次,他偶然跟一个女学生走在一起,她碰见了,像发疯了一样,当场给那个女孩一记耳光。

可这又算什么呢,疯狂的嫉妒。这种事并不少见。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情妇,洛扎诺夫的合法妻子,情况要复杂些。

她的嫉妒当然不是出于对一个不成熟的老师的爱,她不理解他,他也满足不了她。迫使他每天用拌着眼泪的水洗面——她觉得舒服,没有话说。然而,生活不止这么简单。她越老越风流,在莫斯科,她经常用放荡的目光盯着那些男大学生,年轻但却使她厌倦的丈夫的同学。

洛扎诺夫刚跟一位同学搞好关系,却又跟最要好的一位朋友断了交。在同学中建立起的好感荡然无存。

这位最要好朋友突然间意外地被捕了。洛扎诺夫很喜欢他。为他奔走呼告。可那是个什么年月啊,又有谁会听洛扎诺夫呢?不过见一面还是被批准了。洛扎诺夫高高兴兴地去了——怎能不高兴呢?可朋友拒绝跟他握手,也没跟他说话。

回到家里才解开这个谜:妻子毫无愧色地说,她以洛扎诺夫本人的名义,给警察局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他的朋友。

可能,我转述的某些细节不够准确,但没关系。这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洛扎诺夫本人没对我讲过。他只是在提到它时说了句:

——是啊,我哭得很伤心……

——可您还是没有抛弃她?你们最后是怎么分开的?

——她自己离开了我。这回我算是真正休息好了。当她又

想回来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坚决不同意。我搬到另一个城市，一心要躲开她。

洛扎诺夫讲这些话时，我重复一遍，依然心平气和，没有丝毫的指责和抱怨。从人的角度讲，这个只会忍气吞声、以泪洗面的丈夫身上有些令人讨厌。但我们不要从人的角度看待洛扎诺夫。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洛扎诺夫对“妻子”的态度，其实是非同寻常、耐人寻味的，他把婚姻看得神圣不可动摇，认为一旦结发，便应白头偕老。“妻子”——一切尽在这二字之中，至于是怎样的妻子，那又另当别论了。

九 周围空无一人

“铁幕”微微拉起的时候，高级僧正们开始“常来彼得堡”，参加宗教一哲学会的活动，我们也开始不时地看一看寺院，领略一下“另一个世界”。我们时常走访（总是结伴去）年轻、谦虚、宽脸膛的神学院院长谢尔吉·芬兰斯基（为的是预先讨论某个报告）和安东尼都主教。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安东尼那儿读过《果戈理与马特菲神父》，就连明斯基也在那儿读过一次，好像是他的《教会胸前的神秘玫瑰》。他当时（不知为什么）很讨好教会，不过劳而无功。

当然，洛扎诺夫还跟平时一样，什么也不读，永远只是出席。

在谢尔吉那里是令人愉快的：大厅宽敞，地板光洁如镜，墙上挂着成排的高级僧正的画像。我们喝茶是在饭厅里，围坐一张长形的餐桌。茶很香，果酱的品种多极了，而上茶的是身体纤细、皮肤黝黑的见习修道士。

都主教的房间就不然了：这里有的是官方宫殿的豪华、仆人，而果酱是加了糖的。

坐在一起时，洛扎诺夫常对我窃窃私语，告诉我他的观察：“看见了吧，看见了吧……”他任何细枝末节都能发现。

有一次很晚，已经十一点了，我们才离开寺院，一出围墙便迷了路。时值冬天，但已稍微解冻。环绕着寺院的一望无际的雪野，像打了蜡似的溜滑，而走在依稀可见、坑坑洼洼的路上，感觉就像爬山。我们一行六人，但不是一块走，而是互相搀扶着，结对而行。可总是在冰天雪地里打转，总是在白色的高墙下绕圈子——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拐。

我是跟洛扎诺夫搭伴。他可不在乎我们会走到什么地方。没完没了地说自己的。他永远“独处”。对他来说，跟谁在一起绝对无所谓。他说话从来不是“发言”，而是“交谈”，提问，可并不等人家回答，也不想听人家回答。甚至两个人在一起时，他仍然像是一个人。

“我的心理的一个奇怪的特征在于，我总是强烈地感到我身边空无一人——周围和到处都是空无一人，没有言语，没有存在——我隐约知道，隐约相信，隐约认为可能其他人是与我‘同时’的。”

此时此刻，我与他“同时”表现在，我们俩每走两步就会东倒西歪。他突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我笑道：

——是您扶着我呢，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还是我扶着您？

——看见了吧，我们俩都在打滑！都在打滑！可就是没摔倒。为什么我们没摔倒？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同一时刻，而是在不同时刻打滑。您打滑时我站着，扶着您；而我打滑时您站着，扶着我……

——啊，原来是这样。假如我们分开走，两个人肯定早就倒

在雪地上了。

——对,对,令人惊奇……在不同的时刻……

但就在这时候,由于只顾推理,他竟不知不觉地把我领到了一个大雪坡上,若不是走在后面离我们很近的一个人把我们抓住,我们俩早飞到下面去了——而且肯定是在同一时刻。

十 关于爱

犹太人困扰了洛扎诺夫一生。他一生都在围着犹太人兜圈子,像着了魔一样,忽而向往之,忽而厌恶之,忽而迷恋之,忽而排斥之。

只有根本不理解洛扎诺夫的人才会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应该忘记:洛扎诺夫的生命支柱是上帝和——世界,它的肉体,性。

"你们是否知道,宗教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最需要的东西? 谁不知道这一点,就应该对他不屑一顾,避而远之。"

随即又说;

"性与上帝的联系,要多于头脑与上帝的联系,甚至多于良心与上帝的联系。"

洛扎诺夫认为,在犹太人的宗教里,上帝与性的联系异常明显,这使他无法不对犹太人产生强烈兴趣。这种吸引——凡是有理解力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意思——被一种强烈和神秘的拒斥感加强。洛扎诺夫不光是个头号雅利安人,还是个头号俄罗斯人,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他身上没有一根血脉不是俄罗斯的。对俄罗斯的一切,无论好坏,他都不加选择地接受。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含有"对立"的成分,亦即"性"的成分,对"异族"的向往。

他对犹太人倾注了巨大的热情,甚至于偏爱,可以说是对他

们“情有独钟”。

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他爱上了一个犹太姑娘：

——瞧她的手……她的血是什么颜色的？万一是蓝色的呢？或者是紫色的？嘿，其实我知道是红色的。可毕竟跟我们不太一样……

不熟悉的人或内心粗陋的人常忍受不了洛扎诺夫的“不严肃”，看不惯他将大事小事混为一谈，认为他似乎很“淫秽”。其实不然，设若果真如此，“上帝与性的联系”这本身岂非不可容忍？整个“性”岂非也成了“淫秽”？至少是“不体面”，只有用严肃的科学语言，拿出教授派头，谈论这个问题才是可以的。洛扎诺夫的“举重若轻”和“琐屑”给人的印象简直是“儿戏”，不纯洁。

可对洛扎诺夫来说，世上并不存在什么琐屑：任何看似琐屑的东西都联系着极其深刻和重要的东西。犹太人的“蝉棺”，犹太人的宗教习俗，对肤浅的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索然无味的，但对他来说却是感人至深的，耐人寻味的。犹太人那儿任何一个性“神圣”的标志都会使他受到震撼，而同那种“性即淫秽”的普遍观念，洛扎诺夫主要是进行斗争。

他对基督教和基督的态度的焦点就在于此。基督？洛扎诺夫对基督同对犹太问题一样，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只是这里一切都大相径庭。基督——他是自己的，亲如骨肉，近如朋友。而且，对洛扎诺夫来说，好像就是这个活生生的，可爱的基督严重和不公平地伤害了他，夺走了他和所有人的什么东西，而这东西乃是整个世界及其光和热。是他把人从家里赶到冰天雪地：“要完善自己，向前走，别回头，抛弃父母、妻子和儿女……”

洛扎诺夫生性怕冷，喜欢温暖、光亮。

“我始终跟上帝在一起。跟上帝在一起我感到最为温暖。”可突然——要你走向寒冷，要你放弃，要你诅咒……这是从何说起

呢？他不知疲倦地抨击苦行僧和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就本质而言，他比他们看得更远，他并不认为“这是他们自作自受”，他认为罪魁祸首是基督。他在内心不断谴责基督——同时也为自己的胆大妄为感到害怕。

记得一天晚上，在我们家吃饭时，他急促地说：

——咳，那是什么呀？要知道，我才不会认为，也不应该认为，上帝只不过是一个人……那他究竟是什么呢……宽恕我吧，上帝！（他赶紧胆怯地划了个十字。）他是什么呢？可能是朝霞之神吧……像闪电一般从天上降落……

不过，比起因反对存在的始因基督而受到的“上帝的惩罚”，洛扎诺夫对因攻击教会而受到“上帝的惩罚”要惧怕得多。为什么？这很简单。在他对基督的攻击中，饱含着强烈的个人对基督的爱，正是这爱威严地克服了恐惧，并将淘气的孩子的怯懦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试举一例：妻子的重病。手术以后，她躺在医院里。这期间，洛扎诺夫有一次是在捷尔纳夫采夫家过的夜。据捷尔纳夫采夫说，整整一夜他没有合眼，总是哭，不断地爬起来在圣像面前祈祷。整整一夜他都在“忏悔”，说他对教会、对宗教界不够温和，不够公正，不够恭敬。总是反对、抗议……这不，上帝惩罚他了……他就像个孩子，低声恳求严厉的、教会的上帝：原谅我吧，饶恕我吧，我会痛改前非的！

正因如此，洛扎诺夫才在《隐居》中说：

“我要去教堂！我要去！我要去！”

接着又说：

“我怎能不去孩子的妈妈去的地方呢？我又成为东正教的信徒了。”

他真的成为东正教信徒了吗？这至今仍是他的一个秘密，尽

管他的预言是兑现了的：

“当然，我终究要跟教会死在一起……当然，对我来说，宗教界人士终究比所有的人(阶层)都可亲……”

然而：

“但死在他们中间时，我终究要怀着他们给我造成的痛苦死去。”

这是同“教会”的斗争。

现在来说说他的“反基督”。他对基督的大胆反抗之一便是《一张黑脸》一书。在这本书里，他以一贯的准确、锐利和谈话口吻写道：基督的到来，使世界和人的心灵变得冷酷和麻木，基督是骗子手和破坏者。他一再含蓄地说，朝霞之神乃是黑暗的精灵，而不是光明的精灵。

至于说他的忏悔，发抖，祈求宽恕——全然不是这样。《一张黑脸》的片段在宗教—哲学会上当他的面宣读过，对当时的一些批评，他极其坚决地给予了反驳。在私下交谈中，他曾经据理力争，援引《圣经·旧约》为自己辩护，还热情地用犹太人为自己辩护，好像他整个站到了他们一边，在宗教上同他们融为了一体。

当着我的面，洛扎诺夫跟一位著名诗人、犹太人，差点打起来。

那位完全不信仰基督教的诗人和哲学家想要证明：《圣经》中缺乏个性，缺乏只有基督教才能带来的诗歌精神。至于犹太人，他们对我们，对世界，对女性等的钟爱之情一窍不通。而洛扎诺夫，显然是要捍卫《雅歌》，捍卫爱，捍卫犹太人的情欲之火。

他站起来，斥责那位诗人背叛了犹太人。那位诗人回答：反过来，不管怎么说，洛扎诺夫都比他更像犹太人。

争论到此结束——洛扎诺夫突然默不作声了。

他当然不是怀疑对方是无神论者。他“蔑视，痛恨，害怕”无

神论者，实证主义者。他说过："我要永远跟他们一刀两断。"可对方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不可能是无神论者。洛扎诺夫认为，世上没有反宗教的犹太人，不论他对自己是如何想法。不管怎样，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影子"。难怪上帝要召唤亚伯拉罕。洛扎诺夫自言自语道：

"上帝召唤亚伯拉罕，而我召唤上帝。这就是整个区别。"

突然，突然——仿佛是谁的影子(受难的基督的影子?)在他和犹太人之间穿过。他回头一看，立刻吓得浑身发抖，但这已经不是现象的恐惧，而是"本体的"(他喜爱的一个词)。突然——"心痛！心痛！心痛！"——迷失了方向，于是又对犹太人变得尖刻起来，甚至粗暴。这些时候我听到过他的一些言论，但我还是愿意直接引用他的文字，这样会叙述得更清楚一些：

"读罢《一张黑脸》，唯心主义者鲍鲁赫，还有可爱的列维卡·尤一娜，我们家的朋友，一个劲儿地吧哒嘴。于是我对自己说：'向后转！小心点！'(我对犹太人的态度)。他们以为我看不见，然而，纵使'我永远在睡大觉'，我也能明察秋毫。鲍鲁赫从雪橇上跳下来时，兴奋而幸福地大吼一声，好像要向我传达一个秘密想法并感染我：

——唉，可他毕竟是个撒谎者。

"我甚至吓了一跳。而列维卡在舒拉的房间里说：'嗯—嗯—嗯—对……我读了《一张黑脸》。'嘴角上挂着同样的幸福。好像她吃了什么甜东西。

"这些生理上的(视觉的和触觉的)反应必须注意到，这样才能搞清楚，书籍中的，历史上的，传说里的哪些东西是我们不愿意相信的。确实，在他(大写)与犹太人之间，存在着某种仇恨。每当想到这一点，就会毛骨悚然。于是你对事物的理解已不是停留在现象上，而是上升到了本体：'把他(大写)钉死在十字架上。'

“犹太人是不是这么想的？普通人呢？至少，他们从来没有说过。”

对基督的爱，个人的、忠实的、狂热的爱，是洛扎诺夫灵魂的一个部分，甚至不是灵魂，而是整个身心的一个部分。但即使是对目光犀利、明察秋毫的人来说，这爱仍是个秘密：“视而不见。”有时这爱是隐蔽的，无影无形，在附近微微颤动。于是他诚惶诚恐，投向犹太人一边，坚持自己对他们的肯定态度。背离，迷惑，懊恼……但生命引导他穿越了“死亡阴影的山谷”。他的爱开始像闪电一样，撕破云天，在空中划过。时间越久，闪电划过的瞬间就越是频繁。

“那时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那时奥桑娜……可果真如此吗？头脑里第一次露出一片曙光……”

在这些闪电中，仇恨犹太人的火花自生自灭了。理解了爱的含义——真正的。接着又忘记了。或许，后来又理解了，而且永志不忘？

十一 “在自己的角落里”

1902年秋，我们开始同佩尔卓夫主办《新路》杂志。

我至今搞不明白，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办成的，一分钱没借，竟然将杂志维持到1906年。它好像是自己脱颖而出的——自然是宗教—哲学会的产物。

我们身无分文，除了佩尔卓夫自愿捐献的五千卢布，以及出版家比罗什科夫一些很小的、表面的帮助，而且只是在开始时的几个月。(这位比罗什科夫后来因为同自己的牺牲品——被他欺骗的作家们的诉讼案而名噪一时，不过欺骗是无意的，因为他自己也破了产。)

凭借“拉近教会与知识分子的距离”这张招牌，佩尔卓夫获得了办杂志的许可。杂志完全是“世俗的”（在纲领中只是提到“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精神上的宗教问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出版者是宗教—哲学会的参加者，而且可以在杂志上刊登该会的会议纪要。

刊物的处境相当困难：每期都要经过严格的双重检查。首先是新闻检查机关的常规检查，然后是宗教部门的检查。我们这儿还有第三个检查机关，非官方的、知识分子的检查。在当时，一旦美学开始以某种方式赢得生存权，宗教就会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抨击。我们还被纳入了反动派之列。

然而，筹措经费，与两个检查机关周旋，已经使我们焦头烂额了，我们实在没功夫再来应付这些人。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

我们所有人的工作都没有报酬，发表文章也没有稿费。只有偶尔遇到初学写作（而且要很有才华）但又缺乏经济来源的作者，才会破例。文学青年们——都是我的朋友——高兴地前来帮忙和工作，把我们的事当作自己的事。青年诗人们（勃洛克、谢苗诺夫、皮亚斯特）除了诗歌以外，在需要的时候，还为我们写评论，随笔，综述。几位缺乏经验的、来自“铁幕那边”的神学院副教授卡尔塔舍夫、乌斯宾斯基，也参加到杂志的工作中来，但这是严格保密的，不留任何字据，因为，万一他们的领导知道了，他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像我们这样的老文学家数量可观，所以杂志的物质条件还不算差，没有捉襟见肘的感觉。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在这里发表了《受苦受难的上帝之宗教》。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得与阿列克赛》。勃留索夫每月发表一篇关于外国文学乃至外国政治的文章。

该说洛扎诺夫了。他对杂志的创刊,怀有一种难言的喜悦。首先,他要求给他一个常用的地方,“供他调遣”,并且要取名为“自己的角落”。此外,他还开始连载他的长篇大论(一部出色的著作)《论犹太教》。

他总是守在编辑部里,跑来跑去。宗教—哲学会的秘书——“狗”叶菲姆·叶住在编辑部。这是一个不失幽默感和精力旺盛的人,作为秘书,就是在这儿,他仍是难得的。每次都是他把我们的全部材料(不光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运到检查官神父那里去。一旦神父们感到惶恐不安,怀疑索洛古勃、维·伊万诺夫、勃洛克的某一首诗里含有隐蔽的“诱惑”,他就会厚着脸皮、敷衍了事地胡说八道一通,而且总是很奏效。有时,还是能够保住一些相当大胆的文章的,尽管不得不做出重大牺牲:有一次,伊万诺夫在文章里把“东正教”全变成了“天主教”。而这篇文章说的又是符·索洛维约夫——可以想见,结果会怎样。

叶菲姆也接待来访者(没有名气的)。他极其善于把这些接待当笑料讲给人听。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他那样摆得平“作者”。他的一本正经的态度,毅然决然和不留余地的回答,对那些过于纠缠不休的人很起作用。也有难为情的。

——啊……我可否问一下,你们付多少稿费?

一篇显然没有希望的大部头来稿的显然没有希望的作者说。

叶菲姆不假思索:

——我们付的稿费很优厚,如果来稿让我们喜欢。但我们很少碰到喜欢的稿子。您最好将您的稿子改投别处。

说实在的,整个编辑部的工作都是佩尔卓夫和我负责的。青年人虽愿意帮忙,但我们不敢指望他们当中任何人。而洛扎诺夫不但不帮忙,一旦他心血来潮,我们反而会心惊肉跳。任何事业

都要有自己的“政策”，亦即路线，注意时机，注意周围的环境等等。对此，洛扎诺夫一窍不通。他确实永远在“睡大觉”。尽管他善于在梦中“窥视”别人见不到的东西，但他窥视的范围只是局限于他的思想、知觉，只是局限于引起他的兴趣和触及到他的事物。

他非常喜欢刊物。如果任由他的性子，遇事跟他平等协商，他准会把刊物搞砸了，而且还全然不知，因为他是无意的，也是无辜的。

例如，我们遇到过这样一件麻烦事。他送来了连载文章的续文《论犹太教》的一章和《角落》，稿纸皱皱巴巴，字迹潦草，清一色蝇头小字。就这样拿去发排？恐怕不妥。我们不是《新时代报》，必须节约排版费用。即便一切都跟平常一样郑重其事，有时在世俗检查之后，为了通过教会的检查，我们还是不得不重新排版，尽量不要让“神父们”产生一些不利于我们的想法……我跟佩尔卓夫开始审读洛扎诺夫的象形文字。不是一起读——佩尔卓夫耳聋，自己发音又不清楚，也没积极性——而是轮流读。

似乎，没有一个地方没让我们碰上麻烦，有的地方就连远远地给检查官晃一眼都不敢，有的地方我跟佩尔卓夫在刊物内部也不能接受。

这些地方我们仔细标出，而然后——对洛扎诺夫抱怨道：“这就是检查机关的工作。把您的手稿理得规规矩矩，清清楚楚。”同时，为了间接地开导他，我们又补充道：

——亲爱的，怪您自己。难道可以这样写字吗？哪位检查官能受得了呢？

我还要说一句，我们做的删节都是最为必要的。佩尔卓夫过于喜欢洛扎诺夫和懂得他的价值，他不允许自己对他的思想有丝毫的歪曲。

编发宗教—哲学会的纪要时，我们对洛扎诺夫的只字不动：他在这里文责自负，让他自己去应付检查官好了。

纪要的枯燥有时简直要让我们发疯：会上紧张而活跃的气氛荡然无存，听众的情绪得不到传达。

这些纪要主要是由我和捷尔纳夫采夫，而不是佩尔卓夫两人共同编发。

会议刚开过不久，记忆犹新。

——真是胡说八道！她（速记员）没听清楚。或许是没弄明白。要知道，这个地方，您记得吧，这个地方应该是……

怒气冲冲的瓦连京叫道：

——可不是嘛！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斯克沃尔卓夫）说的是“良心”。而有个人对他喊：“良心是各种各样的。还有被烧毁的良心……”他于是慢慢地坐了下去……

这里要加进“听众中发出的声音”！

瓦连京·捷尔纳夫采夫不属于我们“阵营”，但他的艺术感觉战胜了他的“翻译”感觉，于是我们开始尝试尽可能将公式化的会议记录改造成形象生动的图画。

——这里是“听众中发出的声音”！一定要写上！我听见了，一个胖女人，喵喵叫了一阵，讲她如何研究教派，就坐在我旁边。这里写上——听众中发出的！

瓦连京高声叫着。

有时我们担心记录有误，便将洛扎诺夫的报告或反驳文章拿去给他过目。等到还回来时，已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几乎成了一篇新文章。为之奈何？只好把他叫来，数落一番，马上就地再抄一遍。

佩尔卓夫习惯突然离开彼得堡，而且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往往要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双耳失聪、善于隐蔽的人一去便

杳无音信,连个地址也不留。只知道他去了科斯特罗马或更远的哪个地方:他是伏尔加河地区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即“河人”。

这时我会觉得忙不过来。我的“男孩子们”坦率地承认,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干。洛扎诺夫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只顾往叶菲姆那儿钻,而叶菲姆也偷起懒来,不读初校样,还为勃留索夫同我争论起来,认为他缺少自由主义精神。

所幸的是,佩尔卓夫离开的时候——开春前——还不是很忙。过了大约两个月他回来了,一切又纳入正轨。

十二　我将忠实于爱情

洛扎诺夫娶了两个爱吃醋的妻子。

第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情妇,简直就是个疯老太婆:她不应该算洛扎诺夫的妻子。但真正爱洛扎诺夫并被洛扎诺夫所爱的“瓦利娅”,他的孩子的母亲,一个谦虚、高尚和朴实的女人,也非常爱吃醋。

为洛扎诺夫吃醋是不明智的。然而,要明白这一点,必须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看待他,不能用一般人的标准衡量他。

他对所有的女人都热情,都温柔,几乎没有区别,对她们的私生活怀有爱恋的好奇心。他有他的妻子,而且是他唯一的,但这些女人也是什么人的妻子吗?她们也在为人妻——洛扎诺夫会为此而感动,而惊喜。有孩子的人,有身孕的人,特别让他高兴。他对少女——未来的妻子、情人、母亲也感兴趣。无论是出了贤惠型的,还是娇媚型的,只要过着最为完整的女性生活,都能吸引他。在洛扎诺夫的隐秘中,恰是对女人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亲密:我们俩,他会说,我和你,知道一个秘密。要知道,洛扎诺夫觉得自己身上有许多女性化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是“娘们儿

气"。(有一次他竟异想天开地要求允许他在杂志上署名"甜蜜的伊丽莎白"。我们不许,他还很沮丧。)

女人身上人的因素洛扎诺夫不感兴趣。凡是话不投机,不能与之进行特殊的、隐秘的交谈的女人,他会很快停止注意她。也就是说,开始像对待周围的人一样对待她。即使间或对她表现出点兴趣,那也不带丝毫他所固有的隐秘色彩。

当然,要说洛扎诺夫这种对"女人"的好奇和温柔的态度只是"思想上的",那是可笑的。他对女人的态度是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一如他对别的使他感兴趣的东西。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被称为"罪过"、事实上的"背叛"之类的事在他身上发生过没有。可能发生过,可能没发生过。这没什么意思,因为这没有丝毫意义,既然说的是洛扎诺夫。而且他本人对自己天生的忠实理解得——感觉得——实在是太好了。

"要忠实于人,这样你就不会有不忠的把柄落在上帝手里。"

"要忠实于友情,忠实于爱情:其他的圣训可以不管。"

可否想象洛扎诺夫突然认真地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宁愿忍受家庭悲剧,决心跟"瓦利娅"离婚,以便娶这"另一个"呢?想象谁都行,唯独洛扎诺夫不可!如果非要这样想象他,那会很可笑,和想象狗会跟猫一样打呼没什么区别。

狗不会像猫一样打呼,洛扎诺夫不会变心。他忠实于自己的妻子,世上没有一个丈夫能做到他那样的程度。他的忠实是"本体意义的"。

是的,但妻子不知道这一点。出于自己深切而又寻常的爱,她本能地无法接受洛扎诺夫对"女人"、对其他女人的态度。她的观点是错误的,可从她的角度看,她又是对的,她的妒忌和苦恼不是没有理由的。

洛扎诺夫的心,整个充满了"怜悯",无法承受别人的痛苦。

唯一他认为并称之为"罪过"的，是制造痛苦。

"我是否只想做一个好人？那会很寂寞。但我无论如何不想成为一个坏人，有害的人。否则我宁可去死。"

为了避免爱妻痛苦，他该怎么办呢？他不能改变自己，也不愿改变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对的，清白的。他不理解这些痛苦（一如他不理解妒忌），但他看得出来，又不希望这样。究竟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在她面前开始委曲求全。他生怕多说一句话，举止很不自然，显得笨头笨脑。唉，没有用。首先，他这个可怜虫，拿不准哪句话或哪个手势会突然变得可疑。其次，妻子的妒忌是捕风捉影。问题到底是出在手势里呢，还是在言语里？由于搞不清楚是什么会使妻子伤心，逐渐地，就连最清白的事情、最清白的交往他也开始遮遮掩掩。有备无患——万一她伤心呢？要不让她痛苦（他其实做不到），就要让她不知道。这不就完了。

洛扎诺夫的"秘密"当然是无人不知。他对谁都坦诚相告——连同他对妻子的柔情，令人感动地请求大家不但不要"出卖"他，还要在必要的时候拉他一把，帮他打圆场，"好让她心平气和"。

他确实只关心她的安静。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因为一时难堪而犯下"罪过"，亦即千万不能撕破脸皮。毕竟——

"我一直是个笨拙的人。我的举止难看之极，甚至到了不会'起立'和'坐下'的地步。我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没见过世面……"

性情很直率的人会恼羞成怒，拍案而起："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您这是撒谎，骗人！"这又有什么用呢？不信你们把人类的法则强加给风、小溪、落日试试。它们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而且无可厚非：它们有自己的法则。

"我甚至无法想象像我这样的'无法无天者'。'法律'思想跟'义务'思想一样,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起过。

"只在词典里读过'义'字头的词条。可不知道这是什么,也从未感过兴趣。'义务是残酷的人为排斥弱者杜撰出来的。只有傻瓜才会听信它。'大致如此……

"只是我始终有种恻隐之心。还有感激之情。但这就像是我的'胃口',我的趣味。令人惊奇的是,我对撒谎应付自如。撒谎从未使我苦恼……

"上帝造就我如此。"

是上帝"造就"了他,而跟上帝是不能争论的。主要是徒劳无益。指责洛扎诺夫"撒谎"、"不道德"是徒劳无益的。这都是我们的概念。不轻率吗?

"我面对整个世界,等待出阁:我一贯的'激动'就来源于此。"

就让他"等待出阁"吧。何况你们也禁止不了。到头来,说不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还是件好事呢。

第二部

一 冻僵的灵魂

波别多诺斯采夫观望了一阵,还是把宗教一哲学会查封了。

"神父们"早就胆战心惊了。知识分子与教会之间并没发生"融合",而是出现了对垒,且"世俗的人"对教会的人步步紧逼,大有降服他们之势。教会调兵遣将,派以能言善辩和熟悉"世俗"哲学著称的大司祭米哈伊尔(来自喀山?)前来支援。可米哈伊尔(太可怕啦!)出席了两次会议以后却明显地转向了"知识分

子"一边，高级僧正们非但没有得到他的帮助，反而受到他的诘难，有时还受到他的指责。(这个非同寻常的人后来的命运富于传奇色彩。他继续同东正教教会进行尖锐的斗争，冒着被褫夺教职的危险，投向旧教派，并成为该教派的大主教。他领导过"各各他的基督徒"集团。1916 年逝世于莫斯科一家为卖苦力者开的医院。)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关闭宗教—哲学会，以免发生不愉快。于是就关闭了。

不久爆发了日本战争，而国内的形势也不知不觉地随之变得日益动荡起来。《新路》艰难地维持着：没有了自己主要的亚论坛——宗教—哲学会纪要，宗教检查机关的审查变本加厉，经费越来越紧张。

佩尔卓夫对事业的热情开始减退，越来越频繁地去往伏尔加河地区。洛扎诺夫也开始逐渐打退堂鼓。

问题在于，杂志的主要同仁这时已经离心离德。分歧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可能在意志的取向上。

老实说，思想(一如我们同教会争论的主题)始终是统一的：上帝与世界。宗教中精神与肉体的平等。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合乎洛扎诺夫的心意。然而，在捍卫"世界"的同时，他整个把它归结为性爱和个性。而其他人想把社会问题纳入"世界"的概念。

凭借天才的悟性，洛扎诺夫在这一领域确实能道出一些真知灼见，甚至表现出高瞻远瞩。但他在这里实在是外行，天生的外行，故而采取排斥态度。

"到处都在呐喊'社会性'，'唤醒社会热情'！"

"每当我遇到一个具有'社会热情'的人，我不光是感到无聊，也不光是对他反感：而是简直要死在他跟前。"

"我哑然失声，全身融化：没了头脑，没了意志，没了言语，没

了灵魂。死了。”

接下去：

“人们啊，想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振聋发聩的真理吗？这真理没有一个先知告诉过你们……”

——嚯……当真？

——这便是：个人生活高于一切。

——嘿嘿嘿！哈哈哈！

——是的，是的！这话没有人说过，我是第一个……只须坐在家里，哪怕是抠鼻屎，看日落。还有“幻想的意志”……还有“耸人听闻的沉思”……

妻子问：

——你怎么老是想自己？你应该想想别人才是。

——不愿意……

不愿意——没兴趣。而没有内在的，使他震撼的兴趣，洛扎诺夫算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天启，他会像孩子一样颠三倒四，胡言乱语，他会骂骂咧咧，落荒而逃。革命风潮酝酿之际，他已逐渐投向一些文学—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小组。这些小组犹如气泡，此起彼伏。遇到人们在维·伊万诺夫的“宝塔”里身披斗篷、头戴花冠、跳“拉手舞”、唱酒神歌的时候，他也去转转。他还溜进明斯基家，旁观狂热的“宗教仪式”，看他们如何用大头针划破一个衣着朴素、不知姓名的女人的手指，并把她的血滴进一只盛着酒的高脚杯里。

当然，洛扎诺夫是悄悄去的，绝对不能让妻子知道。

他到我们编辑部来得越来越少。我已经不记得，他的星期天聚会是否还在继续。似乎门庭冷落了一段时间。而当形势变得严峻起来，洛扎诺夫好像是从我们身边被冲走了，落到了另一片波涛上。

我们好像见过面，但很仓促。有人说，在最为紧张激烈的日子里，他闭门不出。当然不是因为胆小——他有什么可怕的呢？而只是因为“没意思”，甚或“令人厌恶”。有可能，他在研究古币。

不过他很快又出现了，甚至还关心起形势来——从自己的角度。喜欢上了“集会”。

——您在那儿听什么，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听什么？什么都不听，我是看别人如何听。女校的学生真是漂亮。眼睛水汪汪的。模样可人的好多。

这期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当领导退席的时候》。跟他以往的写作—倾诉一样，这依然是一本——我甚至不知该如何表达——真切的书。除了这“真切”的风格，书中其他的东西我什么也没记住。不过，“领导刚一回来”，这本书就被查禁了。

我们已经不再继续维持杂志（最后半年进行了大幅度改革），把它转交给了“唯心主义者”：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及其整个小组。1906年初我们打算到国外长住一段时间。

在这最后一个冬天，洛扎诺夫有时到我们家来——不经常。有意思的是，鲍利亚·布加耶夫（安德列·别雷，从莫斯科来，住在我们家）很不喜欢他。

他乜斜起眼睛，翘起眉梢，对我说：

——您听听，您听听。要知道，洛扎诺夫就是“普洛”！普—洛！

——这是什么？什么“普洛”？

原来，他在驼队街乘车时见到一个招牌（可能是个姓）——普洛。他觉得，如果用可怕的嗓音反复喊“普洛！普洛！”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像洛扎诺夫的人，甚至可以认为洛扎诺夫本人就是普—洛。

我对这个联想并不感兴趣，然而，只要了解这两个人，就不

难发现，布加耶夫是如何把普洛和洛扎诺夫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他为何“害怕”他们。并非所有的胡言乱语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

我们友好地同洛扎诺夫道了别。他甚至答应给我们写信（他很喜欢写信）。可很久都没写。突然间，差不多过了有一年，我们才开始在巴黎收到他源源不断的来信。

写些什么？

洛扎诺夫的信跟平常一样，总是明快的，直率的，谈话式的。这次他提出的是一个具体的请求。他恳求我帮忙敦促一位“文学”女士把他寄给她的信退还给他，说此人的丈夫是1905年后才侨居国外的，夫妻俩现住巴黎（这是相当唐突的，也是徒劳的）。这位狡猾的女士似乎并未对谁隐瞒这些只会使洛扎诺夫名誉受损的信（不错，这些信确实有损名誉，但确实也精彩绝伦，要知道，这是真正洛扎诺夫风格的私信，而且是写给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一个犹太女人的）。

洛扎诺夫的恳求里流露出绝望情绪。要搞明白他为何这么需要这些信并不困难。我们知道，洛扎诺夫妻子病重（据说，她的神经受到刺激），因此，他的绝望也就不言而喻了。他痛苦不堪，担心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会发现信的事。

他对妻子的感情，一种荷马式的爱与怜的混合体，在这段时间里，变得十分悲凉。其中掺杂进了对死亡的真切感觉。

并不是洛扎诺夫变了。死亡的感觉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体内一直潜伏着这一感觉，“只是他没有想过”，而这回它从深处浮到了上面，向四外扩散，遮盖了所有其他的感觉（并永远地赋予它们一层自己的色调，尽管没有降低它们的能力）。

“我谈论的是婚姻，婚姻，婚姻，而朝我走来的却是死亡，死亡，死亡……”

还有：

“我害怕死，我不想死，死亡使我心惊肉跳。”

最后：

“死我无论如何不能承受……

“我这样对待它，好像什么人都不应该死，什么东西都不应该死。好像死亡并不存在。

“最为平常，最为‘永远’的是：就连这我也没看见。

“我当然没看见它：可这意味着我没看过……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也没爱过呢？

“‘这就是我身上的那个坏人，又坏又可怕的人。’此时此刻，我是那么恨自己，‘那么厌恶自己’。”

洛扎诺夫没有我们习惯称作“思想”的“思想”。他的每个思想同时也肯定是身体的敏锐感觉。因此，他缺乏“推理”能力，这是他自己也知道的：

“我只是哭和笑。我是否也做本来意义上的推理呢？从来不！”

对他来说，死亡乃是肉体上的“寒冷”（一如生命，爱怜是温暖、明亮的火光）。

“多些爱，多些爱，给我爱吧！我已经冻得奄奄一息。

“唉，到处都是这么寒冷啊！”

当他说：“灵魂冻死了。可怕啊，一旦灵魂打起冷战。”这并非比喻，并非形象——他的“灵魂”何在？肉体何在？——而仍旧是肉体对寒冷的感觉，即对死亡的感觉。

他恳切要求退还的那些信件我们没能帮助讨回。我们认识折磨洛扎诺夫的女人的丈夫。我们还请求过丈夫帮忙。他预先打招呼说，希望渺茫。确实。她不还，不想还。

我不认为这件事惹了大麻烦。重病在身的女人未必能听得见有关传闻。其实这件事是清白的，并无不可告人之处。可万一

她有所耳闻呢?果真如此,她大概已经不会像洛扎诺夫担心的那样对待这件事了。

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洛扎诺夫那时很可怜。

二 在别人的修道院里

我不是为洛扎诺夫唱赞歌。如果闭口不谈——“没有一个人配得上赞扬,所有的人都只配怜悯。”——那么,赞扬(或贬低)洛扎诺夫还有意义吗? 哪怕是有意思? 丝毫没有。只有一件事是至关重要的:理解,考察,判明作为一个罕见的现象的洛扎诺夫,因循自己的法则,生活在人群中的洛扎诺夫。理解这个会说话的现象的价值,亦即理解这个本色的现象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或者说我们能够从它那儿索取什么。但千万不要忘记它是本色的。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 ……

“我不感兴趣。一种自然的,而非人类的东西。确切些说,我是被‘拉着走’,而不是我自己走。腿不由自主地挪动。我被从我站着的每一个地方扯开。”

这里哪有什么“人类的东西”啊!

然而,应该意识到,要理解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如此困难,以致就连我们这些了解他,间或目睹过他确实不是走在他人的行列中,而是被“拉着走”在他们旁边的人,都时常忘记这一点,从而变得盲目,把他当常人看待。

或许,只能如此——当时只能如此。他毕竟长着一副普通人的面孔,用两条腿走路,系领带,穿灰裤,有孩子,有语言天赋——这是怎样的天赋啊!或许,正因如此,拥有这种天赋,不受任何人类法则的局限的他,才生活在我们中间吧?这些法则只在我们这里有效,我们甚至没有权利不保护它们免遭他的侵犯.任

何人类社会都是修道院。对洛扎诺夫来说,是他人的修道院(任何人类社会!)。他带着自己的规矩,来到这个修道院。修道院能否单单允许这一个僧人按他自己的规矩生活呢?“你们别打搅我。”“可以。但你也别打搅我们,快离开这儿。”

“我还不至于这么下流,要考虑什么道德问题。”洛扎诺夫说着,开始用两只手写作:在《新时代报》上这样说,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又那样说,只是换了个一看便知是他的笔名。

两只手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诚的(永远如此),由衷的。

他是正确的。

但彼·斯特鲁威也完全正确:他在《俄罗斯思想》上将洛扎诺夫观点自相矛盾的文章同时刊出,指责他是“两面派”。

不过这是后话。我们还得从头讲起。

回到彼得堡以后,我们发现洛扎诺夫从外表看一点儿都没变。依旧忙来忙去,依旧说话隐秘,半是耳语,事无巨细,一概津津乐道。只是细加观察,可以发现,他变得更加直言不讳了,身上的一切方向全都不一致,矛盾更加突出了。

然而,我们没有机会对他进行特别观察:我们同洛扎诺夫的见面开始少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本来就无法和他一起共事,而这回又觉得,也无事可做。

在彼得堡,“进行了一半的”革命过后,很多人都觉得现在可以“有所作为”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在跃跃欲试。

关于洛扎诺夫,当时有很多传闻,确切地说,是诽谤,说的都是他各种各样的卑鄙的“罪过”,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也很少相信:他的妻子依然病重,而且,在洛扎诺夫身上,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致命的痛苦和忧愁,尽管他没有提过。

有一次,是在夏天,他去火车站,顺路跑到我们家来(当时他好像是住在卢加的别墅里)。

他行色匆匆，拎着几个包，披着褐色的斗篷。可尽管很急，还是留下跟我们聊了起来。他披着斗篷，急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眼镜片一闪一闪的。

谈的当然是宗教，而且还是基督教。洛扎诺夫对基督教的态度我觉得很少有实质性的改变。他仍在指责基督教不愿承认具有温暖和爱的世界，不接受家庭等等。然后，他突然说道：

——要知道，你们是“启示录”的基督徒……而神的启示中的基督教是怎样的呢？我接受神的启示，我甚至准备接受第四福音书，整个约翰。只是不接受气象预报员。放弃气象预报员吧，让我们在一起……

我们当然没有放弃气象预报员，但就在这时，有人领来我们的一窝刚出生六个星期的达克斯小狗崽给洛扎诺夫看，于是他的注意力一下子转移到了它们身上。

——要是给孩子们……我的上帝啊……要是给孩子们带一只该多好啊……

——那就带上一只嘛，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挑一只好的，带到别墅去。

——啊哈，上帝……不行，我不敢。家里人会问：这是什么？哪里来的？不行，我不敢。好是好……

我们想起来了，就连我们家也是永远“禁止”洛扎诺夫来的：他的妻子认为我们家“颓废”，好像会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脱离东正教。

我继续说服洛扎诺夫把狗带回去：

——您就不能说，是在马路上捡的？

——不会相信的……不行，我不敢。

他就这样走了，没有把狗带上。

三　怎样的“是”！怎样的“不”！

在彼得堡，仿佛是在宗教—哲学会的旧址，我们见到了整个合法的、人数众多的宗教—哲学协会。

跟以往半地下的、激烈的宗教—哲学会全然不同。主席是卡尔塔舍夫，来自“教会的铁幕那边”，但已经彻底脱离教会：还在出国以前，我们就劝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像是让他跳进冰冷的河里）脱离神学院。他终于下定决心（何况他在那儿的地位已经不稳固），同另外几个人一道，游进了世俗的海洋。

这个海洋的波涛对他来说并非诡计多端，心怀叵测：他先是在公共图书馆找了个职位，然后又成为女子学校的神学老师。积久养成的“左顾右盼，畏首畏尾”的性格烙印使人还是看得出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不过他在逐渐适应“俗世”的自由。

选他为主席的宗教—哲学协会，其实是普通的知识分子社团之一，只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莫斯科唯心主义”意味（略微倾向于东正教）。牧师可以参加活动，至于高级僧正、阴险的宗教界人士——连提都不提。所谓“教训人的教会”整个缺席。

我们虽然对其倾向有些格格不入，但还是进入了常务理事会，自然也就为之带进一股躁动不安、改变其取向的气息。不过变化很缓慢，而且不无阻力。

洛扎诺夫没有进入常务理事会。我记得，他只是首批理事之一，甚或是创办成员之一——我记不清楚了。他来参加会议，但不做任何报告。与从前判若两人。时间不同了，讨论的热点都不是洛扎诺夫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宗教的性，而是宗教的社会性。

战前的最后几年时光在悄然流逝。关于这段时间，可以讲很多，但我写的不是它，而是洛扎诺夫。

我们再也没有见到洛扎诺夫。我们知道他的妻子依然未能康复，知道他早已不住在施帕尔纳亚街，不断地搬来搬去，也知道苏沃林老人死后他在《新时代》的地位没有改变。我们所说，他在会晤一些新人，那些人跟我们区别很大。而更主要的是，我们在这期间出版的《隐居》和《落叶》（“两筐”）里听到了他本人的声音。

就是在这三本……书里听到了他的声音吗？他没有错，当他说，这样的“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写出这样的书，就要学会像他那样“倾诉”，而要出版这样的书，就要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不懂得“别人与他同时”。一言以蔽之——要完全成为“洛扎诺夫”。

对于像我们一样了解他的人来说，这几本书里没有丝毫新鲜的东西。他所说的，我们听过不止一次，还有他那一丝不挂的隐私。在书中，他整个跟上帝和性在一起，跟他爱恨交加、感同身受的俄罗斯在一起，跟他既向往又厌恶的犹太人在一起，甚至跟压倒了其他“感觉”的死亡感、悲凉感在一起。

知识所有的“是”与“不”，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可怕地纠缠在一起。他自己都要惊奇地停下来：“我的心灵混淆不清……”这一演变（假如这是演变）在他身上似乎还没有结束。

确实：莫非他将激化自身的矛盾，达到苦难的深处，在临终笔记《当代启示录》“倾诉”之，并最终死在谢尔吉圣三修道院，死在似乎是最聪明最残忍的牧师——П.Ф的面前？

四　我什么都可以

关于这位牧师，日后会有人写的。我们初次知道他时，他还是莫斯科一名学数学的大学生（在《新路》上发表过文章）。后来

我们还在顿河修道院他的忏悔牧师、不安分和惊人的安东尼大主教那儿遇见过他。然而，对他真正有所了解还是通过他的妹妹奥尔加。她很爱他，去过他的寺院，但从未受到过他的影响。她同我们关系密切，在我们家久住过。这位出色的女性是在大战爆发前夕因难产而去世的，只活了22岁。

我既不想写她，也不想写她的兄长，这会使篇幅拉得过长。何况他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想，即便是在我们的黑暗时期，他强者的个性仍不会不留下印迹。

洛扎诺夫喜欢他吗？他早在战前就知道他。但很少提到他，偶尔提到也是一语带过："他似乎天生喜欢爬行。"

不过他们见面却日益频繁。在俄国知识界激起轩然大波的"贝利斯案件"发生之际，洛扎诺夫在ф的帮助下，开始在《乡土报》上发表反犹文章。这些文章就连《新时代》都拒绝接受，却被煽动种族歧视的下流小报奉为至宝。

洛扎诺夫这些文章是"煽动种族歧视"的吗？当然不是，当然是。说不是煽动种族歧视是因为，洛扎诺夫从未停止过对犹太人的热爱，而ф作为一个具有修养深厚、学识渊博的人，不可能是"煽动种族歧视者"。然而，这些文章在彼时彼刻事实上的确起到了"煽动种族歧视"的作用。洛扎诺夫在《乡土报》，亦即在真正的种族歧视者中间，以他特有的文采说，犹太人贝利斯不可能不杀害男孩尤辛斯基，犹太人的宗教里有拿无辜者的血作牺牲的基础。

而ф当时对妹妹说：假如我不是东正教的牧师，而是犹太人，我也会像贝利斯那么做，亦即让尤辛斯基流血。

这时，不光是作家圈，整个知识界都已对洛扎诺夫相当反感。我再说一遍：人类怎样的"协同"才会容忍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一个生活在人间却对人间并非一纸空文，而是坚如磐石的规

矩不屑一顾的人？不应该要"两面派"，即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发表两种不同的观点。不应该说，你唾弃所有的道德而且不承认任何义务。不应该从事"卑劣行径"（根据洛扎诺夫自己的说法），例如，在辩论中一怒之下，把偶然得到的论敌写给第三者的信公之于众。不应该像洛扎诺夫在最后几本书里做的那样，将自己的隐私，与自己或亲或疏的人的隐私和盘托出，当众撕下自己的衣服并把别人的衣服也一律撕下——这也是不可能的。

"不应该？我就可以。我身上的污垢都是美的，因为我就是我。

"而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没错，他是可以的。但所有被打发"见鬼去"的人也没错，如果他们不想知道为什么"洛扎诺夫可以"，从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也来个："见鬼去！"

洛扎诺夫的脱衣示众，虽然使许多人蒙羞，但还是可以容忍：这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在离群索居中说的话。可在《乡土报》上发表的文章，却在这样的关头，使洛扎诺夫成为"众矢之的"（当然，他对此不能理解）。整个社会都要自卫了。

公开将洛扎诺夫开除出宗教—哲学协会就是这样的一次自卫行动。

如果说我还要为这个事件（从最终的效果看，此举意义并不大）花费点儿笔墨的话，那也只是因为我想顺便交待一下：当时曾有那么两三个人，是从相当正确的角度看待洛扎诺夫的。他们肯定他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现象，理解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知道他是在按自己的法则生活。从私人角度来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洛扎诺夫光过火，虽然光火的理由要多少有多少。

但也就是这几个人，特别强硬地坚持要对洛扎诺夫采取自卫行动，当务之急是要取消他宗教—哲学协会的会员资格。

可惜，我得承认，当时我还是偏重于把洛扎诺夫看成一个"人"，而且不能容忍他作为一个人的极端不负责任。我当时说过多少不公平的话啊，不公平，而且无目的——如今我是多么后悔啊。

五　光阴如水

"贝利斯案件"，《乡土报》上的文章以及相关的一切经历过去后，洛扎诺夫完全消失了，至少是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起初他还逞强好胜，在《新时代》上撰文，极端放肆地谩骂"知识分子"，宗教一哲学协会的每次会议他都出席，差点儿还参加了隆重宣布开除他的最后一次会议。有人说，对洛扎诺夫的"迫害"过于残酷。这话不对。这些抗议和开除，没有任何残酷可言：要知道，他说的"唾弃"是一句很真实的话。如果说"丑闻"使他伤心的话，那也是因为担心他生病的妻子会受到刺激。

没多久，贝利斯也好，洛扎诺夫也罢，全都被忘在了脑后：战争爆发了。

战争期间洛扎诺夫都写过什么，干过什么？

写当然写过，在《新时代》报上，但没有意思。我想，他肯定是安静地坐在家里——妻子仍在生病。我们听说，他的一个女儿准备削发为尼（我不清楚此事——确切些说是悲剧——的详情。只知道洛扎诺夫当了尼姑的女儿在父亲死后不久便自杀了）。

有可能，战争期间洛扎诺夫还写过那本关于埃及的书（未完成）。他很早就动手准备了。有一次，还是在我们经常会面的时候，他发现我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大金龟子（一位英国女友从埃及带回来的），兴奋不已：

——送给我吧！我很需要。您要它有什么用？我要写一本

关于埃及的书。我家里还有古币——全是埃及的。埃及有过的东西今后再也不会有了。给基督教扼杀了。

他很高兴得到这样一个礼物,仔细地用手绢把它包好,拿走了。

战争期间,还是在革命之前,洛扎诺夫就开始写作《启示录》了。以短小的笔记形式,分期陆续发表。我记得其中有一篇讲到洛扎诺夫在扎哈里耶夫街遇见军队的事。他又一次表达了那种具体而真切的感觉:一种外在的力量,赤裸的,沉重的,粗野的,"男性的"力量在运动。在它面前,洛扎诺夫显得那么渺小孤单,他站在人行道上,紧靠着墙根,觉得自己简直是柔弱的化身,是个"女人"……

光阴如流水。革命的欢乐,犹如电光一闪即逝。接着又是黑暗,轰鸣,流血和——最后的沉默。

时间停止了。我们成了"死人的骨头,任凭风吹雨打"。

1918年到了。

六　冰冷的水

起初我们还能见到什么人。

——您知道洛扎诺夫的情况吗?

——他的情况很糟糕。来过这儿,彼得堡。然后又走了,带着家眷——也可能是什么人把他带走的。如今全家住在莫斯科近郊,在谢尔吉圣三修道院里。据说,人变得很古怪,身体也不好。穷得要命,到了去火车站捡烟头的地步……

——大概,是ф把他们安顿在修道院里的吧?

——好像是。但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老是生病,几乎路都不能走……您知道,他们的儿子

死了。

——什么？瓦夏死了？

洛扎诺夫有四个女儿，但儿子只有一个。瓦夏。

——是的，死了。他被拉到红军里当兵了……

我打断对方：

——可他只有十五六岁呀？

——咳，现在就是挑年纪小的，连十四岁的都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波兰那边。他还没到就在火车上得伤寒死了。打那以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也开始身体欠佳。其实是劳累过度。他的《当代启示录》最近出版了。现在情况怎样我不清楚。估计已经买不到了。因为书全给查封了。

捡烟头……生病……变得古怪……妻子几乎站不起来……还有瓦夏，儿子，死了……

并不意外。从前那些令人惊讶，令人恐惧的东西如今已经变得见怪不怪，合情合理。似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人死去。似乎所有的人都在捡烟头……

如果有谁没被逮捕，还活着，那才让人吃惊哩。

我当时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如此奇怪的，难以言喻的时代。它仿佛停止不动了：日子变得单调乏味，千篇一律——因而寂寞难耐。谁没见过革命，谁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寂寞。慢性的窒息。

当时，肉体上的感觉主要有三种：饥饿（这是最容易适应的），黑暗（这要糟糕得多）和寒冷（这几乎是无法适应的）。

在这漫长而多样的三重折磨中，各种各样的人死亡，被逮捕和枪决的消息接踵而至。

缅希科夫被枪决了。

——因为《新时代》。他躲到了沃洛切克。给抓回来了。死

得很体面，很壮烈。连家人也没能见上一面。

——竟会这样。

——就是，据说，洛扎诺夫也给枪毙了。看来也是因为《新时代》。外边在哄传。

——洛扎诺夫也被枪毙了？

——而B又给带到契卡去了。昨天。您给高尔基写封信吧。您还没给他写过信呢。现在就写。

——我？

我对给高尔基写信厌恶之极。不过确实，除了我，人人都给他写过信，恳求他的帮助。B实在是可怜。再说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当然，高尔基不会听我的。不幸，无辜和疾病在身，B已经是第五次被带到契卡了。她的女儿在高尔基家的楼梯口坐了一个通宵，等他接见。他没接见。我又能怎样呢？

然而我还是拿起了笔。"亲爱的……"，"尊敬的……"？抬不起手。还是简单地写："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吧。

我写的都是平常所见而又令人发指的事情。还补充道：您就是一名俄罗斯作家。您赞成对您友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对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洛扎诺夫的所作所为吗，如果关于洛扎诺夫被枪毙的传闻是真的？您能否至少告诉我传闻是真是假呢？我只知道，洛扎诺夫近来饥寒交迫，穷极潦倒。作为一个食不果腹的病人，他未必有能力危害你们的"政权"。您曾经捍卫"文化"。洛扎诺夫作为作家的价值想必您是清楚的。我想，您或许有必要验明传闻的真伪……

大致如此，只是措辞似乎要尖锐些。反正不都一样吗？难道还担心失去什么吗？本来就厌恶给高尔基写信。也不会起作用。

令人惊讶的是，这封信并非一点作用没起。高尔基对契卡是否进行了干预，我不记得，但洛扎诺夫的事他似乎干预了。也就

是说，他安排了自己的手下去调查关于洛扎诺夫的传闻，当手下报告说洛扎诺夫没被处决，他又命令给他寄点钱去。

这一切我们是从洛扎诺夫的朋友和崇拜者，来我们家作客的青年作家X那儿得知的（高尔基当然没给我回信）。这位X当时幸好接手经营一家书店，卖些旧的小册子，也印行一些不会得罪人的文集性质的新书，洛扎诺夫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就是在他那儿出版的。

原来，X早就有心为洛扎诺夫做点事并与店方进行了接洽。他得到消息说高尔基的钱确实汇出了。他希望能再争取一些并亲自为洛扎诺夫送去：他收到信说洛扎诺夫已经不是身体“不好”和“虚弱”，而是明显病重。

——出血。稍有好转——又出血。卧床不起，但神志完全清楚。一点吃的都没有，一粒药也没有。

X还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录》的最后几页。

洛扎诺夫又把自己整个融进了书中：他的声音，他的话语，还有我们无言以对的我们可怕的时代——尽在他的笔端。黑暗，饥饿和寒冷——死亡。

“这令人恐怖的夜间的寒冷。可怕的想法纷至沓来。在自然现象‘寒冷’中有种与人的肌体、‘热血流动’的肌体相敌对的东西。它惧怕寒冷，而且是一种灵魂上的惧怕，而非皮肤上的，筋骨上的。它的灵魂会变得粗糙、坚硬，就像‘遇冷的鹅的皮肤’……”

这就是他，他面对寒冷的恐惧。寒冷在多么可怕地逼近他啊。同我们所有人的遭遇一样，外在的寒冷逼近他，使他面对疾病。内在的寒冷攫住他，使他置身于疾病的魔掌之中。寒冷抓住他不放，非要将他置于死地，一口吞下不可。

而要自卫却没有武器。没有肌体所需要的“燃料”——食物。

“食物给人的印象如今至关重要。而且我发现——真是耻辱——人人都同样发现了这一点。穷人已经不感到羞耻，苦命的人也已经不感到羞耻……”

他写这段时还没生病，还能走路(当时大概还在雅罗斯拉弗尔火车站捡烟头呢)。在一些精彩而深刻的段落之后，《启示录》中的一辑这样结尾：

“我累了。支持不住了。两三把面粉，两三把粟米，五只烧得很硬的鸡蛋——常能维持我一天……”

但他没能维持下来。“战友”高尔基的偶然施舍来晚了。

不久，通过X(也可能不是他)我们收到了已经生病的洛扎诺夫的第一封信——由女儿代笔，确实是“倾诉”了(他的手不能动)。

第一封，然后是第二封，第三封……我是多么痛悔，这些信已经不在我的手里。它们当然不是彻底消失了。好心的女儿保留了复印件。其中有的也给别人寄过，我想——请看他就临死前的“寒冷”所说的令人震撼的话：它们甚至不久前还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过。可能，他给高尔基写过信(还有可能，高尔基保留了这些信，因为他的私产永远是不可侵犯的)。“谢谢马克西姆什卡”，洛扎诺夫，这个“穷人，苦命的人”，在给我们的信中仍在温柔而高兴地说着这样的话。他对高尔基的施舍感激不尽：够买些土豆吃了。

他是否意识到，他要死了？“我的情况很糟糕：极其严重的硬化……”然后又突然开起玩笑，说他还需要躺很久，要六个月，说他在逐渐恢复。随即又谈起可怕的“冰湖”，说他在慢慢地坠进去——双脚已经触到湖面了，已经好像不听使唤了，而且冰冷的水从脚下越升越高……然而——该怎样表达呢？——字里行间没有一句诉苦，甚至没有一句怨尤，有的只是孩子式的悲切。

“我们从来没有吃得这么香：一盘炸土豆，一小块面包，已经足够好了。”

可随即又突然说：

“要是有个馅饼就好了……要是有块奶糕就好了……”

他写信告诉我他的女儿怎样，如何照顾他：“像抱孩子一样把我从一张床抱到旁边的另一张床上，然后再把原来那张床整理好。说我变轻了，只剩下皮包骨。可要知道，骨头也是有分量的……”

关于妻子——似乎一次也没提过。他从前也不在信里谈她。不过我们知道，她总是守着他，也是半瘫，并且他永远都在想着如何养活她。

这些由女儿代笔的信，简直就像是洛扎诺夫本人的亲笔信，丝毫看不出是别人的笔迹。洛扎诺夫是否到达了自己精神力量的极限？不是，他只不过是到达了他平时到达的那种极限，证明了他的独一无二，不可估量，无法改变。有一点不该忘记：他晚年的无数思想和感觉，他的“是”和“不”，连同主要的，浮在上面的，对“寒冷—死亡”的感觉已经达到了异常强烈和清晰的程度。然而，它们还在发展，变得细腻如游丝，清晰如观火，尖锐如利刃。

冰冷的水逼近心脏。

七 爱的语言

——艰难时刻洛扎诺夫在谢尔吉圣三修道院找到了归宿。跟不离弃他的φ关系很好。全家信仰东正教。是的，这不，他也皈依了基督教。

人们开始这样议论他。有分析，有论证。

——要知道，还是从那个时候，从写文章反对犹太人的时

候，他就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曾是个怎样的亲犹者啊。可如今又跟φ交上了朋友，同时背弃了犹太人，转信基督教，东正教，迁居修道院……

说这些话的人们是以自己的方式，从一时的情况来评判洛扎诺夫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此话不错，像是符合实际。

而事实上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看。

“犹太人的服务，仿佛是钉在我手上的钉子，犹太人的温和，犹如焚烧我的烈火。

“因为，一旦享用了他们的服务，我的人民会灭亡，因为，一旦被他们的温和所缭绕，我的人民会灭亡。”

这是在“转变”期间，在φ的影响下，在修道院里写的吗？啊不，不是！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在认识φ之前，在洛扎诺夫的所谓过分“亲犹”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写的。而在修道院里，在最近几个月，他写的——倾诉的是：

“犹太人是欧洲最讲究的民族……”“同犹太的东西相比，欧洲的一切不知为何异常粗糙，坚硬……”“他们到处传播高尚和神圣的‘罪孽’思想（我哭了），没有这一思想就没有宗教……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为臭名昭著的人类擦去鼻涕，把祈祷书塞到人类手里：拿着，糊涂虫，祷告吧。他们奉献出赞美诗。还有神奇女郎——也是犹太人。如果没有犹太人，我们真不知道会怎样，欧洲会有多么野蛮。”社会主义呢？“可毕竟社会主义表达了‘民族团结’和‘人人友好’的思想，且他们愿意信仰它……”

洛扎诺夫转变了吗？在φ的影响下忘记了自己对犹太人的钟爱？这——说的是犹太人。而基督教呢？东正教呢？洛扎诺夫现在是何许人也？他现今在修道院里写的是什么？

“人们还料想不到的恐怖其实远甚于它现在给人的感觉：不是人的胸脯腐蚀了基督教，而是基督教腐蚀了人的胸脯。”“试一

试钉死太阳吧，那时你们就会看见，哪个是上帝。”“太阳比基督更有能耐，比基督更希望人类幸福……”

这是什么？我们能说什么？

无话可说。洛扎诺夫自始至终忠实于自己。他还忠实于自己对基督的爱。隐秘的爱，但“死亡之影的山谷”越深，爱的闪电就越是频繁。请看他去世六年前迸射出的一道闪电：

“《旧约》的一切过去了，《新约》的时代到来了。”“头脑里第一次亮了起来。如果他是安慰者，那么，我是多么渴望安慰啊。那时他才是我的上帝。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但我还是不敢。难道我不该害怕我怀着如此致命的恐惧害怕的东西吗？难道应该想：我们会见面的！我们会复活的！他就是我们的上帝！一切——都会解释清楚的。

“我忧郁的灵魂第一次站到了这个角度。啊，它是多么忧郁啊，我的灵魂……

“奇怪得可怕。

“也就是说，可怕的过去了，而奇怪的正在到来。

“上帝啊：莫非这就是你。你在夜间到来，在我的灵魂悲痛欲绝的时候……”

无话可说，完全无话可说，当我们读到他后来，几乎是临死的时候，在修道院里写的：“基督教腐蚀了人的胸脯。”他马上又回来了：

“灵魂将从坟墓中爬起来……每个人的灵魂，无论有罪还是无罪，都会比自己不可言喻的‘雅歌’活得更久长。每个人都会如愿以偿。阿门。”

他永远会回来，他永远是他，到头来还是他，我们的法则评判不了他，我们的法则约束不了他。

洛扎诺夫去世前有否成为基督徒，他的变化何在，他否定了

什么，接受了什么，为这些问题花费精力，毫无疑问，是多余的和狭隘的。

电话铃声：

——洛扎诺夫死了。

是的，死了。什么也没否定，什么也没接受，什么也没背叛。冰冷的水到达了心脏，于是他死了。一个现象熄灭了。

洛扎诺夫的女儿给我们写了一封长信，痛苦而详细地描述了父亲的去世，已经口不能言的最后几天。他像“基督徒”一样，戴着圣谢尔吉帽，当着φ的面死去。读罢此信，总觉得字里行间充满了苦涩。

帽子能改变什么，它又为何要改变洛扎诺夫呢？他——“是上帝系的一个结”，那就让上帝来打开这个结吧。

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什么？但我深信，即使是口不能言地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脑海中迸发出的仍是爱的语言：

上帝啊，莫非你不允许我们惧怕死亡？

莫非我们都有一死，而且没什么大不了的？

上帝啊，莫非这——就是你？

1923

译注：

① 谢·彼·加吉列夫(1872—1929)，戏剧和艺术活动家。

② 亚·尼·别努阿(1870—1960)，画家，美术史家。

③ 列·萨·巴克斯特(1866—1924)，画家，舞台美术家。

④ 维·费·努威尔(1871—1949)，画家。

⑤ 阿·彼·努罗克，唯美主义者，藏书家，法国文学专家。

⑥ 瓦·亚·捷尔纳夫采夫(1866—1940)，神学作家。

记忆的断片——回忆索洛古勃

一

> 我爱你广阔天地的忧伤，
> 我可爱的故土，神圣的俄罗斯。
> ……
> 你所有的道路都是可爱的。
> 任凭疯狂的道路
> 以坟墓的黑暗、寒冷相威胁——
> 我不愿意背离它。

关于勃洛克，记忆中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写出来：他死了。关于洛扎诺夫也是。还有勃留索夫：他还不如死了，他是布尔什维克的新闻检查官，疯狂而残忍的共产党员，借列宁去世之机为其歌功颂德，由一个诗人变成一个蹩脚的韵文作者——简直令人惊讶不已（或许相反，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然而,我可否谈论索洛古勃呢?

他在俄罗斯。

我认识他,始终不渝地爱戴他,始终不渝地尊敬他,转眼已经快30年了。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好像更加爱戴他,更加尊敬他了。

但他在俄罗斯。

我依然认为他是最优秀的俄国诗人和俄国小说家之一。对我来说,我更乐意再写一篇(是第几篇了?)文章来谈谈他的作品。

但——他在俄罗斯。犹如波涛撞在岩石上,这句“他在俄罗斯”,粉碎了我的所有企图。没有办法谈论他的创作,我们这儿没有他的书(那边有吗?)。旧作没有,而对新作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的灵魂和才华还在不断地上升。

他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在故乡的圣彼得的城市——他亲眼所见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变成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难道他亲眼所见的就只这一个损失吗?他在俄罗斯……但愿有谁能够明白,我关于索洛古勃的话,今天何以会如此简短,残缺不全,纯贞而又苍白。最主要的是——残缺不全。

我甚至想什么话也不说……可反正都一样。我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我是为别人从过去的时光中唤回我们美好的相逢。

二

跟人们在一起——怎样的负担!
啊,为何要同他们一起生活,
为何不能每时每刻

都使人受到诱惑，受到迷惑？

《影子》是索洛古勃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北方信使》上。至今读来仍跟当时一样清新。但从前里面加了一首诗，好像是《栅栏》。很短，却很引人注目。索洛古勃的每部作品都具有一种魔力，即使是写得比较差的作品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位谦虚的中学老师。彼得堡人，但至今仍在外省工作。年轻吗？甚至算不上很年轻。而他的姓是——捷捷尔尼科夫。

当时任《北方信使》秘书的尼·明斯基①认为，不宜用这样的姓发表文章，便匆忙给他取了个笔名——显然是根据一种不成功的联想（未来得及深思熟虑）——“索洛古勃”。这个笔名跟一位非常平庸的老一辈作家索洛古勃伯爵的名字发音相同，只是在书写上略有差异，前者中只有一个L，而后者中有两个。

我不知道，新诗人是怎样喜欢上这个笔名的，但我知道，他接受了它。明斯基对笔名和诗人本人都很着迷。当时（颓废派时期），《北方信使》对“有才华的新人”非常支持，甚至还积极寻找他们（它因此而给人留下美好的记忆）。

由于我当时不够专心致志，故我不曾痴迷于索洛古勃，只是喜欢他而已。他甚至只是我所喜欢的人之一，而这样的新人当年并不少，他们中有的人销声匿迹了，有的人如今已成文坛耆宿，名震遐迩，不论当之无愧与否。

彼得堡的普希金街上有一幢五层的大楼，是一家旅馆，虽非一流，但也非一般客店。不知为什么，文学家，特别是未婚的文学家，对它情有独钟，他们在那儿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

明斯基就是其中一员。他当时曾这样说自己：

他住在帕莱斯，
他在皇家旅馆里歌唱。

这家“帕莱斯皇家旅馆”朴素的、用屏风隔开的客房当年见识过不少有趣的聚会。佩尔卓夫②后来在那儿住过，洛扎诺夫也曾在那儿逗留，还有艺术世界的唯美主义者们……

我就是在那儿初次见到索洛古勃——捷捷尔尼科夫的。

这是夏季或春季的明媚的一天。在明斯基的房间里，铺着普通天鹅绒桌布的椭圆形茶桌旁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浅色衣服、面容憔悴、头发棕黄的人。络腮胡是直的，唇髭也是直的，好像瀑布，秃顶，系着黑色的领结。

他的脸，他的眼皮沉重的眼睛，他的有些笨重的身材，全都透出一种近乎静止的沉稳。这是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忙碌起来”的人。沉默不语对他是最合适不过的。每当开口说话，只是可以听明白的三言两语，声音很平稳，近乎单调，没有丝毫紧迫感。他的话语跟他的沉默一样，从容不迫，雷打不动。

一直是明斯基在喋喋不休。当然，索洛古勃在听——也有可能没听，只是安静地坐着，很自然地保持沉默而已。

索洛古勃不慌不忙地告辞后，明斯基凑到我跟前问：

——您怎么会喜欢上我们这颗新星？还能想象得出比这更缺乏“诗意”的外表吗？秃顶，而且呆板……您想想看！

我回答：

——没什么可想的。好极了，他根本用不着换一副外表。他坐着就跟算命似的，或许已给自己算好了命。

他确实像一个巫师。后来我们成为朋友时，不时地见到他的眼睛里闪烁出巫术的光芒。

三

> 我欢迎我贫穷的寺院的
> 静谧无声的墙壁。

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在一条夜间灯火阑珊，而春天仍冰封雪冻的远程交通线上，竖立着一幢带有宽敞的阁楼的木屋。这是一所市立学校。

下面是几间摆着课桌的正房。那里晚上很暗，还闻得到一股特殊的学校气味：粉笔，墨水，靴子和男孩子的后脑勺。

上面是索洛古勃的住处，“公家的”。他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和校长(或类似的职务)。

这种带阁楼的老式木屋的住宅是别具一格的。无处不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墙壁，门槛，装饰……正如巴黎的宽檐帽会扭曲一个村姑可爱的脸庞，现代气息——无论是家具的、窗帘的、甚或是住在这里的人本身的——会破坏居室的安逸。那会使和谐荡然无存。

索洛古勃的住处实在是妙不可言，因为整个都是和谐的。

他跟姐姐住在一起。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姑娘，文静，谦和，消瘦。一眼即可看出，姐弟之间的感情很好。每次客人们来聚会(当时索洛古勃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文静的姐姐总要体贴周到地在一张小方桌上备好茶点，在悬挂起来的煤油灯的光环的辉映下，餐巾显得那么洁白，明净。好像到处都是白色的：墙壁，窗纱……但每个房间里照耀在圣像面前的蜡烛却是颜色各异的：一间是粉红色的，另一间是墨绿色的，再另一间的角落里——是深紫色的。

文静的姐姐在陌生人——文学家们面前丝毫也不拘谨。她善于礼貌地沉默，也善于礼貌地交谈。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身体消瘦，穿一件黑色的连衣裙，经常咳嗽——她身体不好，每到冬天便“哮喘”。

有时喝完茶客人便来到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窄小的书房（他写自己的名字总是从字母“西塔”写起）。书房里书很多，光线不太明亮：绿色的陶瓷灯罩下面只有一盏灯（墙角的蜡烛也是浅绿色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索洛古勃的姐姐名叫奥尔加：奥尔加·库兹米尼施那雅。有时她的女友帮她倒茶。这人也很文静，也穿一件黑色的连衣裙。

日月如梭。索洛古勃的名气越来越响。他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第一本很薄，是诗集。然后是从前发表在《北方信使》上的一部长篇小说，还有短篇小说……他在文坛上占据了自己的一席，而且地位如此稳固，以至那些起初不理解他的人到了已经不得不承认他的时候还是不理解他。

他出现在各种场合，到哪儿都四平八稳，雷打不动，寡言少语。偶尔显露出几分恶毒的、不带笑容的机智，始终有点像魔法家和巫师。要知道，无论是他的长短篇小说，还是他的诗歌，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现实与魔幻紧密结合。神话往来于生活之中，神话与我们共进晚餐，而且始终不失其为神话。

幻想与现实永远互相吸引互相斗争——这就是索洛古勃的悲剧。

我想要结局，我寻找开端，
我预见到了不祥的界限。
我曾希望得到重重矛盾，

幻想变成了我的主宰。

他向往神秘的“马伊尔之星”和不属于我们的“奥伊尔大地”，但又会突然希望回到自己的、我们的故土。但在这儿杜尔西涅雅是否会太过经常地变成“肥胖的阿尔东莎”呢？于是索洛古勃就像意外地得到夏娃的人类始祖亚当一样，痛苦地怀念着以往的、轻盈的利利特。

当索洛古勃系着黑色的领结，表情木讷地出现在通俗舞台上，以不带丝毫颤抖的、平稳而呆板的嗓音朗诵他的确实具有魔力的诗篇，他本身看上去就是此岸与彼岸、现实与虚幻的悲剧性结合。还有一个问题：或许，真正的现实恰是这两种本原的神秘结合？

索洛古勃——顺便说说——完全不能忍受别人在台上“有表情地”朗诵他的诗作。其实我也是这样。有一次，晚会上一个劲儿地朗诵索洛古勃和我的诗，我难以忍受，便怒气冲冲地离开大厅，正巧与索洛古勃在门口碰上，他也是怒气冲冲地离开大厅的。这是什么啊！我想，假如诗人能够听到明斯克（处于波兰人控制之下，20年代）的一次热闹的大学生晚会上朗诵的《魔鬼的秋千》，真不知他会作何反应！一个棕色头发的年轻的女爱好者，肥胖的“阿尔东莎”，在台上荡来荡去，声嘶力竭地喊叫，而当她像小号一样大吼一声：“荡起来吧，魔鬼与你同在！”大厅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幸好索洛古勃当时不在场。

我想起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春天的晚上，我到岛上的一次工作访问。

姐弟两人在窗下那张摇摇晃晃的方桌上刚吃完饭。

浅绿色的灯光没精打采。一只玻璃花瓶里插着一把葡萄果

穗。我是来叫索洛古勃参加一个慈善晚会。晚会在私人住宅里举行，因为晚会的目的不宜公开。这是俄国作家们经常为在押的政治犯举办的晚会之一(政治红十字会)。一些富有的人，贵族，将军，全都乐意提供场所，并四处分发“茶话会”的邀请信，而这些邀请信得到的回报还算可观。

最近的一次晚会设在文学家们几乎不认识的一位老将军家(我记得，他死于革命期间)。

我把这一切解释给索洛古勃听。他当然同意，只是有些为难：

——我读点什么好呢？

——嗨，您的诗多得很，可以信手拈来！我可要比您难得多喽……您知道读什么？干脆我们就读我们游戏式的通信吧？您愿意吗？您读您的，我读我的……会逗得人家捧腹大笑的。

我们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也确实在这次晚会上朗诵了我们的简短的诗体通信(索洛古勃当然还朗诵了其他作品)。

索洛古勃的两首优美的答诗后来收进了他的书，我的没有发表过并遗失了。我只记得第一首，戏谑之作，写作的起因来源于索洛古勃的各种小“把戏”——对某人的套鞋的占卜，而最主要的是维·伊万诺夫的一件事：当时，这位刚从国外回来的欧洲诗人前去结识索洛古勃。他一大清早便没了踪影，害得妻子在全城白白地到处找他。当她坐在我们家里，听说丈夫终于找到了，现正躺在自己家的床上，得了荨麻疹时，她吓得浑身发抖。一句话，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居然都记住了：

我们的库兹米奇还在占卜，
还在拨浪鼓似地摇晃他的秃头。
他只想用自己的巫术

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他的算命打卦的把戏
其实算不上怎么高级：
忽而套鞋，忽而天气，
忽而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不，既然你有先见之明，
就别去碰这些东西，
跟英明的巫婆比试一番吧，
在威力中展示你的威力……
啊，我可怜的库兹米奇，
占卜一下我的吉凶祸福吧！

他果然开始为我占卜了，用一首优美的关于"圆"的诗。由此开始了我们的诗歌几何学：

你不在圆里，你整个在点中，
而点容不下我……
……你将死去，
那时你会明白并接受
三重色彩的印章……

关于索洛古勃的下一首诗，我只记得，它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惊人的节奏。

而又有谁知道下面这几句诗呢，它们如此神秘莫测，就连教会的新闻检查官（在《新路》杂志上）也要迟疑良久，不知该不该予以放行：

平静的水面映出人影，
在静夜的月光照耀下，
他们无欲无求地赤身裸体。
两个少男，两个少女
在创造夜间的仪式……

我曾专门背诵这首诗——为了诱惑洛扎诺夫。他听了怒不可遏。

他们用白皙的脚轻轻击打水流，
浪花在脚下荡漾，发出接吻般的声响……

——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这是什么接吻？
洛扎诺夫生气地说。

体内燃烧过的火疲惫地熄灭了，
在庄严的界限中最后的时刻到来……

——您说说看，他们一共几个人？两个还是四个？“看得见水中的倒影”——“倒影”用的是复数，就是说，是两个人？

迈开白皙的脚，一尘不染的脚，
他们跨越了一道神秘的门槛……

这个“门槛”和“界限”令洛扎诺夫耿耿于怀。他一定要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然而他自己又始终不敢去问索洛古勃。跟任何人都无拘无束的洛扎诺夫知道索洛古勃不太容易接近：“穿礼

服的砖头！”

四

……你将在沉默中
认识存在的规律。
造物中一切都是统一的，
何处会出现意识，
何处就会有我。

……

我是一切中的一切，别无其他。
我是活生生的白昼的源泉。
在尘世的苦恼的黑暗中
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爱我吧。

化装晚会。

涅瓦大街附近的一条胡同。一栋精致的私宅。不大的厅堂。墙上是粉红色和火红色的装饰画。电灯很多。滑稽的服装。欢声笑语，翩翩起舞……敞开的门内看得见一张为晚餐准备的长桌。鲜花。

这是什么舞会？大多数人没戴面具，都是些熟面孔！女主人——矮小，黑发，活跃，急躁，年轻，眼睛大而有神。而男主人——是索洛古勃。他此时活像一个年迈的古罗马人：完全秃顶，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身穿黑色礼服，跟从前一样不慌不忙，四平八稳，对客人彬彬有礼。他接受的东西很多。新的文学的彼得堡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革命之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热闹和欢乐

之中。

在我离开的三年时间里，很多东西都变了，索洛古勃文静的姐姐去世了：她的病不是"哮喘"，而是肺结核。作家名声大震。他现在哪里还是什么"市立中学老师"！也不知岛上那座灰色的小木屋还在不在。也许还在，也许楼下还散发着灰尘和粉笔的气息，只是楼上大概已经没有颜色各异的蜡烛闪耀了……

索洛古勃跟年轻的女作家和翻译家阿·尼·切波塔列夫斯卡雅结了婚。

她生性敏感，好冲动，对索洛古勃崇拜得五体投地，但也特别容易吃醋。索洛古勃的声望与日俱增，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怀疑，可对他关爱备至的妻子总是觉得人们对他不公，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总有人与他为敌。

索洛古勃本人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本色。他依旧内向，冷淡——"不好打交道"。依旧从容不迫，雷打不动，间或表现出一种恶毒的机智。如果需要用一句话来确定此人首要的中枢所在，那么，甚至只要一个字就可以做到，这便是：我。当然是最深意义上的，个性概念意义上的。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对人的个性的统一有着更清晰、更潜在、更全面的感受。

他的每一行诗，他的抒情诗，他的温和而苦涩的嘲讽，他的融入日常生活的神话，他的优秀的短篇小说（优秀中最优秀者是伊林努什卡。"你记得吧，不会忘记吧？"）——这一切讲的全是不朽的记忆，统一的"我"的统一的、不朽的爱。他整个就在这个绝妙的中枢中，或者说是在这一个确实绝妙的点中。

即便是在今天，在我们的沉闷的日子里，我们所能见到的他的零星的诗句，表达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吗？是的，只不过加进了一个新的音符，明智和强劲的音符。我想起不久前丘特切夫的"不承认时间"，它在音响上是席勒式的：

不要打听我的道路通向了何处，
我由世界转入了哪个天地……

不过他们，丘特切夫和席勒，我只是想起来而已，并不是要拿索洛古勃同他们对比。让他们各行其道，互不相扰吧。索洛古勃是独一无二的。要知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一切。然而，恰好是这个道理没有谁懂得。

五

我独自在此，我的命运残酷，
而你在远方安眠。
但我们何日相见，
上帝安排好了时间。

天色昏暗。灰蒙蒙的，多雨的黄昏。屋子里没有烧火，很冷。我们坐在桌旁，在我们家里。大家把身体遮得严严的，还是冻得脸色煞白。似乎，遮在我们身上的是些破衣烂布。实际上也差不了多少。索洛古勃身上的那件旧大衣已经千疮百孔，阿娜斯塔西雅·尼古拉耶芙娜的灰色短上衣已经起毛，磨破。而她的脸——蜷缩成了拳头，只有眼睛在不安地闪亮。

我们的情况也不见得好。梅列日科夫斯基身穿女式绒布面短棉袄，脚上穿着毡鞋，外面还套上了一双胶靴。

索洛古勃夫妇是从瓦西里耶夫岛上到我们家来的（当然是步行）。他们常来。他们早就搬回瓦西里耶夫岛了，还是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是因为“思念故土”，索洛古勃说）。但“红色十

月"刚一开始，他们就从家里被赶出去了，家具和藏书全被一扫而光，如今他们只能在岛上的某个亭子里栖身，那里一到夜间地板上就结冰。

——您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费奥多尔·库兹米奇，他们的面包可真大，整整一大块……

阿娜斯塔西雅·尼古拉耶芙娜神经质似地大笑着说。桌子上确实放着整整一磅粗糙的黑麦面包。

——别羡慕，阿娜斯塔西雅·尼古拉耶芙娜。用不着羡慕。我们昨天也吃过面包。

索洛古勃的嗓音还跟从前一样平稳，只是稍微有些嘶哑。

我们交谈着——跟当时彼得堡那些勉强活着的人们一样。他们不光饥寒交迫，更有甚者，他们在被剥夺了食物和温暖的同时，还被剥夺了呼吸的自由。

勉强活着，可毕竟还活着。我们对彼此说，地球上还有另外的国家。比如，有法国，有巴黎。在那里，人们可以在街道上行走，也就是在人行道上行走，而中间是车行道。而且相安无事。甚至还有咖啡馆，没被查封。阿娜斯塔西雅·尼古拉耶芙娜突然想起她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她肯定地说，俄国作家最好成为半个巴黎人。

——这不，费奥多尔·库兹米奇也这样认为。他甚至开始用法语写诗……

但我希望读到的是索洛古勃的俄语诗，而非法语诗。于是他开始朗诵诗，缓慢，单调，坚定，一首接一首。

这些诗那么美，以至我要在前厅里请求阿娜斯塔西雅·尼古拉耶芙娜："给我抄下来吧。我想拥有它们。全部。"用了好多张纸才抄完。全是一个主题。反复阅读，当时的感觉是既美妙又可怕。但我已经不记得这些诗了，手头没有，也不必谈论它们。

就这样，在难以忍受的寒冷中，我们不止一次见面，共享一块面包……

分手以后漫长的、漫长的几个月过去了，春天，收到了他的信。信是寄到"人与车在街道上同行，而且相安无事"的巴黎的。无家可归的自由啊！你是苦涩的，可总比同样无家可归的不自由甜蜜，值得……

索洛古勃夫妇两人都给我们写过信。他们高兴地告诉我们都发生了什么事，还说终于"放"他们走了。只剩下办"手续"。当然，他们是要来巴黎。

没来。不放他们，尽管答应过。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新的秋天又到了。

阿娜斯塔西雅·尼古拉耶芙娜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无论是她的心灵，还是她的幽灵般纤柔的身体。一个凄凉的秋夜，她跳进了涅瓦河已经开始结冰的黑水中。据说，这好像是一个过路人看到的……可我们不知道。直到第二年开春时才找到她的尸体。

还有一封索洛古勃的来信，讲的就是这件事。说是找到了阿娜斯塔西雅·尼古拉耶芙娜并已将她的尸体下葬。

再没有什么。我再也不知道什么。

在火焰中燃烧的——已经燃尽，
　　她对我说。
你，在你尘世的界限内，
　　再不需要我。
我被无穷无尽的爱焚毁，
　　并以死亡践踏死亡，
我要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

升入天国的草丛，
你会找到我的，爱人……

是的，我深知：他会找到她的。因为，对他来说，世上不存在死者，所有的人都是活着的。

1924

译注：

① 尼·明斯基(1855—1937)，诗人。

② 彼·彼·佩尔卓夫(1968—1947)，诗人，政论家，文学批评家。

白发的芬芳——回忆托尔斯泰等多人

一

可不可以写一写青年时代见过的人呢?

可以是可以,只是很难。青年人关心自己,对周围的人往往不大留意。最忘恩负义的——同时也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年龄是17—20岁。对生活尚未习惯,对自己也是如此。不理解生,不理解死,不理解人们,而与此同时又确信他把一切都看透了,正所谓看破红尘,万念俱灰。

青年人的这种对外界的漠不关心,对自己的过分关心,是令人苦恼的。但它是自然而然的,你无可奈何。我要写写青年时代见过的一些著名老人,也就是我曾经见到的和留在记忆中的东西(遵循我一贯的准则——只限于个人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三手甚至二手材料很容易和诽谤混杂在一起)。如果有什么地方我不得不把自己也写进去——请读者原谅我:这是年龄的关系。我的白发皤然的朋友们非但原谅过我不懂事的年龄,还相应地原谅过我不懂事的外表:一

个被宠坏的少年的外表和举止。我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可就连这也未能使我变得稳重些。

旧文学在当时已日薄西山。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相继谢世。但仍有一些人——即使不是那么著名，可也毕竟不是无名之辈——在“高举俄罗斯文学大旗”：波隆斯基①、迈科夫②、普列谢耶夫③、格里戈罗维奇④、魏因伯格⑤等人还健在，更不用说如今已被遗忘的那些人。

最后，健在的还有列夫·托尔斯泰（只是我见到他要晚得多）。

说实话，我当初对这些人“还活着”感到吃惊。当然，我的吃惊不是理智的，而只是凭感觉：既然普希金、波隆斯基和普列谢耶夫的诗收进了教科书，既然从11岁到16岁要一视同仁地阅读果戈理、托尔斯泰、格里戈罗维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那不就等于说，他们全都无一例外地不在人世了，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他们的书。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很难表达，是青年人所特有的。

我第一个认识的是普列谢耶夫。我对“芬芳的白发”的迷恋就是始于他。“白发的芬芳”不是现在的，而是我当时的说法。

阿·尼·普列谢耶夫当时在主持《北方信使》（最早的一个版本：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叶甫列伊诺娃与哈巴狗，萨巴什尼科娃出版）的诗歌部。

我们请他吃饭并决心加把劲：我们知道他喜欢吃。

他来了，很客气：带了编辑部收到的诗稿给我审阅。我不无自豪，高兴地同意“帮助”他。

普列谢耶夫说：

——这是一些真正的诗人。利多夫⑥——年纪轻轻，但已开始发表作品。阿波罗·科林夫斯基⑦……而这是——不知道，什么样的都有，全往编辑部寄……

然而，即便是利多夫的诗我也不是很喜欢：不错，天生对诗歌有感觉。要知道，就连普列谢耶夫本人我也认为是一位"稚气的"诗人，而且，我已能透彻地理解普希金的《预言家》比莱蒙托夫的好在哪里。

我极力说服自己，对"活着的"诗人要宽容(为什么?)，可利多夫的这些诗我就是喜欢不起来：

铃兰弯曲的高脚杯
梦想着存在的秘密……

梅列日科夫斯基大声喊道：利多夫是真正的诗人，他这几句"妙不可言"：

尤如远方的香炉的火苗，
　　夕阳在闪耀，而后熄灭。
你无动于衷地走了，
　　我在燃烧，而后死去……

普列谢耶夫还很欣赏"高脚杯"，我谦虚地不与他争执。不过我马上从一堆不幸的"无名小辈"的来稿中挑出几行滑稽之至的诗句——对春天的描写：

森林穿上了树叶，
树木开始发绿，
灌木丛中传来了
夜莺响亮的歌喉……

我很喜欢普列谢耶夫。他是个身材高大、有些笨重的老人，浅黄色的头发(看得出曾是个金发男子)相当浓密，梳得一丝不苟，全白的长髯一直垂到了坎肩上，很有气派。五官端正，略微有点浮肿，高贵的鼻子和似乎很严厉的眉毛，可蓝色的眼睛却透出一种俄罗斯式的温和，一种特殊的、俄罗斯式的善良和稚气，从而使眉毛的严厉显得是“故意的”。

我还喜欢普列谢耶夫的温厚的享乐主义。他一度家境殷实，可已故的谢德林说，他“在莫斯科把他家的甜馅饼全吃光了”。大概是碰上慷慨好客的了。如今在彼得堡他日子过得很寒酸，近乎贫困。《北方信使》给的薪水很微薄。

普列谢耶夫朴素的住宅正对着救主寺，是在底楼，天棚很矮。那里举办过“娱乐晚会”(不经常)。一旦宾客盈门，年老年少有名无名者挤成一堆，屋子里就会变得闷热。先是青年人合唱，然后是跳舞。普列谢耶夫老人精神焕发，愉快地看着那些翩翩起舞的人，好像恨不得自己也来一圈华尔兹。

我们去过普列谢耶夫家，而且很随便。我当时不记得他的儿子，只记得他的第二个妻子，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她的女儿，年纪很轻的柳鲍奇卡，以及普列谢耶夫第一次结婚生的女儿列诺奇卡，一个长着一双秀手，漂亮而典型的金发姑娘。

普列谢耶夫喜欢一个人到我们家来，吃饭或者随便坐坐。我们谈诗，也谈那些我们赶巧遇到的话题。他喜欢我的活跃和年轻：他说，青年人能让他“振作起来”。

不过，我们谈的诗主要是编辑部收到的来稿。即使谈文学，那也主要是谈当代文学的具体事务。不过有一次普列谢耶夫讲起涅克拉索夫，讲他如何在深夜里，在自己家中为普列谢耶夫朗诵刚写好的长诗《片刻骑士》。他朗诵得那么动情，以至念到写给母亲的那段著名的——

请把我带到为爱的伟大事业
而献身的牺牲者的阵营……

——时，普列谢耶夫和涅克拉索夫本人（好像还有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流下了热泪，普列谢耶夫甚至趴在桌子上，放声痛哭。

普列谢耶夫对这件事只是轻描淡写，但他的讲述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能不这样，换了谁在那种场合都会像他那样痛哭失声的。

普列谢耶夫从来没有谈起过波隆斯基和迈科夫。仔细观察彼得堡的生活，我发现：在文学界的人士之间，在老一辈文学家之间，甚或在所有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界限。原来，这里有“自由主义者”，如普列谢耶夫、魏因伯格、谢苗夫斯基⑧，以及其他人，也有非自由主义者，或者不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最坏的是我还不认识的老头苏沃林⑨，《新时代》报的编辑。报纸人人都可以读，而在上面写文章“不行”。

但不管怎么说，起初我还是感到吃惊：就是这两位诗人，普列谢耶夫和波隆斯基，我们习惯了将他们并称，让他们在教科书中并驾齐驱，而且两人都还“健在”，同住一个城市。可他们从不彼此见面，从不互相往来。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明白过来。波隆斯基呢？是的，他也是老一辈俄国诗人，作品也被选进了教科书，同样也不富裕，住房比普列谢耶夫好不了多少，天棚同样很矮——区别只在于：他是住在顶层，五楼，而普列谢耶夫完全是住在人行道上。波隆斯基家里也有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女儿，几个念大学的儿子……但波隆斯基是新闻检查官。是现在的检查官，还是从前的检查官——我不知道，不过我已经明白几分：美髯飘飘的普列谢耶夫，《前进，不要害怕和迟疑！》一诗的作者，跟手握生

杀大权的新闻检查官之间肯定会有隔阂。魏因伯格也有气派的胡须(另一种风格)和相应的诗作,《大海》——

如无穷无尽的襁褓
展现在我的面前……

——也是从不参加新闻检查官波隆斯基的星期五晚会……

这是我的初步的、粗浅的观察。我仍在回避细节:为什么我们——我、梅列日科夫斯基以及其他青年文学家,甚至还有若干已经不太年轻的文学家——既能跟波隆斯基交往,又能跟普列谢耶夫交往,而且相安无事呢?比方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跟苏沃林交往,尽管他不是新闻检查官?

不过这些细节并未使我不安——我暂时也很乐意去见波隆斯基。

二

波隆斯基的"星期五晚会"和普列谢耶夫的娱乐晚会全然不同。区别何在我还说不清楚,因为这区别很微妙,但我能感觉到。

宽敞的厅堂有两扇窗户,分别朝向两条马路:旗帜街和水池街(波隆斯基家的位置正好在街角上)。里面摆着一张铺了桌布的茶桌,其长度纵贯整个厅堂(我常想:这么长的桌布是从何处搞来的?)。

茶桌周围——是客人。

干枯的、笑容可掬的女主人(波隆斯基的第二个妻子,阿·乔泽菲娜)。窗下是一台钢琴,而在墙角,绿色盆景的上方,是一尊很大的白色雕像——好像是爱神。无论在哪个角度都可以见

到她。厅堂里只有她和这张茶桌。

客人总是很多,但不拥挤,因为客人是流动的:每当有新人来到,那些喝完茶的人便会起身走开。

他们穿过小会客室,进入从来不到厅堂去的主人的书房。他就坐在这个相当局促的房间里,而且总是坐在自己的位子——写字台后面的沙发椅上。

我见到了这张写字台,还有写字台后面这位脸冲着门、体态笨拙、块头硕大的老人——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沙发椅不是很矮。波隆斯基稍稍弯着腰,精神焕发地坐在那里。旁边是他的拐杖。

他没有普列谢耶夫的雪白的胡须。胡须不短,但也不长。他已经须发斑白——确切地说,是灰白。眼睛炯炯有神,而且声如洪钟。忽而高兴地喊叫,忽而生气地或严肃地吼叫。有时还用拐杖敲地板。

写字台将他与客人隔开,客人只能面向波隆斯基坐在椅子上或墙边的沙发上。他说话也是面向所有的人,始终有点像是站在台上。不过,也有客人坐在身旁,说话亲密一些的时候。

波隆斯基很快便对我表现出厚爱。他经常让我坐在他旁边。

能够进入书房的都是些有身份的人,大概,也是些有名望的人吧(只是当时我不知道)。年轻一辈——波隆斯基的孩子连同自己的客人,大学生和小姐们——在隔壁的房间里不时地放声大笑。

我得承认,开始,这隔壁的房间曾勾起我的伤感和嫉妒。我特别想过去,到无忧无虑的他们中间去。想去——可惜不可能。怎么会是这样的,其实,我的年龄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要小呢。他们是彼得堡的“年轻一辈”,他们有自己的事情。我呢,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文学家嘛,我都发表作品了。我应该坐在书房里,并

倾听文学家们的谈话。

既然如此，我也就平静了。还是想想办法，让我们这儿也变得不枯燥乏味才是。不过——但愿他们能把门关上！

波隆斯基在兴奋地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的诗。他在讲，有哪些词是他创造的，是他第一次纳入文学的。如果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抛出了“стушеваться”（由浓转淡）一词，那么他，波隆斯基，则创造了“непроглядная”（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说实话，我对这些“新”词并不感兴趣，觉得已经是陈词滥调。令我吃惊的只有他的一个发现：在卡拉姆辛之前，没有“предмет”（对象，客体）一词，卡拉姆辛是它的创造者。

只要有人要求，波隆斯基总是很乐意为大家朗诵诗，这是常有的事。

他的朗诵很奇特，完全是自己的风格。很有可能，在真正的舞台上，而不是在这家庭的舞台上，在写字台后面，他也是这么朗诵的。可惜我没听过。

他的嗓音犹如长号，低沉浑厚，间或会令人恐惧地拔高。他的朗诵至今萦绕在我耳畔，我能够大致地模仿出来，但却不能描绘出来。普列谢耶夫和魏因伯格的朗诵带有当时的大学生所要求的特定的激情。波隆斯基的朗诵不同。开始你会觉得很可笑，而然后你就会喜欢上。

有形一式，但它是空的！
漂一亮，但它不是美！

这两行诗本身就写得不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言之有物的，通过波隆斯基浑厚的吼叫，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

他还以同样的方式朗诵了他唯一的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

诗：

她与我何干？不是妻子，不是情妇，
也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可究竟为什么她该死的命运
搅得我彻夜不能入睡？

我不知道，为什么波隆斯基的另一首堪称优美的诗作没能流行起来，就连波隆斯基自己都不朗诵它(当着我的面)，好像在台上也很少有别人朗诵。不难想象，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要是朗诵这首诗，声音肯定会像打雷：

作家，假如只有他才是
波涛，而俄罗斯是大海，
他不可能不奔腾翻滚，
当整个大海在汹涌澎湃。

作家，假如只有他才是
伟大的人民的神经，
他不可能不感到疼痛，
当自由的创伤如此严重！

但"大学生"要求给这首诗取名为《前进，不要害怕和迟疑！》，他们只相信白胡子，而诗本身是好是坏他们根本不在乎。

在波隆斯基的星期五晚会上什么人没见过啊！作家、演员、音乐家……这里有催眠术专家费尔德曼，有新时代的气象预报专家凯戈罗多夫，有说书人戈尔布诺夫，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一

家，还有安东·鲁宾斯坦……每年12月底，波隆斯基生日那天，都要举行大型晚会。晚会上，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好像整个彼得堡的核心全集中在波隆斯基家。

主人依旧坐在老地方，写字台后面，庄重地接受来宾的祝贺。不过有一次过生日时，他却拄着拐杖走进了厅堂。没呆多久，只是在安东·鲁宾斯坦丢下纸牌、扑向钢琴，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恶狠狠地击打琴键的时候。

所有的房间都开着门，而且全都挤满了人。没有安排跳舞(牌桌只有一个，是专门为鲁宾斯坦准备的：每逢星期五禁止任何人打牌)。客人都是有身份的，都是达官显贵，名门望族。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伯爵的夫人温文尔雅，但不漂亮，披着黑色的面纱，好像守寡的皇后，不时地朝介绍给她的人微笑着……我不由地想：这些诗句难道就是写给她的吗？

在喧闹的舞会上，
在世俗的空虚和惶恐中，
我偶然见到了你，但一个秘密
遮盖了你的面容……

是否人人都知道，这舞会——是化装舞会，这“秘密”——不过是一只面具，而且遮盖的是一副少有的、不漂亮的面容？

我是否爱你——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我是爱你的……

这首诗具有怎样的魔力啊！人的心灵又是怎样的幻术啊！没见到脸——只是“觉得”他爱她。见到了这张不漂亮的脸(年轻时

她还要难看)——大概这才明确知道他爱她……

在人群中,有一个独来独往、举止古怪的人,他忽而来到这个房间,忽而进入那个房间。我们不时地偷看对方,我看他,他看我。他个子不很高,身体瘦削,走路不慌不忙,脚跟紧贴着地面。脸色苍白……是个老头?不是。这个年龄不明的人物,鸟儿一样的脖子青筋裸露,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一点令我震惊)——他长着一双特别苍白的、蜡一般透明的大耳朵。这双大耳朵甚至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大耳朵走来走去,东张西望,跟谁都不说话。不,看啊,他站住了,在跟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女儿说话……又走了。又回来了。这回,他是在跟明斯基谈话。应该去问明斯基。

可明斯基在人群中不见了,过了很长时间,等大耳朵的人完全消失时才找到他。

——请问,这个大耳朵的人是谁?他刚才还在窗户旁边跟您说过话?

——怎么,您不认识他?可他向我问起过您。这就是波别多诺斯采夫⑩!

三

我还是回到波隆斯基上来,因为我还记得他的一个特点,很有意思,但现在我想把我的第一个忘年交——普列谢耶夫可爱的肖像画完。

我们经常见面,万一没能见面,就互相写字条,甚至写信。每当夏天我们各奔东西——他去别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火车站,我们去莫斯科近郊——我们间的通信便会异常活跃。此时我仿佛看得见他黑色的蝇头小字,写在带横格的不大的信纸上。他对

我无话不说。谈诗歌，谈生活，谈别人，谈别墅……但他的口吻永远是和蔼可亲的：从来不以长者自居。他喜欢开玩笑，而且是那么天真和温存，丝毫也感觉不到我们之间竟相差40岁。

他谈到刊物的事。有一天，我突然收到这样一封信："请转告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让他不要急于为自己的两本书寻找出版者，跟苏沃林的接触最好等一等：也许我本人能出版这两本书。您会惊奇，会问：我的钱从哪儿来呢？是这样的，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似乎很快会变得富有，而且非常富有……"

确实意想不到：普列谢耶夫继承了一笔庞大的遗产。这笔遗产是从谁那儿继承来的，我担心会说错，但好像是一位他从未指望过的远房亲戚。遗产有争议：不过经过一番折腾最后还是确定他为合法继承人。很快，普列谢耶夫一家全去了巴黎。

那年开春之际，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决定，我们也出国——到意大利去旅行六个星期。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有幸漫游过俄罗斯——"从芬兰的寒冷的礁石到火热的科尔西达"——可欧洲……要知道，欧洲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维也纳开始，欧洲就把我征服了。威尼斯——意大利第一城，也作为"世界第一城"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们在那儿已经住了两个星期时，有一次，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昏暗的圣马可教堂里见到一位高个、驼背、身披褐色斗篷的老头：

——这不是苏沃林嘛！另一个人，跟他在一起的，是契诃夫。等他们走到广场上，我要跟契诃夫打招呼。他会介绍我们认识苏沃林。换了布列宁[11]，我才不理他呢，可苏沃林，尽管是一块地里的果子，但味道不一样。至少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我们俩都认为契诃夫是年轻一代小说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位。梅列日科夫斯基甚至不久前还在《北方信使》上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不过我很少关注过契诃夫,这是出于一种幼稚的成见:首先,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作家中没人能比得上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其次,我觉得契诃夫的笔法绝对不够坚实。不过,认识一下"可怕的"苏沃林我还是愿意的,一是因为习惯了跟老人打交道,二是好奇。

提到苏沃林,我要走题了:须知,他的白发可一点都不"芬芳"! 我之所以允许自己走题,是因为他的个性对俄罗斯来说很有代表性,也很有意思。

不过首先,我好像需要再随便一些:稍微谈谈契诃夫。可他不但没有"白发",而且还能感觉得出,他永远都不会有白发! 这并不是因为想到了他的早逝。而是因为契诃夫——至少我是这么觉得——似乎天生没有年龄。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经常见面,而且每次见面他都依然如故,同在威尼斯时相比,既没变老,也没变年轻。这种印象很牢固,很清晰,对我后来搞清楚作为人和作为艺术家的契诃夫很有帮助。他身上有很多非同寻常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如此细微,如此藏而不露地深植在他的体内,以致我们如果不先搞清楚他身体的基础,就不可能抓住并理解它们。

而这基础就是——静态性。

契诃夫具有静止不动的天才。他并非老气横秋,僵硬不能动:不,他是个很有活力的人,甚至具有罕见的天赋。只是所有这些天赋马上就被放弃了,最后只剩下一种天赋(如果这也算天赋)——在时间中保持静止不动。

任何个人(哲学概念上的)都是一种局限性。但运动中的个人,它的界限是动态的,多变的,弹性的,可以延伸的。但契诃夫

的界限是坚硬的，一成不变的。无论什么，体内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任何运动他都看成一种外在的东西，并仅仅把它理解成外在的东西。要换一种理解就要具备内在的运动。而且要善于将外在的一切纳入自己的范围并将之与内在的一切结合在一起。契诃夫不知道什么是结合。他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由于不生长，自然也就与“年龄”不相干。生下来是四十岁，死时还是四十岁，似乎处于个人的顶峰。

“一个自己时刻的正常人和正常而优秀的作家，”有一次谢·安德列耶夫斯基这样评价契诃夫。是的，正是这样。在契诃夫那里，不存在时间，只存在时刻。“正常”一词用在契诃夫身上是非常恰当的。他连外表都是“正常”的，跟他很相称。一个正常的外省医生，受过正常的教育，有着正常的文化程度，他的生活与此相称，他的爱情与此相称，他的写作与他的出色才华相称。在自己的范围内具有细致的观察能力和——有些粗糙的手法，这也是正常的。

甚至他的病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正常”的，没人能想到契诃夫会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或梅什金公爵那样，在癫痫病发作时瘫倒在未婚妻面前，打翻珍贵的花瓶。或者像果戈理那样，受戒十日，焚毁《海鸥》、《樱桃园》、《三姐妹》，然后才死去。有时契诃夫企图（可并不在乎）突破正常的理性主义的框架，创作出不同于平常的作品。他触及过“疯狂”（果戈理是否疯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魔鬼乃至左西玛长老是否疯狂，还有托尔斯泰及其“主人”是否疯狂？），但契诃夫此类作品中的疯狂却是一种最为正常的疯狂，描写细腻，富于洞察力，甚至富于柔情，医生式的由表及里。要么干脆变成——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对《黑衣僧人》的天才评价——“一塌糊涂的石印油画”。

契诃夫看女人也是由表及里——要知道，他是个男人！他身

上没有丝毫的女性特征。他观察女人，研究女人，正常地追求女人，如果他喜欢她，他会正常地娶她。就这一点而言，他给未婚妻和妻子的信（不久前公之于世的）很有说服力。里面的一切都是“相称”的，一切都是各就各位的，一切都是“正常”的。

单就严整而论，契诃夫已经堪称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对那些倾向于“标准”和静态但又沉默寡言的人来说，契诃夫当然是需要的，亲切的。他是他们在“艺术”中的代言人。不过——真不知道，如今该到何处去找这样的人：生活、运动、形势，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帝才知道，“标准”这个概念成了什么样。要知道，就连“标准”也是可以移动的。契诃夫是个正常的人和“自己时刻”的作家，也就是说，是静态意义的标准的人和作家。

不过我的插叙拉得太长了。早该回到威尼斯了。

我喜欢上了“可怕的”苏沃林（他甚至没有去过“新闻检查官”波隆斯基的家）。多么生动的老人！如同水银浇筑的一般。萎靡不振的契诃夫像秋天的苍蝇一样在他身边移动。是苏沃林把他“硬拖”出国的，显然是想让他开开眼界，领略一下欧洲、意大利的风光。他驾轻就熟地为契诃夫指点圣马可教堂，广场上的鸽子，以及一些“艺术品”。擅长讽刺和头脑聪明的契诃夫做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故意“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逗自己的保护人生气。他是善意的：他对苏沃林极好。

不过契诃夫确实对“欧洲奇迹”有点不以为然。他对这些东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契诃夫式的看法。苏沃林懊丧地笑着抱怨道：

——他总是着急要去罗马。说什么，那里至少可以找块草地躺一会儿！

在威尼斯的最后几天我们几乎是在一起度过的。每天晚上我们都在城中散步，然后去河岸街一家最好的宾馆，苏沃林住处

的豪华沙龙喝意大利葡萄酒。沙龙挂满了无框的威尼斯镜子和带有闪光的玻璃垂饰的吊灯。金色的葡萄酒同样闪闪发光。大家都很快活。最快活的是苏沃林。他滔滔不绝地讲话,甚至坐都坐不住,动不动就站起来。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和他争论。他争论得很激烈,一再论述,证明,坚持自己的看法。可突然,他停了下来。耸了耸肩膀。完全换了一副口吻补充道:

——鬼才知道呢!也许,并不是这样的。

对他的这种反复,我当时只是觉得好玩。过了很久(我跟苏沃林的私人关系不限于威尼斯:我们间或见面,偶尔也通信,只是措辞比较激烈),我才理解这个非凡的俄罗斯人深刻的、精神上的虚无主义。不知为什么,这个才华横溢、带有几分狡猾的聪明人,竟然毫无快意地在精神上将自己整个儿挥霍净尽。俄罗斯式的。

他的脸也是很俄罗斯式的。跟普列谢耶夫、波隆斯基一样。但普列谢耶夫,尽管曾经呼吁"前进,不要害怕和迟疑",却是真正的俄罗斯贵族,出身名门,皮肤柔软,毛病不少,有些懒惰。波隆斯基的脸较少善意,常流露出些许彼得堡的官气。真正有官气,地位又很显要的当数英俊、枯燥、长着一双锐利而聪明的眼睛的迈科夫。或许,屠格涅夫拥有一副地主老爷的面孔。过于活泼和琐碎的格里戈罗维奇没能保持贵族气派,或者说是没能达到这种境界,当年他曾颇为讲究发型和胡须,但那"完全是模仿屠格涅夫"。

苏沃林的脸虽说也是俄罗斯的,但这是俄罗斯农民的脸。并不是说它粗糙,说苏沃林身上残留着农民气,这无论如何是不切合实际的。但他身上有一种难以发觉的狡狯。他的五官,他的整个面孔,正是一个聪明和固执的俄罗斯农民的面孔。灰白的胡须剃得不算短。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双快活而狡猾的眼睛。向后

梳的头发（从前肯定是淡褐色的）尚未变得稀疏，只是额头有些秃了。由于个子高，所以驼背，脑袋有点往肩膀里缩。

显然，他跟普列谢耶夫一样，喜欢我的活泼，但他并不需要别人的年轻来使自己变得年轻：好像他自己有足够的储备。

我们的晚间聚会以苏沃林和契诃夫把我们送回我们简陋的旅馆而告结束。我跟苏沃林走在前面，契诃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走在后面。我们还在继续争论，苏沃林情绪激动，褐色的斗篷不停地抖动。契诃夫用平稳的男低音说，他喜欢晚些时候在这里问每一位意大利"小姑娘"——Quanto[12]？由于不会讲意大利语，他无法进行更细致的观察，不然，至少可以打听到，物价能低廉到什么程度。他已经碰到过一个小姑娘，她回答说："Cinque[13]……"

我们是乘同一辆火车去比萨的。一路上尽是在争论布列宁。其实这算不上争论：对我的尖刻苏沃林只是抱歉地耸耸肩膀，并说：

——鬼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不是个好人，也没法说他好……

一到比萨，苏沃林和契诃夫便开始狠命地催促我们。只呆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他们就离开了比萨。在佛罗伦萨，旅游快结束时才碰到了他们。契诃夫一点都不喜欢佛罗伦萨。我们跟行军打仗似地乘车赶路。最后一次跟他们碰头是在罗马，白色的圣保罗大教堂里。阳光明媚的一天。彩色玻璃窗映照出来的浅蓝色和粉红色斑点，投射在白色的大理石上。依旧是苏沃林生龙活虎，风风火火，契诃夫慢条斯理，磨磨蹭蹭……只是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在罗马，找到了可以"躺一会儿"的草地没有。

四

我们计划5月初回到俄罗斯。可已经5月中旬了，我们才到巴黎。我是初次到巴黎，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更不必说新近落成的埃菲尔铁塔了。就连巴黎人对它也还没有习惯。

有何事发生？

在罗马收到了普列谢耶夫热情而诱人的来信：既然我们已经到了国外，何不到他那儿去一趟？“哪怕是稍作停留也好，但愿你们能知道，巴黎有多美！5月是巴黎最好的月份。直接到我的旅馆来吧……”

这家旅馆原来是米拉波饭店（当时还未改建）。普列谢耶夫寓所宽敞的阳台朝向马路，而我的正对面是“沃尔施”简陋的金字招牌。左边是凡多姆的灰色廊柱，下面是出租马车欢快的铃铛声。

——我没说错吧，好不好？爸爸就盼着你们来呢。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普列谢耶夫的女儿们一边给我指点“自己的”巴黎，一边问。

老人也陪着我们。然后我们到他的寓所喝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精神焕发。他很高兴见到我——我也很高兴见到他。不过他还是有点变化。这并不是说他的住处已经今非昔比，由救主街低矮的客厅换为巴黎最好的饭店。而是说他瘦了，面部消瘦了，而且坐在沙发上已经不是很灵活。尽管他精神饱满，但比起当年在彼得堡到我们家爬五层楼时，还是有了几分老态。

但这并不明显。他说，巴黎能使他“精神振奋”，永保青春。在家里坐不住。我们跟着他逛街，游布龙森林，而晚上——去“安巴萨都”咖啡馆，那里，戴着黑手套、年轻苗条的女演员不断赢得满

堂喝彩。

饭菜特别味美可口(普列谢耶夫讲究吃)。有一次,饱餐一顿之后,他又说:“喂,现在领我去 assommoir[14]!”随即又哈哈大笑,善意地嘲弄起自己:

——真荒唐,我想说的是去 ascenseur[15]! 侍者们盯着我纳闷:刚吃完饭,突然又要领这老头去——!

可刚休息一会,他又抓起绅士帽(他变得衣着考究):

——我们走吧,哪怕是逛逛街心花园,走走,看看……

一生贫困,到了晚年,却得到一笔突如其来的财富,这在当时,即使是对一个家境殷实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普列谢耶夫,一个“进步”诗人(当时都这么说),一个有着自己“闪光的”过去(他曾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有牵连,甚至还被判过死刑)的诗人,一夜暴富,这不但没有使他的处境有所好转,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然而,我可以作证,命运的意外转变并没有使这个可爱的人发生丝毫改变。相反,他的温柔的、俄罗斯式的有些缺乏条理的善良,他的纯真的、令人感动的享乐主义,变得更加突出了。巴黎的每一样细小的东西都会让他高兴。湛蓝的天空让他高兴,另外,瑞士,还有尼斯的蓝色大海,同样让他高兴。看着他那高兴不已的样子,你自己都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快活起来。他喜欢生活的每一次振颤,极力捕捉它,感受它,因为对他而言,生活确实是所剩无多了。

有一回他说:

——这财富于我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我不必为孩子发愁了,仅此而已。还有,临死时,我自己也可以稍微松口气了。

他的身体的确大不如前,他甚至没有回彼得堡过冬天——他本来是很想回来的。从那时起,他只有在夏天才回俄罗斯,住

在彼得堡的别墅里。巴黎和尼斯之后，我们再没见面。这两年对他来说等于是命运的恩赐。生命确实在“向他报以告别的微笑”。

他的“最后一天”是在晚秋的巴黎度过的。他好像是猝然死去的，没有痛苦。

灰蒙蒙的喀山大教堂，祭祷仪式。我发现，在人群中，到处都是我的朋友们——普列谢耶夫的同龄人的闪烁的白发。

走出教堂时彼得·伊萨基耶维奇·魏因伯格低头对我耳语道：

——您知道吗，他死了是件好事。那些继承人打赢了官司，他若是还在，他的所有财产都要被抢走。所幸的是，他的家庭已没有后顾之忧了。

果真如此，命运向这个天真可爱的人发出的告别的微笑，这个小小的奇迹，岂不是更加神奇了吗？

五

波隆斯基自认为他是个冤枉的、未被承认的小说家。这一点我是慢慢了解到的。

每逢星期五，他越来越经常地安排我坐在他的身边，没完没了地讲他自己的故事，讲他自己的文学成就……还有“失败”，因为，正如他所抱怨的，人们只顾“赞美”作为诗人的他，却全然不愿了解他的散文。而他的散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比他的诗更令他满意，而且数量可观，大概不比屠格涅夫少。

——写诗又怎么样！屠格涅夫也写诗。糟糕透顶……除了长诗。他的长诗我还是喜欢的。

说完（这样的谈话往往不长，有客人打扰），雅可夫·彼得罗维奇吃力地离开自己的座位，拄着拐杖走到墙边的一个柜子旁，

翻出自己还未裁剪开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

——您读一读，读一读。您自己判断吧。等您读完了，我再给您几本。写信把您的想法告诉我。

他对我唠叨着，在书上写下温存的题词。

他把我连同这些书送走时，既温柔又感激——因为我将读他的书。

后来，他又给我寄来几本新书。我长期保存着他的书信，写得很长，很全面，详述每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经过——当然，依旧牢骚满腹，抱怨他的小说没得到应有的评价。

为什么他选我作为他的评论家，我这个年轻人的评判对他意味着什么？我想，这肯定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些书分送给所有的人，听过所有人的意见，而我是个新人，而且是个年轻的“文学家”——新一代。于是乎便想要再听一次别人对他的小说的看法。也许，在内心深处，他还认为他的小说同屠格涅夫的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我有一个印象，波隆斯基的忿忿不平正是冲屠格涅夫来的。屠格涅夫的东西全得到承认，而他波隆斯基的小说却默默无闻。

这里我又要插一段。多年以后，已是战争期间，玛丽娅·加夫利洛芙娜·萨文娜对我们讲过屠格涅夫和波隆斯基的故事。

那是一个明朗的春天的夜，她来得很晚，刚参加了一场晚会。（这是她最后一次来。当年的秋天她就去世了。）

萨文娜的讲述是无法再现的。作为一个演员，她不是无懈可击，但作为讲故事的人，她是才华横溢的。她的言语中充满迷人的幽默，时而温存，时而恶毒，而且每次都击中要害。

她跟屠格涅夫有过一段“罗曼史”。直到他去世那天仍未终止通信。萨文娜讲了他的最后几年，讲了克拉拉·米利奇……

——他写完《胜利的爱之歌》时，我正好在他的斯巴斯科耶

作客。雅可夫·彼得罗维奇也在,他们是好朋友。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希望我们听一听他刚完成的作品,也就是《胜利的爱之歌》。他的朗诵是在晚上,在阳台上,点着蜡烛。时值夏初,百花盛开,入夜,温馨而宁静的空气中洋溢着沁人心脾的芳香。屠格涅夫很激动,我感到,他很重视这篇作品,就连他的嗓音都显得异常高亢。朗诵结束后,波隆斯基沉吟片刻,然后用自己低沉的呻吟不满地喊道:他一窍不通,写得太臃肿……"不,这篇作品你没写好。"屠格涅夫没有反驳,没有争论,但我的心能感觉得到,波隆斯基的反应对他的打击有多大。而且我觉得,波隆斯基纯粹是在胡说八道,是出于愚蠢或嫉妒,我不知道……而我自己没法说什么,不便于说,也不会说。不过屠格涅夫肯定明白了我心里的话。后来——波隆斯基走了以后——我们俩来到昏暗的花园,久久地一言不发,在芬芳的花草中间走来走去,又同样一言不发地在长凳上坐了许久,好像我在以此给他女性的、无言的温存和安慰,用沉默来告诉他我想说的一切……而花园和宁静的夜帮了我的忙。

波隆斯基的长篇小说当然不同于《胜利的爱之歌》这类"胡说八道"。大概是因为这是固执而温存的雅可夫·彼得罗维奇的赠书吧,我当时还是比较喜欢的,但后来则忘得一干二净。我甚至觉得奇怪,要知道,年轻时读过的东西,无论如何是终生难忘的。而这一回却适得其反。也许,那些认为波隆斯基的小说在屠格涅夫之下的人并不见得有失公允。

六

在我的忘年交和熟人中,唯一一位不大喜欢自立门户,并尽力对某种"文学界"给予支持的是彼得·伊萨基耶维奇·魏因伯

格。不错，他并不是一位得到普遍承认的俄国"诗人"，不能同波隆斯基、普列谢耶夫、迈科夫相提并论。人们景仰他，尊敬他，知道他。青年人对他的《大海》崇拜得五体投地。然而，他毕竟主要还是一个翻译家。"来自坦波夫的海涅"，所有文学晚会的灵魂，"诚实的"文学—社会流派的保护者。身体消瘦，快活机智，言谈举止赏心悦目，完全秃顶，面部轮廓酷似《圣经》中的先知。他的胡须非常奇特，中间夹杂着灰色，不同于普列谢耶夫的扇状。魏因伯格的胡须是亚伯拉罕的胡须。

大概他是犹太血统，这一点我不敢肯定，因为从来没人关心过这个问题，甚至包括魏因伯格本人。名副其实的文学家，俄罗斯语言的行家，才华出众的诗人，人人爱戴的彼得·伊萨基耶维奇——难道这还不够吗？应该说，在当时的文学中，"犹太问题"总的来说是很少存在的（只有布列宁提出过这个问题，是针对纳德松[16]的）。而在"旧"文学中，这个问题根本不被提及，也没有任何意义。就连那些"非自由主义"作家，如与捷尔吉·菲利波夫颇有交情的迈科夫，或与波别多诺斯采夫过从甚密的波隆斯基，也不认为这个问题有意义。

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听到过有哪位老一辈作家提起这事。就连苏沃林自己在谈话中都不好意思触及犹太问题，感到从文学传统角度而言，这是"不合乎习惯"的。不仅如此：过了很久，大概是在1906年，我曾就他对犹太人的态度问题给他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他在回信中尴尬地说："对此，我能回答您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能回答。"

尽管当时已经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学团体，如莎士比亚小组和"星期一"文学社，但只有魏因伯格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纯粹的"文学界"。他一个人生活，日子过得很简朴。他住在喷泉街，阿尼契科夫大桥下面，房子十分窄小，但各路作家都乐意来此聚

会。我说的不是个别作家，而是整个文学界。

魏因伯格温柔而忠实地爱着旧文学，熟悉并珍视其传统，甚至风习，但他对新生事物也兴趣盎然，在这方面，别人恐怕有所不及。他试图掌握并领会文学运动的变迁，更迭。可能他觉得，他注定要比几乎所有的同龄人长寿(他比契诃夫死得还晚)，注定要目睹不止一次的变革。另外他也确实精力充沛，感觉敏锐。

不久，当颓废派刚刚萌芽(或可说尚未萌芽)的时候，他便大胆地邀请我参加文学基金会的传统晚会(一年一度，在商业学校大礼堂里举行)。要明白从魏因伯格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气氛，当时的公众，"旧"青年。普列谢耶夫、迈科夫、格里戈罗维奇、波捷辛[17]、魏因伯格本人年年都要在那儿登台朗诵，从前波隆斯基身体好的时候也参加，还有屠格涅夫，甚至陀斯妥耶夫斯基——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又是一些老人，依旧是格利戈罗维奇、魏因伯格和我！魏因伯格对我个人很好，不过，有时也显出几分顽皮：别光说我们，你们也要听一听新东西！跟他在一起，我们有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些淘气的孩子。假如有人大声喧哗，魏因伯格并不理会：让他们喧哗好了，这样反倒更让人高兴。他本人跟我一起登台演出过几次。为了尽兴，每次收场时他都要朗诵《大海》——同时又做出厌倦之至的样子——他不过是在满足观众的要求。

魏因伯格愿意接纳年轻人，希望能形成新老结合的局面，让观众逐渐适应他们。但进展非常缓慢，在基金会的晚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毕竟还是旧的优良传统。

迈科夫的朗诵我只听过一次。他朗诵得很好。身体干瘦，穿着一丝不苟，相貌英俊，有一双冷峻而又聪明、锐利的眼睛。他的朗诵具有同样冷峻的穿透力和一丝嘲讽意味。有两行诗我记得特别清楚(《执政官夫妇》)：

听得见——还是听不见？
他睡着——还是没睡？

他朗诵的《三死》也是令人叫绝：

别了，高傲的幻想，
我无法将你们实现。
啊，我将像神一样死在
他开创的世界中间！

迈科夫毫无疑问是当时诗坛上最有才华的诗人。但他的天赋总让人觉得有点美中不足。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那么快就被遗忘了，而且始终没能像费特那样——我认为——受到人们的喜爱。

我们与迈科夫的关系从来不曾密切（又有谁曾跟他关系密切呢？我想不起来）。经常见面，有时他也到我们家来。

有一段时间他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朱利安》很着迷，甚至还在家里组织过朗诵。

他给人的印象全然不像个"老人"，情绪饱满，精力旺盛，生龙活虎一般。他的去世出人意料，但不知何故没在文学界引起反响。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们当时不在彼得堡。

在基金会的晚会和类似的晚会上，我最感兴趣的是"演员室"。我在那里有幸见到当时所有的名人和半名人。比如费格涅尔[18]，当时还相当年轻，留着栗色的连鬓胡，在角落里踱来踱去，等待着自己的节目——显得很紧张。他的妻子美迪亚·费格涅尔，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女人，在斜对面，也在踱来踱去——也显

得很紧张。我惊奇地观察着他们：这些歌剧演员，有什么可紧张的呢？他们告诉我，每次出场之前，都是这样。这也许是职业特点吧。不过萨文娜不一样，她不慌不忙，从容地坐在桌旁喝茶。矮壮、黑眼、已经须发斑白的科罗连柯好像在跟加林说话：这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小说家，著有《捷马的童年》，赢得了普遍赞誉，可我——不喜欢。

还是让我们从这个明亮的房间转移到另一个“幕后”般的房间吧。那里现在更有意思。那是一个紧密的成员作家与非成员作家的小组。小组的灵魂是格利戈罗维奇。他在讲“笑话”（他永远在讲什么）——压低了嗓音，以免打扰别人。时间很多，因为奥尔加·沙皮尔在朗诵《关于爱》，魏因伯格刚到厅里打过照面并宣布：

——目前一切都好。只有一个人睡觉。她还没有进行到一半。

格利戈罗维奇讲的东西总是令人吃惊。据说，有一半是他虚构的，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意思就行。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位格利戈罗维奇，我从小就熟知的《乡村大道》、《苦命人安东》的作者。从照片上看，他是个十足的绅士，留着一副连鬓胡。而眼前这位——身体细长，好动，白色的胡须剃得很短（效法屠格涅夫）。

我和格利戈罗维奇是好朋友。经常见面，快活地聊天。他热情地鼓励我：

——写吧！写吧！

他甚至还画着小小的十字，祝福我未来的文学道路。他画的之所以是小小的十字，那是因为当着众人的面不便于手势太大，即便是在“演员室”里。

在演员室里，亦即在第二个房间里，“在幕后”，他还给我们

讲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他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了农民是多么痛恨由医生变为地主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如何当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面在树林里把他活活打死。我记得，他说了“当面”两字，并且问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能忘记这件事吗？能吗？这件事能解释很多问题。”

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是前所未闻的，我们全被惊呆了。而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七

魏因伯格的快活和机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如他的即兴之作。随便给他一个词，他都能当场给你找到它的韵脚。我们之间通信始终是用诗。他经常到我们家来。每次来都要爬五层楼，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就在爬楼的功夫，他已经完成一首长长的赞美诗，一进门，他便开口朗诵，并这样结尾：

> 而然后——
> 请接受古尔梅的糖果。

每到晚会接近尾声时，我们六七个人便开始筹划，到哪儿去吃晚饭。去帕尔金家？去多诺恩家？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提议去“狗熊”酒家。意见不统一。但坦波夫的海涅——他有一首诗曾经家喻户晓，写的好像是一个九品文官和将军的女儿——这时开口了：

> 既然主人发了话，

那我们就去“狗熊”酒家！

于是我们便奔赴“狗熊”酒家，彼得·伊萨基耶维奇用他的即兴之作，用他的“远古的传说”，使气氛又变得活跃起来。这是一口真正的文学传说的深井。他甚至知道早已无人记得的杂志《世纪》的“丑陋行为”是怎么回事。我要悄悄告诉未来的古代文学掌故的收集者，这究竟是怎样的“行为”：一家自由派杂志，或是团体，组织了一次文学晚会，并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估计也跟文学沾边）登台朗诵普希金的《埃及之夜》。当她声情并茂地念道：

谁会来此热情的集市？
我要出卖自己的爱情！

观众情绪激奋，反响强烈——但态度有些难以捉摸。为此，《世纪》向晚会的组织者，部分地也是向那位女士，发起了猛烈攻击。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妇女问题”也被拉扯进来，《世纪》（当时参与该杂志的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哥哥）连同自己的“丑陋行为”——企图侵犯“妇女自由”——一起遭到唾弃。

有一次魏因伯格给我带来一样东西，不是古尔梅的糖果，而是一个写诗用的红色的山羊皮封面的笔记本。第一页上是一首戏谑性的献诗：

纵然您住的是七层楼，
我的爱仍是一如既往，
即使您住得比涅瓦河底还低，
我的情依旧不会两样。

什么样的心都不难领略，
唯独这样的情愫天下难寻：
这是来自坦波夫的海涅，
赠送这本纪念册的老人。

接着，下面还写了这么两句：

三年过去了，血已开始变冷，
但对您——我的爱依旧滚烫。

（这个笔记本后来记下了我整整15年的诗作，它同我远未失去历史价值的全部档案一起遗失在苏维埃俄国。）

魏因伯格对文学的柔情绝对不只限于书本。他不断地出席一些委员会的会议，夜以继日地在基金会里工作，接待作家，为处于困境的人筹措贷款。他耐心倾听每一个来访者的陈述，即便是对那些写作狂也一视同仁。必要的时候开几句玩笑，但总是带着快乐的、善意的幽默，不会使任何人受到伤害。

然而岁月无情。老人们，魏因伯格的同龄人，都相继谢世。文坛上萌生了新的流派。魏因伯格当然不能加入其中，他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他太真诚了。但他跟从前一样，善意和关切地对待新生事物：难道这不同样也是他所忠诚捍卫的俄罗斯文学吗？

他已经老态龙钟，可依旧不时地自嘲，对自己的衰老抱着乐观豁达的态度。出国疗养过——有一次我们在德国偶然碰到他。我记得，契诃夫去世时，他非常伤心；甚至愤愤不平：他对契诃夫评价很高。不过，他从前也承认过，他不能接受契诃夫的生活态度，说他热衷于“琐屑、阴沉的生活，缺乏正面的东西……要知

道，他是有才能的，屠格涅夫式的才能！”我又挑逗他：“什么正面的东西！您习惯了有‘理想’的作家！如今都改弦更张了！”

对高尔基，魏因伯格明确表示不能容忍，尽管承认他有才能。对安德列耶夫，他简直无法理解，甚至也不想理解，只求避而远之。我们经常谈论当代作家。有一次他对我提起蒲宁，不知何故我们在彼得堡对他知之甚少：“这是个扎实的好作家。只是……”

——只是什么？他也缺乏“理想”吗？

——不是。他到底热爱什么？要知道，作家应该义无反顾地热爱什么才是。

一般说来，魏因伯格不是简单地接受八面来风。他要认真分析，仔细观察。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老人”，一个在新“潮流”——不光是文学的，还有生活的——中生活过几年的文学家，他是很有意义的。两代人之间不可避免的鸿沟在哪儿？他们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在哪儿？究竟有没有联系？子辈转向了哪里？孙辈将走向何方？

新宗教思潮开始时魏因伯格经常到我们家来（我们已经搬到三楼，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仍然不是轻而易举的）。每次来都要不厌其烦地仔细询问：这宗教倾向从何而来？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思考什么？

他自称是唯物主义者。啊，当然。他们40—70年代的人全都自称是唯物主义者。然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坚持这一点——若要把普列谢耶夫、魏因伯格、波隆斯基、迈科夫、格利戈罗维奇及其数以千计的同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唯物主义”同后来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始终反应迟钝，难以容忍，天生自鸣得意。它自身代表了文化的某种断裂，最终必将导致个性概念的丧失。

我们这些著名的（还有不著名的）“老人”的唯物主义与此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只不过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自己变化了的感觉。他们自称“唯物主义者”，以示自己跟从前的盲目“信教者”的区别。可他们，说实在的，根本不懂什么是“唯物主义”。他们完好地保留了人的所有感觉，不曾有丝毫的丧失——他们算什么唯物主义者？

不过，这是个既十分有趣，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我这里只说一点：即使把那一代俄罗斯人叫做唯物主义者，那也应该是唯心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我并不是有意将别林斯基、皮萨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巴扎罗夫排除在外——只要再读一遍《父与子》就够了！只是一层无意识的薄膜将他们同真正的宗教性隔离开来。正因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才成为“崇高道德的代言人”（这一过时的说法一点也不可笑）。正因如此，当时才会出现精神异常坚强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能够建功立业和自我牺牲的人。（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偏僻的流放地、冰封雪盖的西伯利亚小城写的《给妻子的信》，同契诃夫在他同样称之为流放地的雅尔塔写的《给妻子的信》两相比较是饶有兴味的。——作者自注。）真正的唯物主义扼杀“骑士”精神。会不会有人说，我们当时的文学，乃至整个俄国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精神呢？

但我现在说的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后来可怕的分道扬镳，而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俄罗斯旧文学的一个谦虚的骑士——魏因伯格。

他伤心而饥渴地听着我们对他说的话。是的，如果他“不信”，我们也无可奈何。确实，长年以来，他习惯了“不信”。难道半个小时的话就能征服这个习惯？

可是，起身要走时，他突然说：

——或许,那边还是有什么的。我见到过她。

我们明白,这“她”指的是他爱了一生的那个女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怎么见到的?什么时候?

——就像现在见到你们一样。而且这几年见到过不止一次,而是两三次。早晨或者晚间,我躺在床上——突然,她走了进来,坐在我身旁。她跟我说话,只是我不知道,我听见了她的话没有,或者看到了她在想什么没有。奇怪,我甚至是头一次没感到害怕,而且没在心里管她叫“幽灵”。当时只是觉得,“那边”大概是有什么的……

他思索片刻,微微一笑,以他惯常的、迷人的讽刺补充道:

——也有只可能这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是老年智力衰退的征兆。谁知道呢?我只知道我见到了她,而且至今也不相信她已经死了。

日本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们便去了国外,最近几年没见过彼得·伊萨基耶维奇。他逝世于彼得堡,好像是在1908年夏天。

八

关于我青年时代见过的人们,关于“芬芳的白发”,我的故事结束了。应该在此打上句号。即使我还要讲一讲我跟亚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位老人的唯一一次见面,那也是以附录的形式。我没有离题:整个世界都知道这白发的芬芳。但我们的见面发生得很晚,是在1904年,几乎是昙花一现,所以我的叙述也将很简短。

去拜见托尔斯泰?去扩大已经使他疲惫不堪的来访者的人数?不过梅列日科夫斯基有特殊理由要求这次访问,部分地是朝圣:他刚刚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论托尔斯泰的著作(《列夫·托

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而他在书中对托尔斯泰似乎不是特别公平，加上刚刚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托尔斯泰被"革出教门"的事，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痛心疾首。一句话，这并不是出于一种想"一睹托尔斯泰风采"的好奇心，而只是出于一种对他的向往。

我们决定从侧面打听一下，我们能不能去，何时去才不至于打搅托尔斯泰。直到收到苏霍金夫妇转来的直接邀请（甚至还有交通路线图），我们才动身前往亚斯纳雅波良纳。

马车在火车站上等候我们。时值 5 月初。天空晴朗，刚下过一场冷雨。麻雀在田野上空悦耳地啁啾，好像是在笑。接近房子时，硕大的水滴从林荫道的树上掉到我们身上。

在楼下，在窄小的、不很明亮的前厅里，一个丰满，但不够匀称的女人朝我们跑了过来（确实是跑）：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19]。

——啊，他们来啦！

她马上开始安顿我们，把我们领进事先准备好的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都在楼下，其中一间好像曾经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工作室，我在列宾的画上见过。

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领我们进房间时告诉我们，她今晚是专门留下来等我们的，明天早晨六点钟她要去莫斯科——"还是因为出书的事！"但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她已经吩咐下人为我们备好马（我们是第二天十二点离开的）。

——你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上楼，我们过一会儿开饭！

说完她跑开了。她的灵活让我吃惊，甚至让我有些不安。

我们坐在长长的饭厅里，饭厅两端是窗户。桌子也是长长的。人算得上多，但不是很多。好像全都是亲戚。

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介绍大家认识，忙得不亦乐乎：

——请坐，请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马上就来！

当一个身材不高、面容瘦削、穿着束腰短衫的老人迈着轻柔的脚步，从左侧的内室里走出来时，我们已经开始落坐。长长的短衫在他弯曲的背上翘着。

他走得相当快，马上跟我们寒暄。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的矮小令我大吃一惊。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吗？如果说我们见过的无数照片给我们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如果说它们是托尔斯泰，那么，眼前这个瘦小的老头就不是托尔斯泰。一句话，我无法将两者——新的、活的托尔斯泰同照片上的、习惯的托尔斯泰联系在一起。

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坐在桌子的一端，我坐在她的左侧，托尔斯泰坐在右侧，正对着我。桌子不宽，灰色的短衫，罕见的白里透黄的大胡子，浓黑的眉毛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眉毛不是威严，而是忧伤地悬在深陷的眼睛上方。孩子般的眼睛——或者说是老年人的眼睛——是浅蓝色的。

托尔斯泰在跟梅列日科夫斯基说话：好像是在谈道路，我听不清，桌旁很嘈杂。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吃得很快，举止跟所有的近视眼一样，有点像是"埋着头"。她没有忘记用馅饼款待客人。佣人戴着白手套上菜。桌子中间放满了酒。很快，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面前（也等于是托尔斯泰面前）出现了一只烤乳猪——我甚至还记得它龇着牙。

不过托尔斯泰没注意，他只顾吃自己小碗中的菜。他像老人那样聚精会神地吃着，久久地咀嚼着。

饭后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高兴地领我们参观亚斯纳亚波良纳的房子，所有的藏画和照片："看，这是——！"她不无自豪地说，指着一排有些发黑的油布。她的房间里有一只画架，她平时从事绘画创作。

——这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卧室。

一个不大的房间，除了一张白色的弹簧床，一只小桌，几乎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我们来到宽敞的木阳台。下面的庄园弥漫着一股芬芳的春天的湿气。

——你们是从莫斯科到国外去吧？

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问道，随即又冲我开玩笑说：

——干脆，您留下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替您出国！我还从来没有出过国呢！

黄昏的时候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领我们去庄园。她就像一个小姑娘，遇到水沟就蹦过去，迫不及待地什么都给我们看，什么都给我们讲。我们四处走了个遍，她告诉我们，哪片树林是属于哪个儿子的，哪片树林已被砍伐……接着又讲起明天到莫斯科的事，出书的事，等等，等等。

我们回到饭厅。墙角放着一圈椅子和沙发，中间是一张圆桌。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现在坐在沙发上，紧靠着一盏带白色大灯罩的台灯。托尔斯泰坐得有些靠边，大概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姿势跟平常累了时一样。这里没有不速之客。显然，只有两三个常住者，外加一个身穿褐色猎装、少言寡语的男子。

托尔斯泰用熟悉而又疲倦的嗓音谈论着熟悉的东西。人生……祷告……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见缝插针，及时地发表了相反的意见。祷告？不，她相信，可以将请求诉诸祷告，而且马上会得到满足。托尔斯泰不以为然地谈起当代诗人，提到索洛古勃……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从座位上站起来，在钢琴上抓起一本带插图的杂志，当场朗读了一首索洛古勃的诗。

——可我喜欢！

她不无挑战意味地说。

很快我们又转移到饭厅的另一端,坐到了茶几旁边。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立刻过来喝茶的。他们陆陆续续地来,又很快陆陆续续地离去。托尔斯泰这时变得精神起来。他亲自挑起话题。只有两个极不爱说话的人听他讲。就连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也走了(明天要早起赶火车),高兴而客气地同我们道了别。

谈话的详细内容我忘记了,这里我只能大概说说。托尔斯泰当时说的话,可能对很多人都讲过,而且被记录过多次,只是他的语调非常兴奋,从他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交谈中可以感觉得出,他读过梅列日科夫斯基关于他的书。(事实上确实如此:托尔斯泰无所不读,对当代文学了如指掌。他甚至还读过我们的宗教杂志《新路》!)

——我一直想动笔写真正的日记,可是做不到。要知道,即便是只记下我一天的生活,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我打断他:

——您说的是您现在的生活?

托尔斯泰点点头:对,对,是现在的……

我感到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世上有这样虚怀若谷的人吗?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现在罪孽深重呢?

我们当然要谈论宗教问题。这时,托尔斯泰突然把谈话纳入自己的轨道,开始赞扬"健全的理智"。

——健全的理智是人的指路明灯。健全的理智有助于人走上正确道路。路被明灯照亮,人就可以知道把脚迈向何处了。(我不敢保证托翁的话我记得完全准确——作者自注。)

托尔斯泰赞扬"健全的理智"时的那种夸张语调刺激了我,使我同他争论起来。我几乎是叫喊着说,不应该在这一层面上赋予"健全的理智"至高无上的意义,这个概念是很相对的……突然,我又醒悟过来,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礼。我这是在对谁大喊大

叫？要知道，这可是托尔斯泰！不，我绝对无法将这个瘦小、固执的老头同我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不是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只不过是在我眼里，出现了两个列夫·托尔斯泰，而不是一个。

其实，这个矮小的老头说的跟列夫·托尔斯泰近几年说的和写的完全是一致的。我明白，托尔斯泰是“唯物主义者”。但我还明白（就是现在我也敢肯定），托尔斯泰这位“唯物主义者”，跟他同时代的其他俄罗斯人，宗教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毫无二致。只是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他把这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推向了极致，使它已经具备了真正的宗教形态，只是一条看不见的界线将它与宗教隔离开来。

托尔斯泰跨越了这条界线没有？他在生命的某些瞬间跨越过没有？回答大概应该是肯定的。我想，也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谈论复活，谈论个性。突然，托尔斯泰用异常朴素，朴素得惊人的话语说道：

——临死的时候，我会对上帝说：我现在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要是愿意，就让我复活，要是不愿意，就别让我复活。我整个交给了他，任凭他怎么处置……

听了他的话，我们全都默不作声了，再没有争论什么。

早晨八点钟，当我们走出房间时，在前厅里遇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刚散步回来，情绪饱满，精神焕发，戴着白色的羔羊毛帽子。

——我敲过你们的门，想找你们一起出去走走，可你们还在睡觉！我们现在去喝茶吧。

在通向饭厅的不太高的室内楼梯上，他停了片刻，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梅列日科夫斯基说：

——你们能来我很高兴。这意味着，你们并不反对我……

饭厅里很清静。有人——不记得是谁——给我们倒茶，但喝茶的只有我们三个人。茶的味道很香，加了奶油，就着新鲜的白面包。

女主人不在，但“伯爵”的家中秩序井然。仆人们来去无声。厨师甚至还把菜单拿来给“伯爵大人”过目：看得出来，这是长年养成的习惯。托尔斯泰迅速浏览了一下(这有什么值得他亲自过目和讨论的呢?)，做了一个肯定和敷衍的手势，厨师满意地走了。

我们三人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托尔斯泰很高兴，比昨天高兴得多。我们没有触及根本性的和有争议的问题，只是海阔天空地无所不谈。通过交谈我们才了解到，托尔斯泰什么书都读，而且在密切注视一切。

马车准备好了。托尔斯泰走到门口的台阶上送我们。夜里下过雨，湿漉漉的草闪闪发亮。阳光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白里透黄的大胡子也在闪闪发亮。我们上车时，他的眼睛眯缝着，是那么和蔼可亲。

我们走了，再次穿过田野，我发现，那里的麻雀笑得、唱得比昨天更加悦耳动听了……

这是“附录”。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提到一个人。这不是对他的回忆，只是顺便提提而已。他也散发着白发的芬芳。关于他，不需要详说，他还健在，人人都熟悉他，其程度不在我之下。关于自己辉煌而动人的一生，他自己会讲述的，只要他愿意。此人就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恰伊科夫斯基[20]。

当然啦，他要比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们年轻。但他毕竟不是他们的儿子，他是他们的弟弟。他跟他们是同一代人，而且走的是同一条路。只不过由于年轻，他在这条路上又比他们朝前多迈出

了一步。尼·瓦·恰伊科夫斯基已经不是一个自称“唯物主义者”的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者。但他的唯心主义也不具有宗教面貌。尼·瓦·恰伊科夫斯基尽管实际上跟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没什么两样，但他信奉基督教。

如果说俄罗斯当时的儿女中有很多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青春年华，如果说年老时他们的白发散发着芬芳，这莫不是因为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埋藏着宗教真理的种子？不必自欺欺人：没有坚实的老根，长不出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幼芽。

没有必要再回到老人那里。没有必要重复他们走过的路。但有必要“向他们索取”。索取，然后继续前行。或许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不要惧怕，不要迟疑”。

1924

译注：

① 雅·彼·波隆斯基(1819—1898)，诗人，小说家，回忆录作家。

② 阿·尼·迈科夫(1821—1897)，诗人。

③ 阿·尼·普列谢耶夫(1825—1893)，诗人。

④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俄国作家。

⑤ 彼·伊·魏因伯格(1831—1908)，诗人，翻译家，文学史家。

⑥ 康·彼·利多夫(1862—?)，诗人。

⑦ 阿·阿·科林夫斯基(1868—1937)，诗人。

⑧ 米·伊·谢苗夫斯基(1837—1892)，俄国历史学家，新闻记者。

⑨ 阿·谢·苏沃林(1834—1912)，出版家，《新时代报》主编。

⑩ 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国务活动家。

⑪ 尼·叶·布列宁(1874—1962)，革命活动家。

⑫ 意大利语，多少(钱)。

⑬ 意大利语，五(里拉)。

⑭ 法语，下等酒店。

⑮ 法语，电梯。

⑯ 谢·雅·纳德松(1862—1887)，诗人。

⑰ 阿·安·波捷辛(1829—1908)，俄国作家。

⑱ 维·尼·费格涅尔(1852—1942)，女革命家，回忆录作家。

⑲ 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1844—1949)，托尔斯泰的妻子。

⑳ 尼·瓦·恰伊科夫斯基(1850—1926)，革命民粹派分子，1904—1910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往事如昨

吉皮乌斯回忆录

郑体武 岳永红 译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忱

学林出版社

